HISTORY Students

中国读本

隋唐史话（上）

乌廷玉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历史特级教师鼎力推荐

《中国读本（史话分卷）》丛书是目前所见学生历史读物中最好的。一是丛书的各单本作者都是史学界的专家学者，这保证了内容的专业性；二是丛书的内容深浅适中，既体现了大纲要求，又有所拓展，可以作为课内知识的有效补充，很适合学生阅读。同时，本书也适合老师们作为资源来储备。

——白幼蒂（北师大附属中学历史特级教师，北京市高级中学实验课本编委）

本套丛书是按照新课标要求进行编辑的，扣住了教学大纲，既体现了教学重点，又有适当的延伸，对拓展学生知识面很有必要，是一套质量很高的学生课外读物。

——李明赞（北京四中历史特级教师，国家新课标高中历史教材编撰者之一）

此书最大特点就是将知识、学术融为一体，既有严谨治学态度、科学辩证唯物史观，又能够栩栩如生描述再现一个过去，语言表达通俗易懂，人生哲理深入浅出，满足了不同学生的学习层面要求，更有助于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和知识的拓展。对于青少年学习、探究历史，《中国读本（史话分卷）》无疑是一部难得的好书。

——范桂英（北京十五中学历史特级教师，市级骨干教师）

ISBN 978-7-5078-3082-8



定价：30.00元（上、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唐史话（上下）/乌廷玉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9.10
（中国读本）
ISBN 978-7-5078-3082-8

Ⅰ. 隋…　Ⅱ. 乌…　Ⅲ. 中国—古代史—隋唐时代—通俗读物
Ⅳ. K2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4320号

隋唐史话（上下）

著　　者	乌廷玉
责任编辑	李　惠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275千字
印　　张	20
印　　数	5000册
版　　次	2009年10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10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082-8/G·1280
定　　价	30.00元（上、下）

出 版 说 明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
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被遐荒。
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这是半个世纪前我们祭祀轩辕始祖——黄帝时留下的华美篇章。

我国是有着6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而不懈的考古挖掘，还在不断延伸着她的历史源头。放眼全球，我泱泱中华，江山多娇；检点历史，我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周易》到《诗经》，自《天问》而《警世钟》，六七千年，流淌不息。这里既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浩然博大，也有“何必马革裹尸还”的坦荡豪壮；既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贞刚烈，也有“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忠奸判定。曾经长时期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华文明，为人类的进步无私贡献出了自己无数的珍藏。

曾几何时，延绵几千年的中华文明遭遇了暂时的挫折，“打倒孔家店”的激愤一度让很多人盯上了西方的月亮。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发展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让媚外的思潮重新暗流涌动。但与之同时，过度物质化了的西方国家，却把他们的目光重新投向东方文明的古邦，试图从中找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良方。为此，我们曾一度犹豫彷徨，当一片飞叶被远风捎来时，我们因分不清它来自仙草还是毒藤而迟疑；当一堆泥沙被湍流冲去时，我们为

说不清它含金蕴宝还是藏垢纳污而烦躁。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曾经徘徊在一些人心头的迷茫逐渐扫去，重视传统，回归本源，从中华文明中寻找持续进步的动力重新成为热门话题。清理我们的文化遗产，描绘她的真实面貌，发扬她的优秀传统，规划她的锦绣前程，是当代中国人既严肃又富有魅力的历史使命。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脉络者，我们的历史是最应珍视的一笔遗产。但中国历史博大精深，古籍文献、文书档案浩如烟海，一部中国史，真不知从何处说起！

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我社约请、组织在史学界享有崇高声望的老一辈历史学家，精心编撰了这套《中国读本》丛书（中国历史史话分卷）。本分卷共16分册，分别是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上、下）、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上、下）、五代、宋朝、元朝、明朝、清前期和晚清。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作者在专业研究的基础上，以大手笔撰写小文章，在各分册中，对该断代的重大事件、经济发展、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社会生活、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科技发展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既有专业的厚度，又不乏诙谐和幽默，文笔平实流畅，通俗易懂。

历史是一个辉煌的存在，历史学是一门智慧之学、启迪之学，我们衷心希望广大的读者朋友能从这套丛书中寻到灵感，从6000年历史积淀中汲得智慧，熔铸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崭新的智慧王国。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9年6月1日

开 头 语

——略说隋朝

从东汉末年董卓之乱以后，全国分裂近400年之久。到了南北朝末期，由于阶级与阶级间的和民族与民族间的长期斗争，使社会阶级和社会经济状况发生显著的变化：

首先，在长期动乱中，士族门阀势力衰落了。在侯景之乱的过程中，“江东百谱”的名门望族已经“覆灭略尽”（《北齐书》）卷四五）。南朝从刘宋以来，便限制士族势力，使“寒人掌机要。”至于北朝，由于少数民族掌权，士族地主的势力，始终不如南方那样强大。西魏能够实行“擢贤良”的政策，反映士族门阀已经无力左右国家政治。

其次，南北朝数百年间，由于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他们不仅共同生产，而且和汉族人民一道与各族统治者进行斗争。他们无论在经济生活方面、语言方面、风俗习惯方面，基本上和汉族合流。后来的历史学家只能从他们后裔的姓氏郡望上来考知他们族姓的渊源。到了隋唐时期，氐、羌、鲜卑、匈奴、賨、羯等族的名称，终于成了历史名词。

第三，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原来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在汉族较高的文化影响下，进行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改革。如北魏孝文帝实行改制以后，北方经济有了很大发展。《齐民要术》中所反映的生产技术的进步，是北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洛阳伽蓝记》说：“（中原）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

之食，茕独不见牛马之衣。”说明北魏末年黄河流域生产有很大的恢复和发展。

所有这些，都说明国家统一的物质条件已经成熟。

此外，在南北朝末年，北强南弱的形势已成定局。建德六年（577），北周出兵灭齐，一举统一了长江以北各地。当周武帝伐齐之时，陈朝大将吴明彻进兵夺取北齐的淮南。周灭北齐以后，立即伐陈，收复了淮南一带。这样一来，当时北周的疆土，不仅据有长江以北广大区域，而且包括长江中上游各地（今湖北、四川）。在北周末年，周武帝已经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正因为这样，周武帝在世时，曾准备“平突厥，定江南”。可惜周武帝不久病死，完成全国统一的任务便落在隋文帝的肩上。

隋文帝杨坚的祖先汉族人杨元寿，是北魏武川镇的司马，住在武川。杨坚的父亲杨忠是鲜卑大贵族独孤信的部下，当年跟随魏孝武帝进了关中，竭力辅佐宇文泰，当上了柱国大将军，封隋国公，任大前疑（宰相），掌握军政大权。杨坚的妻子是鲜卑贵族独孤信的女儿，而杨坚的女儿又是周宣帝宇文赟的皇后，所以他又是周静帝的外祖父。由此可见，杨坚不仅是关陇集团上层强有力的军事领袖，而且是皇亲国戚，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

周静帝宇文阐 8 岁称帝，杨坚在汉族大官僚郑译、李德林、刘昉、高颎，韦孝宽等人的支持下入宫辅政，总揽军政大权，从此便开始为夺取帝位创造条件。

正当杨坚准备夺取帝位的时候，亲近北周皇族的势力纷纷起兵，反对杨坚。首先发难的是相州（今河南安阳）总管尉迟迥。与此同时，郧州（今湖北安乐）总管司马消难、益州（今成都）总管王谦，也相应起兵。杨坚针锋相对，派韦孝宽等反击尉迟迥，梁睿反击王谦，王谊等攻打司马消难，消灭了这三股反杨势力。然后，杨坚大杀北周皇族。赵王招、陈王纯、秦王贽、曹王久、越王盛、代王达、滕王逌、毕王贤、汉王赞等，相继被斩首。北周宗室子孙死亡殆尽，周静帝彻底孤立。大象二年（580），杨坚自称隋

王。第二年二月，杨坚迫使宇文阐让位。杨坚即位，这就是隋文帝。改国号为隋，年号开皇。

隋朝建立以后，杨坚实施各项改革，巩固中央集权。同时，又做了统一南方的准备工作，其具体内容有四：一是在高颎建议之下，制定一个破坏南陈军粮供应的计划。派人偷渡长江，把陈朝储备的粮食烧毁。从此以后，"陈人益敝"（《隋书》卷一《高祖纪下》）。其次，开皇七年（587），疏浚山阳渎，使江淮之间的水道畅通。第三，隋将崔仲方拟定了一个征服南陈的军事计划，其主要内容是集中精兵于武汉以下地区，即今安徽的滁县、和县一带，准备秘密渡江。第四，命令杨素组织有关人员，在永安（今湖北松滋）督造大批能够容纳八百人的五牙大船和乘百人的黄龙船，同时又制造一些平乘、舴艋等小型战船，为渡江做好准备。

当时，陈朝皇帝陈叔宝极端奢侈腐化，梦想当"无忧天子"。

当陈后主君臣酣饮的时候，杨坚已经准备灭陈。在陈后主即位的前一年，他就派大将韩擒虎任广州总管，进驻庐江（今安徽庐江）；贺若弼任吴州（今江苏扬州）总管，隔江钳制了陈朝首都。开皇八年（588）年末，隋朝设置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今安徽寿县），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总领平陈的战役，并以杨广、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于是杨广出六合，杨俊出襄阳，杨素出信州（今江西上饶），刘仁恩出江陵，王世积出蕲春（今湖北省蕲春县），韩擒虎出庐州（今安徽合肥），贺若弼出广陵（今扬州市），燕荣出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军队共计51.8万余人，在杨广总领下，大举攻陈。

当隋兵步步进逼的时候，陈朝边将上书告急，请求派兵防御，但陈后主却置之不理。陈后主说："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今隋军前来，彼何为者也?"大臣孔范自称文武双全，也说："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耶！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通鉴》卷一七六《陈纪十》）。陈后主照常饮酒赋诗，听乐观舞，朝臣正忙于筹备元旦大庆。陈后主的

亲信施文庆，唯恐隋军进攻的消息干扰了元旦大庆的准备，不仅不作报告，把战备工作也推迟了。

除夕之夜，皇宫里灯火辉煌，满朝文武围绕着丰盛的酒席，正在那里狂欢。陈后主喝得酩酊大醉，昏昏沉沉，紧急军事情报未拆封，便丢在床下。守卫采石军事要地的将士，也喝得东倒西歪。韩擒虎乘机率500人夜渡采石矶，全歼酣醉的陈军。元旦之晨，大将贺若弼又乘漫天大雾，偷渡长江，陈朝守军毫不察觉，隋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京口（今江苏镇江），直奔建康（今南京）。

当时建康还有十几万军队，兵力不算太少。但有能力的将领却得不到重用，如能征善战的萧摩诃，听说贺若弼从广陵渡江攻京口，曾请求领兵反击，后主不许。贺若弼进攻钟山，立营之际，萧摩诃再一次请战，陈后主仍然不同意。直到隋军进攻首都时，陈后主才允许萧摩诃出战。这时，不学无术的孔范也领一支部队混在军中。隋军在建康城下初战不利。贺若弼登山观察形势，发现孔范的部队阵地紊乱。隋军集中力量先攻孔范的阵地。建康守军招架不住，大将任忠投降韩擒虎，并引隋军进了朱雀门。陈军准备抵抗时，任忠对他们说："老夫尚降，诸军何事?"结果陈军一哄而散。其他各地陈军也都投降。躲在景阳宫的陈后主出来，投降了隋朝。

隋朝平定南陈，结束了400余年长期分裂的局面，中国重新统一。

目　　录

第一章　隋朝的政治和经济

从杨坚建立隋朝，到杨广被绞死，隋朝只存在了37年。这个短命的王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在政治、经济、法律、兵制等方面，整顿并建立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对隋唐以后各王朝，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隋文帝励精图治（上）

——隋初的政治

隋文帝取得政权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隋王朝的统治，整顿并建立了一系列制度。

官制　开皇元年（581），废北周的六官制度，建立三省六部制度。三省即尚书省（管理全国政务）、内史省（起草诏令）、门下省（审查政令及封驳），三省长官都是宰相。在尚书省以下，分设吏（掌人事）、礼（学校、科举、祭祀）、兵（国防）、都官（司法）、度支（财政）、工（掌营造屯田等）部，每部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开皇三年，改都官为刑部，度支为户部，六部尚书分管全国各种政务。从此以后，历唐、宋、元、明、清各朝，基本上沿袭这种制度，不过稍有一些变更。此外尚有御史台（监察各级官员）、都水台（掌水利）及大理（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太常（掌礼乐）、将作等十一寺卿，还有左右卫（掌禁卫）、十二府（管府兵）。

地方官制，最初沿用周齐的州郡县三级制，开皇三年，取消

郡，实行州、县两级制。同时，并省了不少州县，裁汰了一些冗官，从而节省了政府的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

汉魏以来，州郡县长官有权就地自辟僚属。不仅如此，而且当时刺史多掌兵权。故史言："自魏晋以后，刺史多带将军开府，则州与府，各置僚属，州官理民，府官理戎"（《通典》卷三十二《职官典》十四《总论州佐》）。直到南朝灭亡，大体都是如此。北魏和南朝相似。北齐北周时期，地方属僚的任命权，已逐渐转移到中央政府。到了隋朝，任何官员都要由吏部任命。过去州郡长官就地征辟僚佐，多是本地豪强地主。隋朝规定：县佐不准任用本乡人士。这样一来，本地人便无法把持本地政务了。这些措施既改善了吏治，又加强了中央集权。

改革府兵制 府兵制是西魏建立的兵制。当时，宇文泰为了巩固自己地位，防止境内分裂，利用鲜卑族的血缘关系以维系复杂的部族混合体，于是便利用恢复鲜卑姓氏和赐鲜卑姓氏的方式拉拢各族将士。到隋文帝掌权以后，正式下诏："诸改姓者，悉宜复旧。"首先隋文帝自己废弃了普六如氏，复姓杨氏。接着，全国其他将领也跟着恢复自己原来的姓氏。隋文帝这样做，一方面争取了广大汉族的同情和支持，同时又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削弱军队统领方面的分散倾向。开皇十年（590），颁布了关于军人编入户贯的诏令，这是府兵制度的重大改革。西魏北周的府兵，一般是家属随营，列于兵户，不属州县。军队南征北战时，家属也跟军队调动。因此当时的府兵都是"家无完堵，地罕苞桑。"隋朝


隋文帝

把兵户编入民籍，改属州县管辖，从此不再有兵户的存在，“垦田籍帐，一同编户。”这就是说，府兵可以按均田令保有自己的土地或领受一份田地。隋文帝这样做，实际扩大了府兵的兵源，从而巩固了中央集权。

制定新律　开皇元年，隋文帝即位不久，便令高颎、郑译、杨素、常明、韩浚、李谔、柳雄亮等制定新律。两年后，又令苏威、牛弘等更定新律，这就是开皇律。后来，隋炀帝又制定了大业律。隋律的渊源主要是北魏和北齐律，当时是律令格式并行，但以律为主。开皇律包括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盗贼、斗讼、诈伪、杂、捕亡、断狱十二篇。刑罚分五种：一为死刑，有斩和绞；二为流刑，分为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共三等；三为徒刑，分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共五等；四为杖刑，从六十到一百共五等；五为笞刑，从十到五十共五等。隋朝又把北齐的重罪十条改为“十恶”之条，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之条和故意杀人者，虽然遇大赦之机，仍要除名。

隋朝法律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贵族官僚在法律上享有特权，犯法之后可以减免刑罚。《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说：“其在八议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减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听赎，赎皆以铜代绢。”所谓八议，系指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就是皇族及其亲故、贵族、功臣、大官僚等犯罪都可以根据平时表现减刑或免刑。一般官员有权减一等治罪和以铜赎罪。

隋律比较北魏律，刑罚多少有所减轻，取消了宫刑、辕刑、枭首、鞭刑和孥戮相坐等残酷刑罚。另一方面，开皇律又除去死罪81条，流罪154条，及徒杖若干条，只保留500条。孥戮见于殷朝，连坐兴自商鞅，这种野蛮的刑罚，至隋朝废除。

律文以外，在诉讼程序等方面，隋朝又制定一些有利于人民的

制度。如人民有冤枉上告，假若县官不理，允许越级向州官上诉，直到朝廷。穷人虽未必能到朝廷上诉，但这些规定客观上起了保护人民的作用。开皇二年（582）下诏，全国各地死罪犯人，不准在本地处决，必须送大理寺（全国最高司法机关）复审，审毕再送尚书省奏请皇帝裁定。九年以后，又勅令死罪犯人要经过三次奏请才决定行刑。总之，隋朝新律注意“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精神，比秦汉南北朝法律确有很大改进。但是，在封建社会，律文和实际要有很大出入，皇帝个人可任意立法，也可以破坏法律，各级官员也难守法。到了隋末，法制彻底废弛。

创立科举制度 隋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士族门阀的权势，于开皇年间取消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用分科考试方式选拔官员。当时的科举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类属于临时的特科，相当于唐朝的制科，有“贤良、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科。第二种是常设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科。最初只设秀才、明经两科。秀才先试策，并加杂文。如开皇十五年（595），杜正玄投考秀才科，当时杂文考试很难。那年的题目是拟作《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白鹦鹉赋》。次年的考题是拟作《贾谊过秦论》及《尚书·汤誓》、《匠人箴》、《几赋》等。当时秀才科录取的标准非常高，每次考试及第人数极少，几乎成为虚悬的科目。后来又增置了进士科，只试策，不考杂文，增加了录取人数。明经科只考《九经》，或贴经或问经义，及第人数较多。隋朝的刘焯、王贞、杜正玄、杜正藏、许敬宗等都是秀才出身，房玄龄、侯君素、孙伏伽、杨纂等都是进士出身，孔颖达、韦云起等是明经出身。

以上谈的是隋初几项重要制度。这些制度能否实施，关键在于各级官员的态度。隋文帝为了贯彻他的政策，非常注意地方官的选拔，并且实施法治，严明赏罚。如开皇元年，他专门下诏表扬岐州刺史梁彦光，后来又表扬相州刺史樊叔略、新丰县令房恭懿。开皇十一年（591），因临颍县令刘旷的考绩名列天下第一，被升为莒

州刺史。五年以后，汴州刺史令狐熙，吏部考绩第一，赐帛三百匹，布告天下进行表扬。开皇二十年（600），齐州有个小官王伽，执法认真，关心群众，使归家的罪犯自己按期到京城报到。这件事感动了隋文帝，他立即召见王伽，同时敕令全国官员，以王伽为榜样，教各级官员以诚待民。

隋文帝不仅奖励良吏，另一方面，还励行法治，严惩贪官污吏。经常派人侦察内外官员，发现犯法行为便加严惩。他儿子杨俊因生活奢侈，私造宫室，被他发现后，即敕令归第禁闭。开皇二十年（600），他发现太子杨勇奢侈好色，便把杨勇废黜，立杨广为太子（实际杨广更腐化）。由于隋文帝励行法治，一般官员有所畏惧，贪污行为相对减少，对人民群众多少是有利的。

二、隋文帝励精图治（下）

——隋初的经济

隋文帝的内政改革，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南北统一局面的出现，更促进了封建经济的繁荣。因此，在隋朝统治时期，几百年来发展迟缓的社会经济，立即走上迅速上升的道路。

隋朝的经济发展和均田制有密切的关系，当时的均田制度大抵沿袭北齐。农民所受土地，分为露田和永业田两种，露田要归还，永业田不还。丁男受露田 80 亩，妇女受 40 亩，奴婢按成丁受田，一头牛受 60 亩。每丁受永业田 20 亩，种植桑麻。官僚地主所受土地比农民多百倍，最高达 10 000 亩永业田，少者 2 000 亩。此外，他们还有职分田和公廨田。灭陈后，这个制度推行到江南。

在均田制执行过程中，农民虽然受田不足，但是这种制度多少可使无地农民得到一些土地，地主对土地的兼并也受到一些限制，从而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全国耕地面积增加很快。开皇九年（589），灭陈后，全国垦田面积只有 19 404 267 顷，到大业五年

(609)，增加到55 854 040顷。这个数字虽然不科学，但仍然能够反映耕地面积激增的趋势。

隋初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措施，首先是减轻封建剥削，缩短农民服兵役和徭役的年龄，原来18岁成丁，开皇三年改为21岁成丁。7年以后，政府又规定丁男50岁允许“转庸停防”，就是交纳绢帛可以免役。其次是减少服役时间，南朝赋役比北朝苛重。北魏、北齐、北周的赋役大体相同，北周丁男每年服役30天到45天。隋文帝减为20天，比北朝少了一半左右。开皇元年、六年、七年三次修长城，都是“二旬而罢”，可见法令正式宣布以前，岁役20天的原则已经在习惯上存在了。法令公布以后，在炀帝以前并未破坏。此外，在全国统一以后，隋文帝曾宣布：“陈人给复十年，军人毕世免徭役”。开皇十二年（592），因朝廷府库皆满，诏令河北山东当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五年以后，再次“中外府库无不盈积，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从历朝史籍看来，通常都是灾年减免赋税，隋朝能在平时减税，充分说明由于当时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库是充盈的。

隋文帝时期促进生产发展的另一措施，是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开皇二年（582），开渠引杜阳水灌三畤原，使数十万亩土地得到灌溉。开皇四年（584），开广通渠，引渭水直达潼关，漕运300里；一部分用于灌田。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方官也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如怀州刺史卢贲，利用沁水修成利民渠和汤润渠。蒲州刺史杨尚希，引瀵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十万亩。兖州刺史薛胄，组织农民兴修薛公丰兖渠。这条渠除了“通转运，利尽淮海”以外，并且借倾泻积水，使附近沼泽“尽为良田”（《隋书》卷五十六《薛胄传》）。寿州的芍陂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旧有工程，但是到了隋初，由于“荒秽不修”，失掉了灌溉效益。当时寿州总管长史赵轨组织当地群众开36门，灌田50余万亩，“人赖其利”。

农业发展的具体表现是粮食储备大增，当时隋政府在全国设置许多官仓。开皇三年（583），在卫州（今河南汲县）置黎阳仓，

洛州置河阳仓，陕州（今河南三门峡）置常平仓，华州（今陕西华县）置广通仓。大业元年（605），隋炀帝下令建筑东都，当时在宫城之东建含嘉仓，于宫城右掖门西置子罗仓，储粳米 60 窖，每窖 8 000 石。第二年，又置洛口仓（兴洛仓）。同时在巩县东南高地，筑仓城周 20 里，内设 3 000 窖，每窖储粮 8 000 石。于东都城北置回洛仓，仓城周围 10 里，穿 300 窖。开皇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贞观政要》卷八）。库藏之多，亘古未有。到大业初年，东都的布帛，堆积如山，太原的粮储可支十年。因此贞观十一年（637）马周对唐太宗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这就是说，隋朝已经灭亡 20 年了，他们储备的粮食布帛还没有用完，可见隋朝库藏的充实至为惊人。当然，大量的粮食布帛都是农民辛勤劳动的结果。

开皇五年（585），又在全国各地设置义仓，作为救灾之用。农民在收获季节，交纳一些粮食，放在义仓，由本地社司管理，发生灾荒时便开仓放赈。到了开皇十五年（595），封建政府直接控制了义仓。第二年，朝廷又规定农民按三等交义仓粮，上户一石，中户七斗，下户四斗。从此以后，义仓粮变成一种封建剥削制度。

伴随着农业的发展，隋朝的人口也逐年增长，开皇元年（581）只有 3 599 604 户，平陈以后增户 50 万，到大业二年（606），上升到 8 907 536 户，46 019 956 口。仅用 20 余年时间，全国户数增加一倍以上。人口的增长和整理户籍虽然有关系，但不能因此而否认人口增殖这一事实。

隋朝农业的发展，给工商业的发达创造了条件，而大运河的开凿，又促进了全国各地物资的交流，因此隋朝的工商业也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

当时最主要的手工业是纺织、陶瓷、制茶等。

纺织业以河北一带的绫绢最有名，北齐曾在定州（今河北定县）设细绫局，当时相州所产的绫纹细布，非常精美。四川的蜀郡，“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隋书》卷二十九

《地理志》)。豫章（今江西南昌）更出产一种鸡鸣布，颇受各地消费者欢迎。

陶瓷方面，近几年来考古发掘，在大业四年（608）李静训墓和大业六年姬威墓里，都发现了白瓷，如鸡首壶、双龙把手瓶和双耳扁壶等，可见白瓷在隋朝已经出现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静训的墓里，还发现了绿色玻璃瓶。据《隋书》记载，何稠曾用绿瓷制成玻璃。把这段记载和李静训墓中的玻璃对比，可见隋朝不仅能制玻璃，而且其工艺已相当熟练了。

另一方面，焙制茶叶的工业也有新发展。据记载，隋文帝时期，有筹禅师曾制成扶芳夜饮。隋炀帝时，“吴郡送扶芳二百树，其树蔓生，缠绕他树，叶圆而厚，凌冬不凋。夏日取其汁，微火炙使香，煮以饮，碧绿，色香甚美，令人不渴”（《大业杂记》)。这种扶芳树，就是茶叶的一种，经过焙制加工后作为饮料。

造船业也很发达，杨素曾在江南督造五牙战船，船上有五层楼，高百余尺，左右前后并高 50 尺，并且设置六个拍竿以拍击敌船。隋炀帝游江都时制造多种船只，从那里可以看出造船技术的精巧。

当时的手工业虽然很发达，但重要工业品制造都掌握在封建政府之手，例如兵工、造船、瓷器、精美纺织业，这些主要都由官手工作坊经营。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必然推动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隋文帝时统一了货币。早在南北朝时期，钱币轻重极端紊乱。南朝有五铢、六铢、鹅眼钱，岭南诸州利用盐米交易，不用货币。北齐用常平五铢，制造甚精，但市场上流通私钱，种类也很繁杂。北周使用永通万国钱、五行大布钱、五铢钱。隋文帝即位以后，逐渐废除以上各种旧钱，新铸一种五铢钱，作为标准货币，通行全国。不合标准的货币，禁止流通。开皇九年（589），全国统一以后，便大规模铸钱。当时在扬州设五炉、鄂州设十炉、益州设五炉，铸大量五

铢钱。文帝时法治严厉，基本上统一了货币。

其次，统一度量衡。南北分裂期间，度量衡紊乱不堪。开皇年间，规定以古尺一尺二寸为一尺，以古斗三升为一升，以古秤三斤为一斤。冀州刺史赵煚，曾制定铜尺铁尺，放在市场做标准。后来隋文帝把冀州的度量衡在全国推广使用。

商业发达的另一标志是城市经济的繁荣。西京长安既是全国政治中心，又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内置东西两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这是长安的工商业区，麏集国内外商人。

除了首都以外，东都洛阳也很繁华。这个城市位于黄河和通济渠的会合点，是全国水陆交通中心。洛阳设有三市，东市叫丰都市，南市叫大同市，北市叫通远市。通远市临通济渠，周围六里，商旅云集，停在这里的船只数以万计。丰都市周围 8 里，市内 120 行，3 000 余肆。洛阳不仅是国内著名商业城市，而且又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据点。此外，剑南的蜀郡，也是“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的“一都之会”。至于内地，还有一批商业发达的中等城市，如荆州、吴郡、会稽（今浙江绍兴市）、毗陵（今江苏常州市）、豫章（今江西南昌市）、余杭（今杭州以西）、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县）、蔡州、（今河南汝南）、岐州等。

对于少数民族和外国贸易，主要通过水陆两条渠道进行。为了发展和西域、中亚诸国的商业，隋炀帝派裴矩驻守张掖（今甘肃张掖），专门主持西域和外国贸易。裴矩根据富商“周游经涉”的情况，写成《西域图记》三卷，详尽地记述了这一地区的山川、风俗、物产等。海外贸易以南海（今广州）、扬州等地为集散地，这里中外商人云集，贸易品以丝绸、珠玑、犀象、玳瑁为主。

隋朝对商业严加统治，3 000 户以上的城市，都设立市署，专门管理地方商业，控制商品的流通和市场价格。

炀帝时期，在鸿胪寺下，设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使者各一名，专门管理少数民族和外国贸易。

三、大运河与赵州桥

我国内地主要河流——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等，都是从西向东流，在这几条大河之间，从南到北，有一条人工河纵贯其间，这就是世界最古最长的大运河。这条运河把长江、黄河、淮河、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联系起来，形成遍及全国的水运网。这条河是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对隋朝以后的唐宋经济发展有很大影响。

两汉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是在黄河流域，北方的经济比南方进步很多。据司马迁说，直到汉武帝时期，长江以南的农业生产仍然是“火耕水耨”。三国以后，特别是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由于长期战争，人民大量南迁，他们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南方人民共同开发这块富饶的处女地。经过几百年的开发，江南经济有了显著发展。南方经济发达地区，首推两浙，特别是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一带），成了士族门阀盘踞之处。这些地方的土地“亩值一金”，其肥沃程度可与关中相媲美。但是，隋朝的政治中心在北方。而北方城市和边防军所需要的粮食，有很大部分要依靠江淮地区供应。依靠马车和人力车运输，不仅运量小，速度慢，而且费用很大，无法满足北方各地的迫切需要。利用水路运输，是当时最切实可行的办法。由此可见，开凿大运河，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即使没有隋炀帝，这一时期必定也要开南北运河的。

从政治方面看，江南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始终是比较尖锐的。开皇十年（590），江南士族沈玄侩、汪华等聚众反隋，或称天子，或称都督。隋文帝派杨素调集大军，历时两年才平定江南的叛乱。开皇二十年（600）李英林起兵于熙州（今安徽安庆市），第二年，潮州僚民起义。由于南方人民的不断起义，隋文帝下诏没收天下兵器，严禁私造。同时更禁止江南人私造大船，凡是三丈以上的船只，一律由国家没收。隋炀帝为了加强对江南人民的

统治，下令开凿大运河，使南北运输畅通无阻。

除了上述原因以外，游玩享乐也是炀帝开运河的动机之一。他过去长期担任扬州总管，驻扎江都，并且到过建康吴会，醉心于江南的豪华生活。所以唐朝小说写他由于怀念江都美景，并为挖掉睢阳王气，而兴工开河。

大业元年（605），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100余万民夫，开凿通济渠。这条运河是利用古代运河渠道，加以拓宽的工程。从这年三月开工，八月完成，2 000里的渠道只用了100余天。如果是新开的河道，这样短的时间，无论如何也是无法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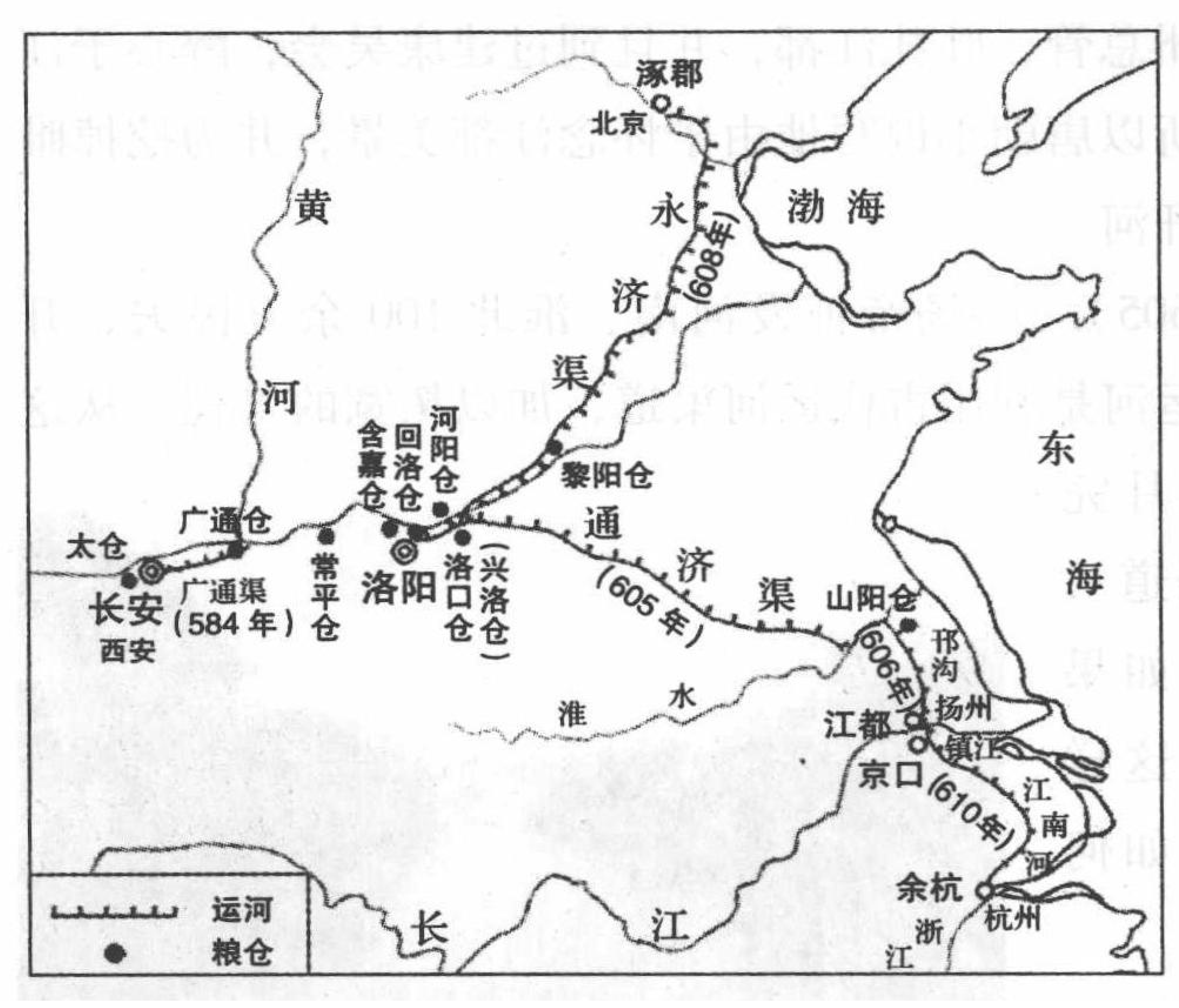


隋代大运河——邗沟现状

通济渠的具体路线，是以东都的西苑为起点，然后引谷水、洛水入黄河。进入黄河后，利用黄河的一段河道直达板渚（今河南汜水东）。从板渚再引黄河水南流，使河水进入古鸿沟系统的睢水。这条睢水经过现在的中牟、开封、陈留、杞县、葵邱、宁陵、商邱、下邑、永城、宿县、灵璧、泗县，入泗水而进淮河。

在淮河与长江之间，隋朝以前有邗沟相通，但是到了隋朝，邗沟由于多次改道，河道狭窄，根本无法通行大船。隋文帝平陈以前曾下令治山阳（今安徽淮安）。但是隋文帝整治的是邗沟入淮的水口，并没有彻底清理河道。隋炀帝时期，组织十余万民夫，把旧有的邗沟拓宽取直，从山阳到达扬子（今江苏仪征），位置在邗沟的西侧。这次又把邗沟改直，不经过射阳湖而直通长江。

大业四年（608），开凿永济渠。这条运河主要是利用自然河道，沟通沁水和淇水，引沁入淇，在武陟县北部会合，一直北流从天津入海。永济渠就是利用这条天然水道向北伸展，然后合永定河，北达涿郡（今北京）。



隋运河图

大业六年（610），开江南运河。在隋朝以前，长江以南的人民开了不少小河，这次开河主要是利用旧日的小运河，把小河拓宽。然后引长江水，穿小河，绕过太湖，以达杭州，便成了江南运河。这条河全长800里，宽10余丈，是江南10余万人民的劳动成果。

京杭运河北起涿郡，南达杭州，连开皇四年（584）隋文帝命宇文恺率水工开的广通渠（自大兴城至潼关，长300余里）计算在内，大运河全长2 700余公里，是世界最古老和最长的运河。大运河不仅长度在世界运河史上是首屈一指的，而且河道的水深和宽度及其通航能力也是最大的。

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是劳动人民用血汗开凿的。当时，隋朝统治者役使劳动人民特别残酷。据《通典》卷七《食货七》载："导洛至河及淮，又引沁水达河，北通涿郡，筑长城东西千余里，皆征百万余人。丁男不充，以妇人兼役，而死者大半。"大业四年（608），征发河北百余万众开永济渠，"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通典》卷十《漕运》）。当时督工的将军名叫麻祜，非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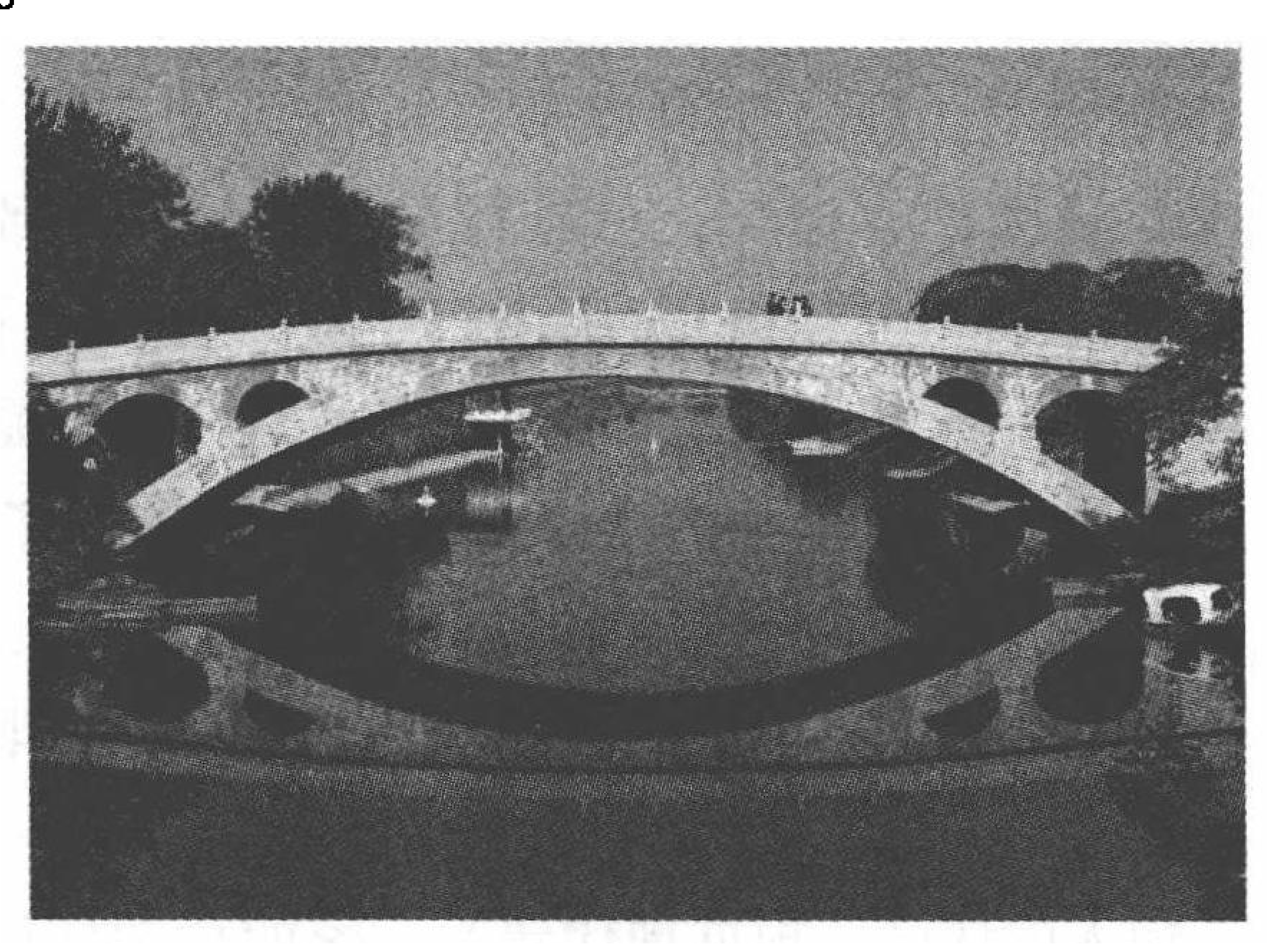
残暴，人们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害怕。沿河人民常用“麻祜来了”这句话恐吓小儿。隋朝统治者为开凿大运河，残酷地剥削压榨了人民。从这方面讲，大运河是隋末劳役繁重的历史见证。

大运河通航以后，对南北经济交流起了重大作用。运河是大业六年（610）开凿的，第二年，隋炀帝就敕令把江淮粮食北运，并将江淮等地战争物资通过永济渠输送辽东。因此唐朝著名理财家杜佑说：运河通航以后，“天下利于转输”。

另一方面，由于运河的通航，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如扬州、楚州、魏州、润州、泗州、河阴等城市很快繁荣和发展起来。

大运河开通以后，对黄河起了分流作用。这是因为每年六七月间，黄河流域雨量大增，黄河的流量骤然增长，而下游泥沙沉积，河床很浅，在河水上涨之际，容易泛滥成灾。但从开凿运河以后，每当黄河涨水季节，部分河水可以通过永济渠和通济渠泄出。这样一来，便减少了黄河本身的压力。因此，南北运河开通以后，数百年间黄河未发生大泛滥。

隋朝另一著名工程是赵州桥（即安济桥），它的建造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高超的技艺。


赵州桥

隋代安济桥位于河北赵州（今河北赵县）城南五里地方。这里有一条从西向东的大河，名叫洨水（今洨河）。中外闻名的赵州桥就座落在洨河之上，这是一座“舟楫航行其下，人马车舆通过其上”的大型单孔石拱桥。

赵州桥是我国和世界上保存完好的一座最古老的石拱桥，是隋朝李春负责设计和建筑的。从隋朝大业年间到现在，已经1370余年，不知经过多少洪水的冲击，今天仍然巍然屹立在洨水之上。赵

州桥全长52.82米，宽9.6米。桥上有三股道，中间走车马，两侧行人。赵州桥的净跨度长达37.4米，是当时中外跨度最大的石拱桥。桥的跨度虽然很大，但拱高只有7.23米。正因为这样，所以桥面坡度平缓，有利于交通和运输。在桥拱的两侧，各有两个小拱，可以减少洪水对大桥的冲击力。这种拱上加拱所谓“敞肩拱”的桥型，在欧洲直到14世纪才出现，这就是法国的赛雷桥，比赵州桥要晚700余年，还早已毁坏了。因此，在世界桥梁史上，赵州桥占有十分重要地位。

李春根据他多年的劳动实践，研究各种桥梁结构，大胆地利用拱形结构原理，用以建筑大跨度的独具风格的石桥，在我国桥梁建筑史上揭开了新篇章。

李春建桥的时候，注意了洨河下游水流较大的特点，为了防止阻塞，保证河道的畅通，改变于河心置石筑墩的传统形式，创造性地运用了单拱长跨度的方法。全桥由28道拱圈组成，纵向并列砌置。每一道拱圈都可以独立存在，施工时可以一道一道砌，使桥面逐渐加宽，同时还可以节省桥拱木架。因为同一木架可以使用多次，拱圈如有损坏，可进行局部修补，不致影响整个桥身的安全。每一道拱圈都是由43块拱石组成，一块拱石长度从70厘米到109厘米，宽度从25厘米到40厘米，厚度都是102厘米，重约2 000斤左右。为了加强拱圈之间的联系，使用了腰铁嵌入拱石之间，使整个大桥成一个整体，牢固耐久。

赵州桥的特点是跨度特别大，桥上却采取了平拱形式，使跨度和高度之间的比例只有五比一左右，这实在是一个大胆的创造，也是一个惊人的成就。根据现代建筑学家的科学估计，如果把赵州桥修成像芦沟桥那样“穹窿桥”的式样，这座桥的高度将达20米左右，几乎要超过现在桥高的两倍。赵州桥的平拱形式不仅桥面坡度小，便于车马行人往来，而且还节约材料，并大大增加了桥梁的强度。

另一方面，在大拱两端又加小拱的做法，不但用料省，又能分洪。据现代建筑学家分析，这种拱上加拱的方法，可以减少大拱重量500

多吨，相当于桥身自重的20%，大大减轻了桥基的压力。可以肯定，李春对工程学的理解是他能创造“敞肩拱”形式的科学基础。

赵州桥的桥基非常坚固，1370多年来，两边桥基下沉水平只差5厘米。桥基久已固定，不会再继续下沉。赵州桥的桥基是建筑在洨河床的粗砂层上，既没有打桩，也没有其他石料，桥台仅用5层石料砌成，桥基很浅，构造简单。在1300多年前，李春就敢于运用这样的天然基地来承担大桥的全部重量，说明他对于桥梁建筑是很有研究的。

赵州桥的另一特点是造型特别美观大方。桥面两侧石栏杆上那些“若飞若动”“龙兽之状”的雕刻，令人赞叹。石栏杆的全部构件，如栏板、望柱等都进行了一定的艺术加工。现存栏板中属于隋朝原物的有雕龙栏板和斗子卷叶栏板。这两种栏板的特点是刀法苍劲古朴，布局变化多样，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优良传统和独特风格。特别是雕龙栏板，刻有各种样式的奔龙、交龙，其中两龙钻穿栏板的雕刻是最为引人入胜的杰作。有一块栏板，正面刻有相向两龙，右边一龙前脚托着一个宝珠，左边一龙前脚抓住一朵大花，轮廓清晰，线条柔和，神情逼真。栏板背面也是两龙相向，龙身好像钻入栏板之内，冷眼看去，好像已经钻穿栏板，正背两面二龙又互相怒目凝视。这些雕刻，构思巧妙，形态动人，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平。

1370多年以前建筑的赵州桥，至今仍然屹立于洨水之上，它不仅反映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而且证明隋朝手工业技术发展到很高的水平。

四“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暴君隋炀帝

“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是李商隐讽刺隋炀帝的

诗句。隋炀帝杨广不仅荒淫无耻，而且残忍毒辣，是历史上罕见的暴君。

杨广是隋文帝次子。杨广兄弟五人，除了杨俊以外，都先后被他谋害，他才当上了太子。

仁寿四年（604），杨坚卧病不久，太子杨广就迫不及待地给杨素写信，谋划继位。隋文帝决定废掉太子杨广，密令兵部尚书柳述等起草诏书，召回废太子杨勇，准备让他继承皇位。杨广的爪牙很多，这项决定很快泄露出去。杨广立即伪造圣旨，逮捕了柳述和元岩，把自己的心腹派到宫里，宫门由他亲信宇文述等控制。等一切布置妥当，杨广派张衡进宫，杀了他父亲杨坚和哥哥杨勇。这年（604）七月，杨广登上皇帝宝座。

隋炀帝深恐江山不稳，即位的当年十一月，便决定迁都洛阳。

隋炀帝于大业元年二月，命宰相杨素和将作大将宇文恺开始营建东都，每月役使民工200万人。

三月，隋炀帝又下令建筑显仁宫。这个宫殿规模极其庞大，南接皇涧，北邻洛水，周围十余里。五月，又筑西苑，周围200里。

隋炀帝为了利用运河游玩，他诏令江南各地大量造船。在通济渠通航以后，炀帝出游江都（今江苏扬州市）。这次出游，兵卫仪仗之盛可谓空前。炀帝乘的龙舟，高45尺，宽50尺，长200尺。船分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共160间，都是以金玉为饰，雕刻奇丽。下层是宦官内侍所居。隋炀帝的龙舟由1 080个民夫用青丝大绦绳牵引而行，纤夫穿锦彩衣袍。皇后的船叫做龙螭舟，每艘用纤夫900人。妃嫔乘的是浮景舟，共9艘，每艘用纤夫200人。贵人、美人乘的是漾彩舟，共36艘，每艘纤夫100人。另有朱鸟舫、苍螭舫、白虎舫、玄武舫各24艘。飞习舫60艘，青凫舸、凌舸各10艘，都是宫人所乘。



隋代展子虔《游春图》

隋炀帝三次畅游江都，耗费无数财物。

隋文帝时，对威胁隋朝统治的西北少数民族，从实力出发，采取了一些办法，取得了各民族间的统一。

开皇十九年（599），隋朝对突厥采取和亲政策，以宗女安义公主嫁与都兰可汗之弟突利可汗，当时都兰可汗向隋朝求婚，反遭拒绝。于是都兰率兵进攻突利可汗。第二年，突利可汗战败降隋，隋朝封他为启民可汗。不久都兰可汗被其部下所杀，启民可汗尽占都兰故地，从此东突厥彻底归服隋朝。

西域方面的吐谷浑，由羌族和鲜卑族组成，据有今青海及新疆南部，北周及隋初，曾侵犯边区。开皇元年，隋文帝派元楷为行军元帅，击败吐谷浑，其王吕夸逃走，部众多数投降。大业五年（609），为了打通西方的商路，隋朝派观王杨雄和宇文述等，大败吐谷浑，降者十万余人。从此隋朝统一了西域，在西域设立了河源（今青海湖南境）、西海（今青海湖西岸）、鄯善（今新疆罗布泊西南）、且末（今新疆且末）四郡，调罪人为戍卒，开屯田，并运粮供应，以保卫西域的安全，维护国家的统一。

隋炀帝继位后，肆意向少数民族和外国炫耀自己的富强，企图使他们畏服。大业三年（607），突厥启明可汗入朝，看见洛阳的都城建设和各种精美文物，非常羡慕，请求改变服装实行汉化。同年，隋炀帝到达榆林，令宇文恺作大帐，帐下能坐数千人。当时启

民可汗率其所属奚、霫、契丹等部落酋长到帐下朝见隋炀帝。隋炀帝为他们大摆宴席，并欣赏散乐。他们看了又惊又喜，争着献牛羊表示敬礼。除了招待他们以外，炀帝又给启明可汗 2 000 匹锦缎，其他酋长也按等级送礼。隋炀帝又率大军出榆林塞，令宇文恺作行城和观风行殿，也就是制造临时的城市和宫殿。边区的少数民族看了非常奇怪，每逢看见御营，十里外就跪伏叩头，走路不敢骑马。

隋炀帝为了炫耀自己的富足，还命令裴矩利诱少数民族入朝。当时西域商人和酋长认为有利可图，便纷纷来到洛阳。炀帝令沿途州县招待他们，人民耗费甚大。大业六年（610），西域少数民族的使者和商人齐集洛阳。从正月十五日夜开始，在天津街开设了盛大的百戏场，给西域人演奏百戏。戏场周围 5 000 步，有 1 万余人奏乐，声闻数里，灯光照耀如同白昼，一直演了 15 天。

大业四年（608），隋炀帝下令大造兵器，制造不合格者判处死刑。同时征发全国农业劳动者当兵，集中涿郡。大业八年（612）发动第一次进攻高丽的战争。陆军分 24 路，各路军最后要在平壤集中。全军 1 133 800 名，号称 200 万，加上转运粮饷的民夫，近三四百万人。水路方面，大将来护儿统率的军队从东莱出发，浮海前进，舳舻相接数百里。水军登陆后，在距平壤 60 里处虽然打了胜仗，但进攻平壤时因纵兵大掠，被高丽打得大败。登陆的 4 万人只剩下几千人逃回船上，未等陆军来到，水军已逃之夭夭。

至于陆军，最初渡鸭绿江者 30 余万人，但由于士兵自带口粮，每人负重 3 石以上，战士疲惫不堪，只好弃粮而行。到后来又饥困交迫，终于被打败，几乎全军覆没。生还的只有 2 700 人。

这次战争虽然失败，但隋炀帝却一意孤行，又组织第二次战争。大业九年（613），陆军刚开到前线，国内便爆发了农民起义。在阶级斗争高潮的冲击之下，统治阶级内部也开始分化，大官僚杨玄感组织起反抗隋炀帝的大军，进攻东都。隋炀帝不得不从高丽撤兵，丢弃了所有军用物资。

大业十年（614），又发动第三次对外战争。但是由于当时各

地爆发农民起义，地方政府多留兵不发，路上的士兵也纷纷逃亡。高丽也不堪连年的战争，这年七月，来护儿又在高丽登陆，高丽王请降。隋炀帝就此班师。当他命令高丽王高元到隋朝受降时，高丽王拒绝了。隋炀帝也只好罢手。

大业十一年（615）三月，炀帝回到东都，部署镇压全国农民起义。但北方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隋炀帝只好退保江南，企图维持半壁河山。当时游江都的船只已被杨玄感烧掉，炀帝下令重新制造龙舟和各种船只数千艘。第二年七月，隋炀帝在一群佞臣簇拥下，逃到江都。

大业十三年（617），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燃遍全国，瓦岗军占领中原，辅公祏攻取江淮，隋军到处败北，炀帝已无力控制局势了。另一方面，隋炀帝到江都以后，下令修丹阳宫（今南京市），准备南迁。同时，命令王世充选江淮美女进宫，继续过着荒淫的生活。他的骁果卫士多关中人，天下大乱以后，他们怀念家乡，想要逃散。隋义宁二年（618）三月，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和直阁裴虔通等，利用卫士不满情绪，推举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为首，发动兵变，用丝带勒死了隋炀帝。隋朝的统治，就此结束了。

五、王薄和窦建德起义

暴君隋炀帝即位以来，进行无休止的横征暴敛，早已叫百姓透不过气来。三次征高丽的战争，全国规模的大征调，更使永济渠沿岸的村落，几乎找不到男丁。劳力缺乏，田园荒芜，再加上一场洪水，粮价涨了几百倍，人民靠树皮野菜充饥。他们忍受不了兵役、徭役和饥饿的折磨，纷纷揭竿而起。

大业七年（611），齐郡邹平（今山东邹平）人王薄，首先在长白山（今山东章邱）起义。

王薄自称“知世郎”，他以先知先觉自居，借以树立自己的威望。他作了《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人民起来反对隋炀帝，从而

得到人民的拥护。歌辞道：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长矟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类说》卷六百二十一《河洛记知世郎》条

王薄起义好像星星之火，点燃了全国农民战争的序幕，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火，便在全国各地燃烧起来。

隋统治集团陷入农民起义的大包围中。大业十二年（616），农民军经过五年多的奋战，由分散到集中，逐渐形成了以窦建德为首的河北起义军，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江淮起义军等几支强大的农民起义队伍。

窦建德是比较富裕的自耕农，他勇敢而且有谋略，在漳南乡间很有威望。当隋炀帝为征高丽而大征调的时候，漳南县令知他勇武过人，派他当二百人长。窦建德见炀帝穷兵黩武，料定天下必乱，所以劝贫农孙安祖起义。孙安祖聚众起义以后，隋政府怀疑窦建德和农民军有联系，就杀了他的家属。窦建德被迫参加蓨县（今河北景县）高士达起义队伍。窦建德才略过人，受群众拥护，高士达就让他当司马（管作战的），领导农民军作战。从此，高士达与窦建德成了漳南农民军的领袖。

大业十二年（616），当瓦岗军在中原不断壮大的时候，窦建德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河北也很快发展到1万余人。

大业三年（617），起义军与隋朝军队在七里井打了一仗，隋军战败。七里井战役是河北战场一次决定性的战役。这次战役以后，河北大多数郡县，都被窦建德领导的农民军占领。618年，窦建德改国号为夏，改元五凤。

唐武德元年（618）三月，宇文化及在江都勒死隋炀帝立秦王浩为傀儡皇帝，自称丞相，掌握军政大权，并以宇文士及为内史

令，智及为左仆射，在江淮成立独立政权。

武德二年（619）二月，唐将李神通在贝州一带打败宇文化及。窦建德抓住战机，大举围攻宇文化及，迫使他节节败退，最后龟缩在聊城。农民军集中兵力强攻，王薄眼看聊城危在旦夕，于是打开城门，迎接窦建德。建德进城以后，俘虏了宇文化及、肖后、义成公主、元武达、杨士达等，把宇文化及斩首示众。

这时，窦建德军处在极盛时期。夏王的政策最初和隋朝有显著区别，他们给农民减轻负担、劝课农桑。在清河一带修枯下渠入柳沟，与永济渠合流，促进了生产发展。曹旦等义军将领始终坚持革命精神，打击地主豪强，对敢于反攻倒算的地主豪强李商胡等坚决镇压。农民军的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在义军统治区内，“境内无盗，商旅野宿。”窦建德虽然是千军万马的领袖，却仍然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他不食肉，不饮酒，经常以粟饭蔬菜充饥。打仗得来的资财，除公用以外都分给将士，因此得到广大义军的拥护。这一带群众，长期怀念夏王，在他死后设立夏王庙（或窦王庙）悼念他。

六、瓦岗军威震中原

大业七年（611），滑县（今河南滑县）法曹翟让，不知犯了什么罪，被判刑下狱。当时管狱的小官黄君明同情他，偷偷地把他放了。翟让逃到滑县东南的瓦岗寨，在那里暂时隐蔽起来。恰好这里的农民正酝酿起义，缺乏首领，翟让一到，就被推举为领导者，起义便开始了。翟让的同乡单雄信、东阿人程咬金、浚县大伾山起义的徐世勣和内黄起义的王伯当，也先后统领所部和瓦岗军会合，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农民队伍。

不久，瓦岗军打下滑县和浚仪（今河南开封市），并西占郑州（今河南郑州市），东据宋州（今河南商丘）一带。曾参与杨玄感反隋的李密，由于杨玄感的失败而到处流浪，他为了寻找个人出

路，便投奔翟让。翟让接受李密的建议，主动联合周文举、李公逸等农民军，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瓦岗军发展到数万人。

大业十二年（616），瓦岗军从金提关出发，攻取黄河以南几县，打到荥阳外围。荥阳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荥阳的得失，直接影响中原战局。因此隋炀帝特派河南讨捕大使张须陀为主帅，前来镇压瓦岗军。张须陀曾多次镇压过农民军，他到达荥阳以后，立即和通守杨庆一道调兵遣将，抢占交通要道，妄图阻止瓦岗军前进。

面对隋军进攻的新形势，翟让、李密共同研究了对策。他们分析了敌方情况，根据张须陀骄傲、轻敌的弱点，决定由李密率主力埋伏在荥阳北面的大海寺两翼，翟让率兵从正面进攻。张须陀打败过翟让，非常藐视翟让。翟让把张须陀的两万人马拖到大海寺一带，全部歼灭。张须陀也被迫自杀。



瓦岗军开仓散粮

大海寺战役的胜利，使“河南郡县为之丧胆”。瓦岗军威震中原，所到之处，隋军有的望风逃窜，有的开城投降。登封（今河南临汝）、密县（今河南密县）、汜水等地，未动一刀一枪即被农民军占领。大业十三年（617）春天，瓦岗军决定夺取洛口仓。洛口仓又名兴洛仓，在巩县（今河南荥阳县西）东北部，伊、洛两水会合处。仓城周围有20余里，是当时最大的粮仓，城池坚固，常有重兵把守。进攻洛口仓的农民军兵分两路，一路由荥阳向西，从正面进攻。另一路由登封绕到洛口以南，从侧面袭击。两路大军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临城下，使隋军弃城逃窜。瓦岗军占领仓城以后，立即开仓放赈。饥民们奔走相告，无不感激！

大业十三年（617）二月，瓦岗军正式建立统一的政权。当时在瓦岗内部已混入大量降官，他们具有政治斗争经验，熟悉隋政府内幕，又善于运用各种手段进行拉拢，在农民军中形成一股势力。在这些人的支持下，大贵族李密担任了魏公兼行军元帅，执掌瓦岗军政大权。翟让任上柱国、司徒、东郡公，单雄信任左武卫大将军，徐世勣任右武卫大将军。中原的小股起义军，如王君廓、李士才、魏刀儿、李文相、孟让、郝孝德、王当仁等，都归附瓦岗军。“降者不绝如流，众至数十万。”李密为了巩固基地，令护军田茂广筑洛城，方40里，作为农民军的重要基地。同时派房彦藻向东扩大阵地，攻克了汝南（今河南汝南）、安陆（今湖北安陆）、淮安（今河南泌阳）、济阳（今山东曹县）。

这年四月，瓦岗军积极设法切断东都的补给线，准备夺取东都，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双方作战达40余次，其中较重要的是黎阳仓战役。

夺取黎阳仓的战役。大业十三年八月，徐世勣、郝孝德、李文相等合力打下了黎阳仓。开仓济贫，扩大影响，远近农民纷纷参加起义，“旬日间得胜兵二十万人”（《通鉴》卷一百八十四义宁元年条）。武安（今河南涉县）、义阳（今河南桐柏）、永安（今山西霍县洪洞）、弋阳（今河南潢川）守吏相继投降。

炀帝死后，宇文化及在江都立秦王浩为帝，掌握实权。越王杨侗也在洛阳称帝，以王世充为大将，有兵五六万人。

当时全国群雄割据，四分五裂，只有瓦岗军占据中原，势力较强，有可能夺取全国性胜利。但是正在这时候，瓦岗军发生了分裂。恭帝义宁元年（617）十一月，李密以宴请翟让为名，杀掉翟让和他的哥哥翟宏及王儒信等。徐世勣拔腿外逃，在门口被砍一刀。单雄信叩头求饶，李密才放了他。不久，徐世勣、王伯当率一部人回到浚县，驻守大狉山。瓦岗军的势力逐渐衰落。

武德元年六月，宇文化及率10万隋军北上，和窦建德、李密争夺中原。而东都的王世充，此时又集结兵力向瓦岗军进逼，李密腹背受敌，进退两难。就在这月，李密投降了杨侗，被封为太尉、尚书令。

李密降杨侗后，宇文化及进军荥阳以东，企图夺取黎阳仓，消灭徐世勣。由于农民军英勇善战，宇文化及未能得逞。当时李密为了讨好杨侗，率部大败宇文化及于童山下，迫使宇文化及只带两万残兵逃到河北。化及又被窦建德打败。李密打了胜仗，正准备到洛阳领赏，走到半路，王世充发动兵变，强迫杨侗封他为左仆射，又领两万人攻打李密。李密因久战疲惫，内部矛盾很大，偃师一仗，被王世充打败。这时王伯当仍据守河阳，徐世勣还在黎阳，假若李密投奔徐世勣，瓦岗军仍然可能东山再起。但是，他听信隋朝降官的劝告，领两万人降唐，后又反，武德元年（618）十二月被唐将盛彦师设计杀害。

七、杜伏威、李子通扫荡江淮

窦建德起义后第二年，杜伏威、辅公祏在长白山举起反隋旗帜。杜伏威是齐州章丘人，辅公祏是他的好友，齐州临济人。他俩生活都极端贫困，最初参加左才相起义军，但得不到信任，就离开左才相，自己组织队伍。杜伏威强悍有力，大公无私，在作战中"出则居前，入则殿后"，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大业十年（614），齐郡一带农民起义遭张须陀的围剿，左孝友部失败。屯军祝阿（今山东长清县东北）的卢明月，也在这年年末被张须陀击溃，残部向河南方面转移。在这样情况下，杜伏威、辅公祏也离开齐郡，转向淮河流域。

十二月，杜伏威到达淮北。这时苗海潮领导下的农民军在下邳（今江苏邳县）活动。杜伏威为了壮大力量，派辅公祏劝说苗海潮合力抗隋，并表示：如果你能当主帅，我们就听你指挥，假若你觉

得无力领导这样大的队伍，就听我们指挥。再不然就两军较量一下，谁强就服从谁。苗海潮兵力较弱，只好和杜伏威合并。

两军合并后，杜伏威向淮南进军，准备包围江都。江都通守派宋颢前来镇压。杜伏威诱敌深入，把敌人引向芦荡，然后从上风纵火，迫使隋军陷入大泽，消灭了很多隋军，取得反击战的胜利。

江淮地区另有一支李子通领导的农民军。李子通是东海（今江苏连云港）人，家贫贱，以渔猎为业。平时，他经常扶老携幼，见义勇为。大业九年（613），他在长白山参加左才相起义。由于李子通不好杀人，所以“人多归之”，半年之间，部众发展到 1 万余人。后来他和左才相发生矛盾，自己引兵到达淮南，并且一度和杜伏威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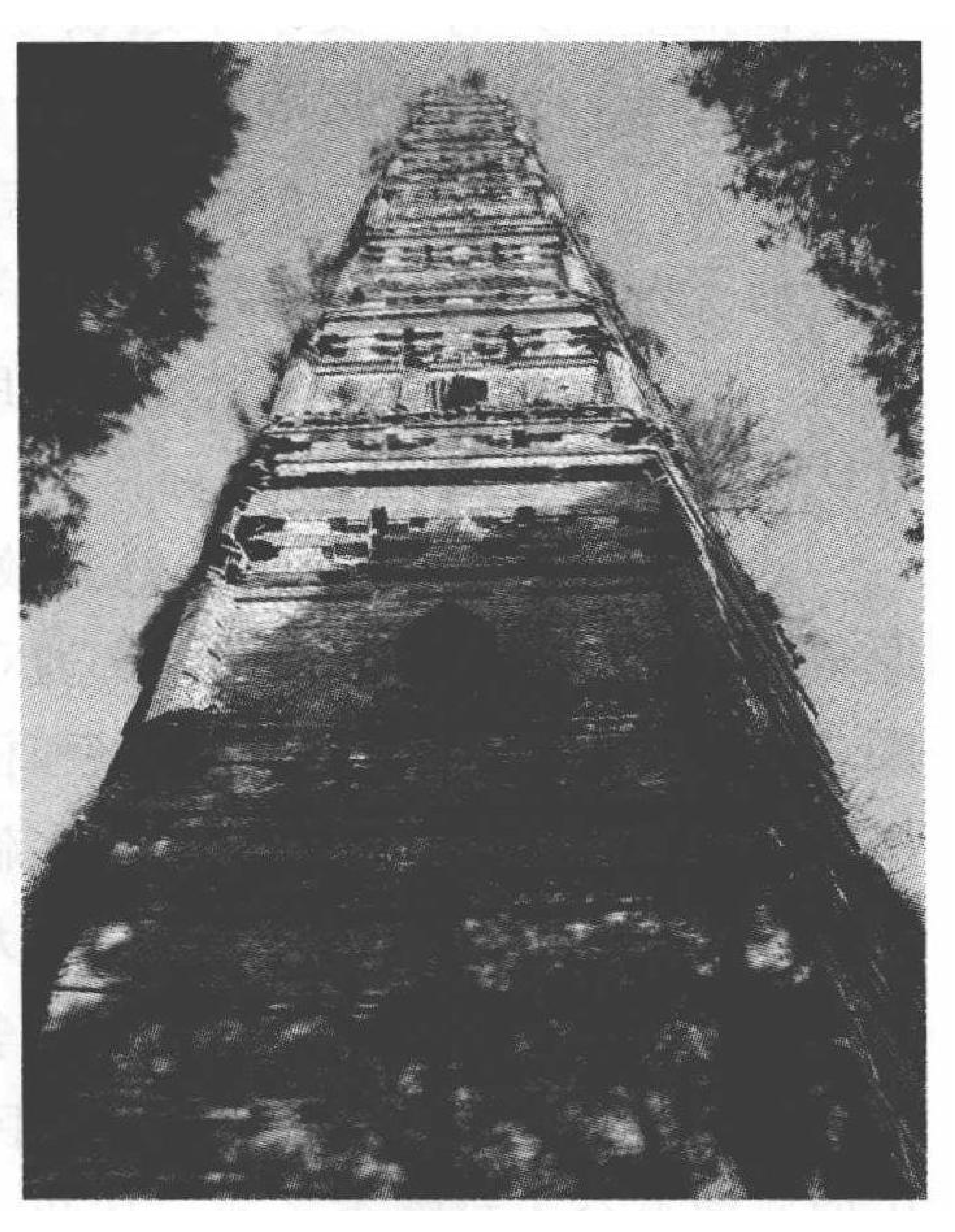
武德元年（618）三月，江都政变，宇文化及带领十万人到中原争夺天下，他任命陈稜为江都通守。由于江都空虚，李子通乘机围攻陈稜。陈稜向大士族沈法兴和杜伏威求救。当时沈法兴正屯兵扬子（今江苏仪征），杜伏威在清流，他们之间相隔数十里。沈法兴招募江南流民，夜袭杜伏威，扩大了沈法兴和杜伏威的矛盾，因而无力协助陈稜，从而江都孤立。李子通猛攻陈稜，攻克江都，称帝，国号吴，年号明政。这样，农民军的声势大振，又有隋丹阳守乐伯通率万余人投降李子通，从此，这支农民军的势力便扩充到长江以南。

武德三年（620）十二月，杜伏威派辅公祏围攻李子通。这时李子通的部众甚多，超过对方 10 倍以上。但辅公祏智勇双全，他精选甲士千余人，各执长刀打先锋，另以千余人殿后，有临阵懦怯者立即斩首。辅公祏亲自督战，双方战斗非常激烈。结果李子通大败，降者数千人。李子通食尽，放弃了江都，渡江到了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杜伏威进占丹阳。李子通奔向太湖区域，扩充农民军达两万余众，准备攻打沈法兴，夺取浙北地区。

沈法兴是吴郡大族出身，曾任吴兴（今浙江吴兴等县）太守。他以诛宇文化及的名义扩大武装，掌握精兵 6 万，占领了吴郡、余

杭（今浙江杭州市）、毗陵（今江苏常州市）等10余郡，武德二年（619）八月自称梁王，改元延康，署置百官。武德三年（620），李子通渡江攻沈法兴，取京口。沈法兴败走奔吴郡，又被李子通袭破，部下也纷纷反对他，最后投江自尽。李子通乘机占领沈法兴故地，占有“北自太湖，南至岭，东包会稽，西距宣城”地区。

武德四年（621）十一月，唐政府平定中原，向江南进军。这时杜伏威、王雄诞已降唐，王雄诞奉命镇压李子通。李子通被俘，被解送长安。


浙江天台国清寺古塔

江淮农民起义的最后阶段是辅公祏的反唐斗争。

武德二年（619），杜伏威降唐，五年被留居长安。他离开丹阳的时候对辅公祏、王雄诞说：“我到长安以后，如果他们保我人身安全，并且有了官职，你们也共同归唐。否则一定要坚持反唐，不要放下武器。”后在长安被毒杀。

隋末农民起义是唐朝以前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起义。这次起义狠狠打击了士族门阀及反动官员，从此“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俗，或乖德义之风。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唐会要》卷八十三）。“关东魏齐旧姓……皆沦替”（《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另一方面，由于隋朝政权被推翻，部分地主死亡流徙，有些农民取得土地，唐初个体自耕农显著增多。与此同时，过去被严格控制和奴役的部曲、佃客，多在农民战争中争得人身解放。这次农民大起义，又推动了唐初的政治改革，“贞观之治”就是在隋末农民战争推动下出现的。

第二章　唐朝的盛世

从唐朝建立到安史之乱爆发，共137年，这是唐朝的盛世。因为这个王朝是在隋末农民起义后建立起来的，所以唐初的统治者，对人民力量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认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贞观政要》卷一《君道》)。假若不采取妥善措施安抚百姓，给群众以必要的生产生活条件，就有可能像隋末那样，激起百姓的反抗。因此唐初轻徭薄赋，励行均田，改善吏治，严明赏罚。这就缓和了阶级矛盾。同时还实行府兵制、科举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经济、文化大繁荣，形成“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出现了唐朝盛世。

一、晋阳起兵和定鼎关中

——唐朝的建立

隋末农民战争爆发以后，各地有不少官僚豪强乘机脱离隋朝统治，扩大自己的势力，准备夺取政权，其中最主要的是李渊集团。

李渊原来是西魏柱国大将军李虎之孙，其父李昞，曾任北周安州总管，袭封唐国公。隋朝建立以后，李渊先后任谯州（今安徽滁县)、陇州（今陕西陇县)、岐州（今陕西凤翔）刺史。大业九年（613)，杨玄感起兵反隋，炀帝调渊为弘化（今甘肃合水）留守，节度陇右诸军。大业十一年（615)，李渊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镇压毋端儿起义。大业十三年初，李渊以太原留守兼晋阳宫

监。晋阳（今山西太原）是军事重镇，兵源充足，“食支十年”。因此，李渊“私喜此行”，到达晋阳后，在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的形势下，便准备夺取政权。他令长子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令次子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他们“倾财仗施，卑身下士，逮乎鬻僧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就这样，李渊为起兵反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摆在李渊面前的问题是：怎样消灭隋朝在河东的残余势力，夺取长安？怎样防止突厥在背后的袭击？刘文静建议暂时和突厥妥协，避免腹背受敌两面作战。李世民同意这个意见，并提出占领河东以后夺取关中、在长安站稳脚跟后再反击突厥的作战方针。

李渊立即派刘文静出使突厥，给始毕可汗送去金帛，还把李渊的红旗改为红白狼头旗，表示臣服突厥，并且与始毕可汗约定，将来同突厥共定京师后，长安土地归李渊，子女财帛归突厥。始毕可汗喜出望外，立即遣使晋阳，送马千匹。

大业十三年（617）七月，李渊正式建立了独立政权，自称大将军，开府置官。任裴寂为长史，李建成为陇西公兼左领军大都督，李世民为陇西公兼右领军大都督。刘文静、武士彟、唐俭、姜謩、长孙顺德等都参与大将军府工作。晋阳囤积的数百万斛粮食、数万匹杂缯，都由李渊控制。李渊父子率甲士3万人从晋阳出发，李元吉留守晋阳。

隋朝代王侑驻守长安，闻李渊宣布独立，立即派宋老生、屈突通加强河东防务，把主力部署在霍邑（今山西霍县）一带，阻击李渊。七月以后，李渊先打败高德儒，夺取了西河郡。八月，大败宋老生，夺取了霍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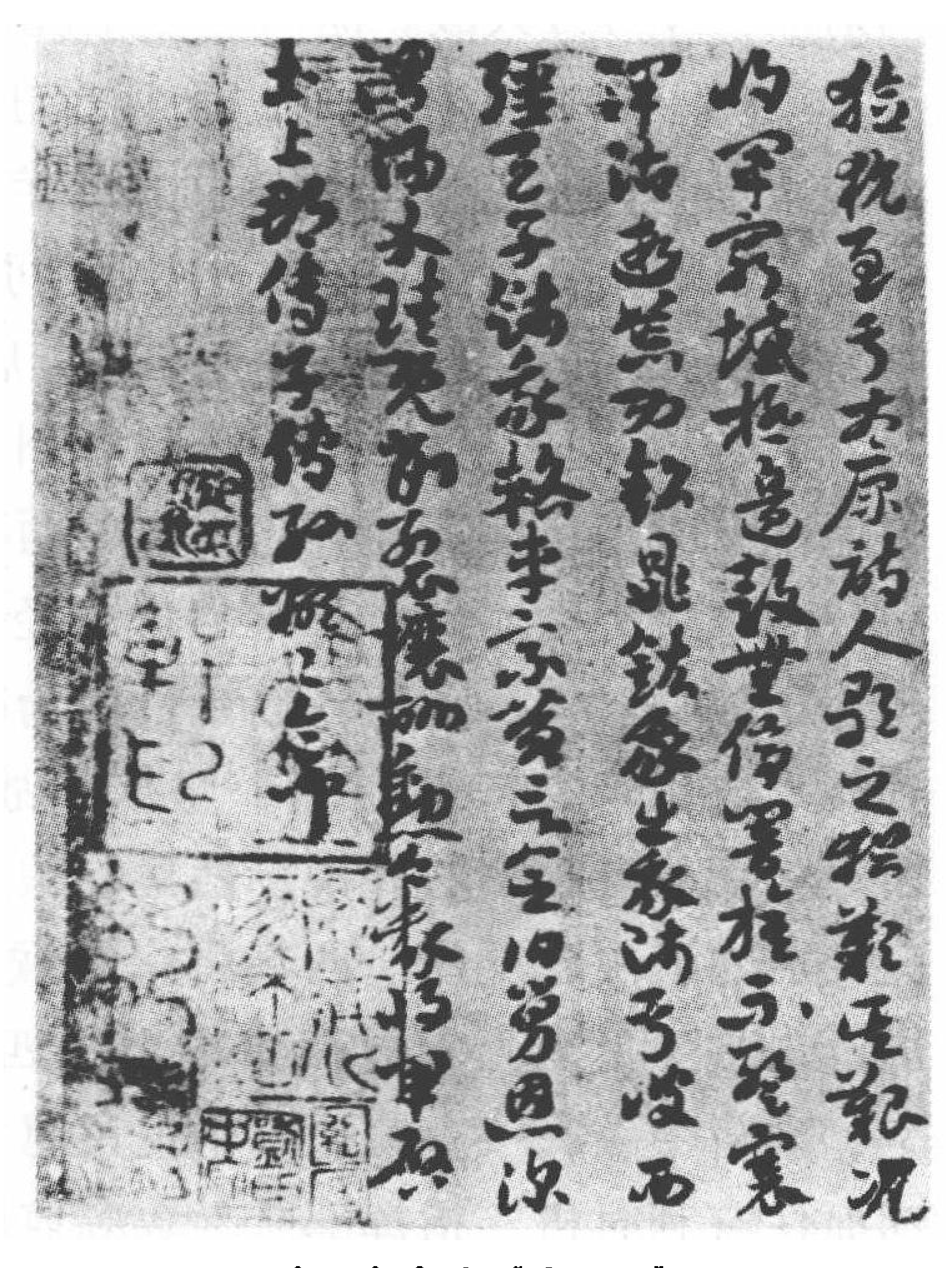
大军在霍邑休整十余天后，进围临汾（今山西临汾），隋兵迎降。不久，绛州（今山西新绛）郡守陈叔达也当了李渊幕僚。河东各县一举平定，成了李渊经营关中的根据地。

李世民渡过黄河以后，领兵西进，沿途小股反隋军队，都归服

李世民，到达泾阳（今陕西泾阳）的时候，部众增至 9 万余人。当时有隰城（今山西汾阳）县尉房玄龄来降，李世民和他一见如故，引为谋主。正在这个时候，平阳公主带领娘子军来会见李渊。从此以后，娘子军便归李渊统一指挥，全军扩大到 20 余万人。

李渊和平阳公主会师的时候，隋朝的代王侑正据守长安，杨侑当时只有 13 岁，辅佐他的是京兆内史卫文升。卫文升已经是年过 70 的老官僚，他听说李渊的军队兵临城下，忧惧成疾，不能视事。负责防守的只有左冯翊将军阴世师和郡丞骨仪。长安城里的隋军虽然人数不多，但工事却很坚固，易守难攻。

李渊率兵到达长安城郊以后，立即对守城将士宣称：拥护代王侑，愿与隋军共同防守关中。并下令入城后保护代王侑和隋宗庙。当时炀帝还在世，李渊准备利用隋朝旗帜，挟天子以令诸侯。



隋人书索靖《出师颂》

隋军不听，李渊下令攻城。军头雷永吉等利用云梯首先爬上城墙，后继部队跟着破城，杀败守军，攻克长安。

长安内史卫文升，听说李渊打进来，活活被吓死了！代王杨侑仍在东宫，保卫他的卫队早已逃散，只有侍读姚思廉陪伴着他。

恭帝义宁元年（617）十一月，李渊进入长安，宣布约法十二条，取消炀帝苛法。把拒不投降的阴世师、骨仪等隋将领枭首示众，并释放囚徒。然后，拥立杨侑，即位大兴殿，改元义宁，尊炀帝为太上皇。李渊自号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封唐王，以武德

殿为丞相府。令其长子李建成为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秦公，李元吉为齐公，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

武德元年（618）三月，江都兵变，隋炀帝被杀，宇文化及立秦王浩为傀儡皇帝。五月，李渊闻讯和李世民、裴寂等密商后，精心导演一场禅让的闹剧，代王侑退位，李渊当了皇帝，改国号称唐，年号武德，定都长安。任李世民为尚书令[①]，封秦王。裴寂为右仆射[②]，刘文静为纳言[③]，萧瑀为内史令[④]。

李渊定都长安以后，当时关陇方面最大的威胁是陇西薛举。薛举是陇西土豪，任隋朝的金城校尉。义宁元年（617）七月，薛举囚金城令，自称西秦皇帝，并立他儿子薛仁杲为太子。薛仁杲善于骑马射箭，绰号万人敌。他们占领了陇右各县。武德元年六月，薛举进攻泾州。李世民奉命领总管兵反击。薛举进逼高墌（今陕西长武）。当唐军到达高墌时，李世民因疟疾发作，由刘文静、殷开山指挥战争。刘文静中计，大败。唐将刘弘基、李安远、慕容罗睺被俘，“士卒死者十五六”，唐兵退还长安，唐高祖罢了刘文静的官职。

八月，薛举又派薛仁杲进攻宁州（今甘肃宁县），被刺史胡演打退。此时薛举病死，薛仁杲当了西秦皇帝。唐秦州刺史窦轨奉命讨伐薛仁杲失败。薛仁杲乘胜进攻泾州（今甘肃泾川），唐将刘感出战，战败被俘。高祖就以李世民为征西大元帅，反击西秦。唐军到达高墌以后，养精蓄锐，坚壁不战。双方对峙 60 余天。不久，西秦将翟长孙来降，并说，西秦缺粮，无力再战。李世民认为战机已经成熟，决定反击。西秦将宗罗睺由于长时间作战，疲劳不堪，加上口粮不足，无力再战，不少人四散奔逃。李世民增派两千劲卒，亲自带领，一直穷追。李世民舅父窦轨劝他不可轻进，李世民却抓住有利时机，指挥部队猛攻高墌城。

薛仁杲最初在城外列阵，隔泾水与唐军对峙。西秦的骁将浑干

---

① 尚书令：尚书省长官，即宰相。

② 右仆射：尚书省副长官，副宰相。

③ 纳言：门下省长官，后改称侍中，宰相。

④ 内史令：中书省长官，后改为中书令，宰相。

等，夜间偷渡泾水，投降唐军。薛仁杲军心不稳，引兵退入城内。在唐军围攻下，深夜里，秦军多缒城投降，薛仁杲知自己大势已去，武德元年十一月，奉表请降。

征西元帅李世民胜利入城，收俘虏万余名，男女百姓5万余。从此，陇东地区，置于唐政府统治之下。

二、镇压义军统一天下

李唐王朝定都长安以后，潼关以东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窦建德的农民军在河北建立夏国。辅公祏、杜伏威占领江淮，自称吴国。东都王世充击溃了瓦岗军，于武德二年四月自称郑国皇帝。长江中游，还有萧铣割据。刘武周被突厥封为定扬可汗，占了晋阳，并向汾水下游进犯，威胁关中的安全。

武德三年（620）五月，李世民打败了刘武周，收复了晋阳，稳定了河东的局势。

关中两面的威胁基本解除后，唐政府进攻的锋芒，便指向中原。

武德三年（620）七月，秦王率领唐军东进。第一个劲敌就是王世充。唐军对王世充的作战方针，大体采取两个步骤：一是打东都外围据点，设法切断其补给线。二是包围洛阳，全歼守军。

王世充听说唐军压境，大为惶恐，特派其亲信防守要地。王世充又怕他的部队投降，特立禁约，宣布一人失踪，杀其全家。武德三年（620）末，汴州、荥州、隋州、许州等地全部被唐军占领。王世充的补给线，基本上被唐军切断。

在聊城战役以后，窦建德军继续向南发展，武德四年（621）初，攻下了周桥（今山东城武县），吞并农民军孟海公部。

正在此时，秦王李世民率领大军讨伐王世充，包围了东都。窦建德为了保全自己，向西扩充地盘，于是决定出兵支援王世充。这年二月，窦建德指挥大军挺进中原，攻下了管州（今河南郑州一带）、阳翟（今河南禹县）等地。

窦建德与王世充合作的消息传来以后，对唐军有很大影响，将

领们对战局产生不同看法。肖瑀和封德彝认为：现在窦建德乘打败孟海公之威，士气旺盛，锐不可当。而我军战线太长，东西两面作战，腹背受敌，主张暂时退至新安（今河南新安），进行休整，等待良机，再行决战。郭孝恪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王世充现在是日暮途穷，势将必降，目前我军仍旧要固守武牢，伺机进攻，必能破敌。薛收认为：王世充据守东都，府库充实，部下皆江淮精锐，勇敢善战，只因缺乏粮饷，所以困守孤城，坐以待毙。现在窦建德和他联合，运粮相济，恐怕贼势更强，战争将旷日持久，前途不堪设想。请分兵固守东都，深沟高垒，不与争锋，秦王亲率精锐，先据成皋，以逸待劳，一定能打败窦建德。窦建德如果失败，王世充必然投降。

李世民采纳了薛收的意见。他根据新的形势，调整了作战部署。首先，从武牢召回屈突通，叫他辅佐李元吉，继续围攻东都。秦王自己则亲率徐世勣、秦叔宝、尉迟恭等，到武牢阻击窦建德。

这时窦建德领导的农民军已达成皋东原，筑宫板渚（今河南汜水），作为行辕，并且派人通知王世充。唐将王君廓率轻骑千余，切断农民军的粮道，俘虏其大将张青特，给窦建德以很大打击。此时有人给窦建德建议，叫他攻取怀州、河阳，进入汾晋，夺取关中，如果唐军腹背受敌，他们可能从中原撤兵。窦建德拒不接受这个建议，贸然进攻武牢。他调齐人马，从板渚出牛口，列阵20余里，擂鼓而进，被唐军打败，死伤五六万人，自己也做了俘虏。王世充也投降了唐朝。唐兵进入洛阳。

窦建德的部众除了被俘或牺牲者以外，还有一些人解甲归田。唐政府强迫窦建德部将董康买、范愿、高雅贤、刘黑闼等到长安报到。范愿说："我等至长安，必无保全之理。"于是大家一致推举刘黑闼为首，于武德四年（621）七月，在漳南二次起义。第二年正月，进取洺州，黑闼自称汉东王。在这一年内，连续打败河北唐军，恢复了夏王时期的故地，取得了重大胜利。

李世民到河北镇压刘黑闼起义。决战于洺水的农民军惨遭失败。唐政府统一了中原各地。

河北的刘黑闼二次起义失败以后，全国多数农民军都被唐政府

镇压下去，只有辅公祏、张善安在江南继续战斗。武德六年（623）十一月，朝廷派赵郡王李孝恭率领强大水军直奔江州（今江西九江）；岭南道大使李靖督交广步骑北上宣州（今安徽宣城）；怀州总管黄君汉从谯亳出发；齐州总管李世勣从泗水引兵入淮。四路大军集中兵力围剿辅公祏。当时唐军方面的作战方案首先是除掉辅公祏羽翼，控制长江中游。十二月，江南安抚大使李大亮奉命攻打洪州（今江西南昌市）。他利用欺诈手段使张善安脱离自己队伍，然后抓住他，瓦解了这支反唐武装。



李 渊

在丹阳，李靖打败辅公祏，辅公祏见大势已去，弃城逃走，后在武康（今浙江吴兴）被俘，慷慨就义。到这年为止，唐政府终于统一了天下。

三、玄武门之变

唐高祖李渊的皇后生了4个儿子，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玄霸（早亡），四子元吉。太子建成经常在长安，辅佐李渊处理军国大事。次子世民却常领兵出征，不断平定割据势力，镇压各地农民起义，以扩大唐政府的占领区，对唐朝立有很大功劳，威望甚高。但李建成是长子，按着传统的宗法制度，他应是李渊帝位的继承者。秦王李世民既有战功，野心又大，也想当皇帝，因此他们兄弟间争夺皇位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在双方斗争中，齐王元吉是站在太子一边的。他们双方从地方到中央展开激烈争夺。

在地方上太子和李世民也都设法培植自己的势力，李世民在平定王世充和镇压农民军时，积极招纳山东豪杰。太子建成在河北作战时，也极力拉拢罗艺，利用他在河北发展势力。

由此看来，到武德末年，在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太子建

成和秦王世民，已经形成两个集团，唐高祖李渊是支持太子的。这两个集团在政治上存在很大分歧。李世民赏罚严明，注意论功行赏。例如武德四年（621）在中原打败王世充以后，当时因淮安王李神通有战功，李世民以陕东道行台身份赐他数十顷田地。而李渊宠妃张婕妤的父亲却依仗裙带关系，从李渊那里弄去一道勅令，强迫李神通退田给他。其次，对待突厥的侵犯，两个集团也持不同态度。武德七年（624），颉利可汗从原州（甘肃固原）南侵，进逼关中。李渊、李建成、元吉、裴寂等都主张焚毁长安，迁都襄邓，并且派人外出勘查地形。当时李世民挺身而出，坚决反对迁都，主张严厉打击突厥，制止了李渊、李建成的妥协活动。

武德七年以后，全国已经统一，唐王朝的统治地位已相当稳固。于是太子和秦王争夺皇位的斗争日渐更加明朗化。

在一个霪雨连绵的下午，秦王正在专心致志地阅读兵书，忽有卫士进来报告："太子派人投书。"秦王拆开一看，原来是太子请赴宴。王府亲随劝秦王提高警惕，最好不要去。秦王认为：过去兄弟之间虽然发生矛盾，也许还不会达到谋害同胞的地步，于是便前往东宫。

太子准备的宴席非常丰盛。席间太子和齐王频频举杯劝酒，不断颂扬李世民的武功。喝着谈着，忽然，秦王觉得头晕目眩，两脚发软。秦王情知不妙，他挣扎一下想站起来，但身不由己地倒在地上了。这时窗外大雨滂沱，惊雷闪电映照在秦王惨白的脸上，非常可怕。齐王看见他二哥倒下，便紧张起来，赶紧问太子："这，这，怎么办?"太子把眼睛一瞪，喝道："慌什么？派人送回去。"

李世民回到秦王府，灌了许多解毒药，吐了不少苦水，才保住性命。皇帝晓得这件事以后，狠狠地申斥了太子一顿。

太子见秦王没死，还不甘心，就怂恿皇帝到郊外打猎，并要求秦王陪驾前往。父皇命令，秦王只好跟随出行。

太子叫部下给秦王备了一匹烈性马。秦王没有想到太子又在耍阴谋，在打猎场上，纵马操弓，追赶一头鹿。突然，烈马野性发作，仰颈狂跳，把秦王甩出一丈多远，险些摔死。

秦王府的兵精将猛，是众所周知的事。为了削弱秦王的势力，

太子和齐王绞尽脑汁设法瓦解秦王的队伍。凡是有调兵遣将的机会，他总是竭力设法把秦王的部将调开。

秦王李世民针锋相对，也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武德九年（626）他曾派张亮带领1 000余人，带着大量金帛到东都一带，“阴引山东豪杰”。在设法争夺太子的人员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效果。

武德九年（626）六月的一天夜里，在秦王府的内殿，高烧着红烛，殿外站着一列卫士，秦王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秦王和长孙无忌走进内殿，后面跟着两个身穿道服的人，卫士正想拦阻，秦王对卫士挥一挥手，就放他们进去了。两个穿道服的，正是秦王邀来的房玄龄和杜如晦，他们是为了躲避别人耳目特意化了装的。

紧接着，尉迟恭也进来了。房玄龄先发言：“目前太子和齐王日夜想谋害大王。一旦发生事变，不仅大王有生命危险，社稷更不堪设想。俗语说得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现在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希望大王以果断方式消灭未来的祸乱。”

杜如晦表示支持。

秦王说：“不知有多少人这样劝我，难道一定不能避免流血吗？我们还有其他办法没有？”

尉迟恭怒气冲冲地说：“现在和大王最亲近的只剩我们几个人，齐王还在皇帝面前耍阴谋，说我会打仗，要我率领精锐部队跟他出征。有朝一日我带部队离开秦王以后，大祸就要临头。请大王快下决心，先发制人，否则为人所制。”

这时卫士进来报告说东宫的官员王晊求见。

秦王会过王晊回到内殿，按捺不住心头怒火，说：“王晊从东宫来告密，说：太子和齐王已计议好，最近齐王出征，想借给齐王饯行的机会，席间杀我。真没想到，太子的手段竟这样毒辣！”

“王晊是深明大义的人，东宫传来的消息当然是千真万确的了。”长孙无忌说。

秦王慨叹道：“我总希望王晊讲的不会变成事实。”

“大王，先发制人，后发为人所制。现在大祸迫在眉睫，对太子不能抱任何幻想了。”房玄龄说。

尉迟恭愤慨地说："等太子发动时，大王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应付呢？假若大王不立即采取行动，我情愿上山去当土匪，不愿再跟从大王了，免得被太子抓去杀头。"

"大王如果不接受我们的请求，不设法除掉太子，我们也和尉迟恭一道当土匪去了。"几个人同声说。

最后，秦王感叹地说："既然如此，我也不好违反大家的意志。"

第二天日上三竿，只见太子和齐王骑着马，带领卫士，缓步走进玄武门。把守玄武门的中郎将常何等他们走远了，迅速把门牢牢关闭，埋伏在门内的秦王士兵把太子和齐王一起杀死。


李世民

这时，太子的翊卫车骑将军冯翊和冯立闻讯率东宫2 000 余骑赶来。由于中郎将常何投向秦王，守门卫士拒不开门，门外的守军奋力抵抗。副护军薛万彻等见到在玄武门外战斗无济于事，便想调转马头进攻秦王府。正在这个时候，尉迟恭用长矛挑着太子的人头跑出玄武门，向太子的残兵败将喊道："奉皇帝陛下敕令，杀了太子和齐王。我们只杀罪魁祸首，不杀好人，希望你们赶快放下武器。"冯翊和谢叔方见了太子和齐王的首级，呆若木鸡。秦王又高声喊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太子和齐王已被斩首，你们何必替他们卖命呢？"东宫的将士听到秦王的劝告，都纷纷放下武器。薛万彻不听劝告，带着数十骑，杀出阵外，奔终南山去了。谢叔方眼看太子的人马逃散投降，下马号啕大哭，秦王以好言劝慰，并赦他无罪。

对于太子集团的其他文臣武将，只要他们表示愿意和秦王合作，也都被任用，并给以应得的礼遇。秦王这样做，团结了大多数，扩大了他的政权的基础。

数日后，唐高祖李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且宣布："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奏闻。"李世民实际上已经当了皇帝。七月，重新改组中央政府，任房玄龄为中书令，高士廉为侍中，封德彝为尚书右仆射。第二年正月，改元贞观，李世民当了名实相符的皇帝。

四、纳谏与任贤

——"贞观之治"第一

从贞观元年（627）到二十三年（649），是唐太宗统治时期。史家称这一段时期的统治为"贞观之治"。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在封建社会闪烁着特异的光彩。它的出现，和唐太宗肯于兼听纳谏有密切关系。

唐太宗的注意纳谏，和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太宗的个人经历有密切关系。隋末农民起义，地域之广，规模之大，都超过前代，显示了极大的威力。唐太宗亲眼看到隋朝的灭亡。他总结隋亡的原因是因为炀帝荒淫无度，违背君道，而"臣下钳口"，皇帝"不闻其过"，更不能及时改过。炀帝不是没有才能的，但他"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最终，不免灭亡。这些教训，使他铭刻于心。他认为人君即令是"圣哲"的，也应当"虚己以受人"。这样才能"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因此他特别重视"纳谏"，其中最突出的，有以下几件事。

武德九年（626），太宗派使臣征兵，封德彝建议：中男虽未满 18 岁，身强力壮的也可当兵。唐太宗批准了他的建议，已经写好了诏令。但是魏徵坚持认为不能这样做。唐太宗很生气，对他大加指责。魏徵回答说："竭泽而渔，暂时虽然有鱼吃，但是，一次把大小鱼都捞尽了，以后就无鱼可捕。同样道理，假若毁林打猎，虽然暂时可得来不少野兽，但是将来就永远打不到野兽了。如果叫

全国的中男都去当兵，那么租调徭役由什么人负担呢？况且兵不在多，全在统帅得当，何必拿幼小的人凑数呢?”唐太宗一想，魏徵说得很有道理，便接受了他的意见，撤销关于中男当兵的诏令。

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打算到洛阳巡游，于是下令修洛阳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反对，他说：因巡游东都，先修宫室，这不是当前的急务。当年平定王世充时，凡隋朝宏大奢侈的宫殿都拆毁了，取得了人民的拥护。现在还不到十年，又建豪华的宫殿，为什么以前的坏事，又去学他呢？关中是全国的要地，应千方百计设法使其保持稳定。目前民生凋敝，陛下这样做，就是走隋炀帝的老路，那弊害，恐怕比隋炀帝时还甚呢。

唐太宗回答说：“你说我不如隋炀帝，比夏桀、商纣怎样呢?”张玄素说：“如果这项工程不停，将来的命运和商纣同样可悲。”唐太宗接受了张玄素的建议，说：“这是我考虑的不周。既然如此，就停建吧。”

唐太宗纳谏的事例很多。他不仅能纳谏，并且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大臣评论朝政，提出改进意见。例如：太宗登基不久，上朝的态度十分严肃，弄得大臣们战战兢兢，很长时间没有人敢发表意见。唐太宗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主动改变作风，自己有意识找大臣交谈，摆出一副和颜悦色的面孔，以减少大臣的畏惧情绪。对敢于批评朝政的大臣，给予赏赐。有一次，唐太宗准备把元律师判处死刑，当时孙伏伽不以为然，批评太宗说：“元律师没犯重罪，陛下判刑过严，实际这是滥加酷刑。”他接受了孙伏伽的批评，并且把价值一百万的兰陵公主园赏给他，有人议论说：“赏赐得过分优厚了。”唐太宗说：“我从登基以来，大臣没有敢批评朝政的，这次厚赏孙伏伽，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关心朝政多提意见。”

其次，唐太宗为了给大臣创造批评朝政的条件，建立了一种新制度，即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实行这种制度以后，谏官能及时了解朝政内幕，宰相不敢谎报政绩。军国大政如果有错误，谏官有权当面指责。同时，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可以及时了解皇

帝和宰相的言行，然后根据第一手材料编写起居注，对于封建统治者是一种监督。

另一方面，唐太宗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叫臣下把意见反映出来。一是令文臣武将写书面材料；二是太宗自己先提出具体问题，主动听取大臣的意见；三是组织大臣进行辩论，择善而从。例如，贞观九年（631），太宗令文武大臣写书面材料评论朝政。当时有个叫马周的人，在中郎将常何家做客。常何本人目不识丁，于是请马周代笔，写出20条建议。唐太宗看了常何送来的书面意见，表示非常满意，并且嘉奖了他。常何面红耳赤地说："臣下不会写字，这些意见是我的客人马周代笔的。"太宗立即召见马周，和他谈了一席话以后，提拔他任监察御史，后来还当了宰相。



魏　徵

兼听纳谏以外，唐太宗还注意任用贤才。唐太宗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他经常和大臣们讨论用人问题。他曾对魏徵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竟进矣。"魏徵也说过："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通鉴》卷一百九十四）。这也就是唐太宗用人的标准。他从执政以来，就千方百计搜罗人才。他听说景州录事参军①张玄素有才，便亲自召见，问以治国之道，玄素对答如流，太宗点头称赞，提拔他当了侍御史。

另一方面，太宗注意从官员的实际表现中考察发掘人才。例如，贞观八年，太宗修洛阳宫，当时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疏犯颜直

---

① 录事参军：州府内属官，掌州府各部文簿及官员表现，是正七品或八品官。

谏，太宗认为此人忠直可嘉，立即提拔为监察御史（中央管监察各级官员的下级官职）。贞观十四年（640）冬十月，唐太宗到东都附近狩猎，县丞刘仁轨不以为然，他说："今秋大稔，民收获十才一二，使之供承猎事，治道葺桥，动费一二万功，实妨农事。"太宗听了很受感动，立即停止打猎，并提升刘仁轨为新安县令。

唐太宗用人的另一个特点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他以"四海为家"，从各方面网罗贤才。魏徵跟从过李密和窦建德，以后又充当李建成的谋士，曾策划消灭秦王。玄武门政变以后，唐太宗却毅然任用他为谏议大夫，以后又提升为尚书右丞。李建成的其他部下如王珪、薛万彻及一些农民起义领袖，如李勣、程知节（咬金）、秦琼等，也都被太宗任用，并取得高官显职。

唐太宗不仅重视京官，而且重视外职。他认为都督刺史是亲民之官，"实理乱所系，尤须得人"（《贞观政要》卷三《论择官》）。他把全国各州刺史的姓名都写在屏风上，随时记下他们的善恶事迹，以备赏罚。贞观八年（630），还派遣李靖等13人为黜陟大使，到全国各地巡查，对有功的官员予以升迁，对贪污失职的官员加以惩罚。

五、"国家大事唯赏与罚"

——"贞观之治"第二

唐太宗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加强法治，限制贵族官僚恣意横行。这些活动，有利于社会发展。

唐太宗认为：赏罚是国家大事，假若被赏的是有功的人，无功者自然后退了。犯罪的人及时受惩罚，那些作恶的就能悬崖勒马。由此可见，赏罚问题必须严肃对待。可见唐太宗非常重视法治，他把法治作为施政纲领，用赏罚两种手段推动各种事业前进。为了明确赏罚的标准，他首先抓了国家立法工作。任命长孙无忌和房玄龄

修改《武德律》，制定《贞观律》。《贞观律》中的刑罚，比《隋律》减轻了一些。其中去掉了死刑92条，减流为徒者71条，其余变重为轻者也很多。后来长孙无忌又组织19名法学家，专门为《唐律》作注，到永徽年间完成，即《唐律疏议》。这是封建社会最完备的法典，五代以后各朝法律大都以此为本酌加增改。

此外，唐初又定“令”1 546条。所谓“令”，就是国家的制度和政令。同时还修改了武德九年（626）的制敕，把3 000条精简为700条，称为“格”。“格”就是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作为考核官员的依据。最后又定出尚书各部和诸寺、监、十六卫的工作章程，称为“式”。“律、令、格、式”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国家政治制度到社会经济生活，以及民间的婚丧嫁娶等方面，都有详细规范。凡是违犯“律、令、格、式”的，“一断以律”。所谓“律”，就是刑律，是用以定刑判罪的条例。

唐太宗的立法思想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强调立法要慎重、稳定和简明；二是法律和伦理道德相结合。他反对经常变更法律，变更多了必然陷于繁琐，以致使执法人员无法遵循，具体执行时容易营私舞弊。另一方面，太宗主张简化法律条文，反对把一种罪分为很多条。在他的思想指导之下，唐初法律经过几次删改以后，条文确实大大简化了。

唐律体现了伦理道德和法律的密切结合。西汉统治者用《春秋》断狱；东汉以来，法律逐渐与三纲五常结合，至唐更进一步，有意识地使“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议》序）也就是说，统治者把暴力专政和思想统治结合起来，使二者相辅相成，统一为封建主服务。

为了使国家的“律、令、格、式”能贯彻执行，唐朝还设有御史台，掌管纠察弹劾事宜。唐太宗主张严惩贪污分子，当时京官“犯赃者”必须上报皇帝，处以重刑。凡主管官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贪污者，一尺杖百，十五匹判处绞刑。

唐太宗还经常派负责大臣到各地访察，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贞

观二十年（646），惩罚一批犯法官员，其中判死刑者7名，流徒数百名。例如沧州刺史常辩，由于罪行严重，唐太宗在朝集使（各道驻京代表）面前杀了他，以便叫各级官员严以律己，不敢随便贪污。

法治精神贯彻的好坏，关键在皇帝的态度。魏徵对唐太宗说："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就是说，如果皇帝不以身作则，臣下很难守文奉法。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皇帝有生杀之权，自己守法是比较困难的。唐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执法较严。甚至对于自己的子女也不例外，如吴王恪，因好打猎，损害了农民的庄稼，被御史柳范弹劾，结果"免官，削户三百"。


程咬金

唐太宗在执法方面也能主动听取大臣的意见，一旦发现执法有错，便及时改正。贞观元年（627），鄃县令裴仁轨私役门夫，唐太宗要杀他。殿中侍御史李乾祐进谏说："法律是陛下和天下人共同所有的。裴仁轨犯了轻罪，却受死刑，这样就把刑法搞乱了，别人就不好依从了。"唐太宗很高兴，不仅撤销了自己的错误判决，还破格提升了李乾祐的官职。

广州都督党仁弘犯罪当死，唐太宗觉得他过去有功，而且又年老体弱，想免他死罪。太宗自己不愿开曲法的先例，于是他召集一些老臣说："法是大公无私的，不可因私人感情而破坏，以致使国法丧失威严。现在我思想上同情党仁弘，企图赦免他，这就是乱法。这种想法上负于天，我要向上天请罪三日。"房玄龄说："生杀之权操在人君之手，用不着这样谴责自己。"在取得群臣的谅解以后，取消了党仁弘的死刑，把他削职为民。

唐初法治另一特点是重证据重事实，反对逼供。在唐律的

《断狱》篇中规定，法官审理案件时，必须根据具体情节审察罪状，反复查证。假若证据不足，还需要拷问被告时，不许单人进行，必须和所属长官一同立案审判拷讯。凡违犯上述规定者，要打60大板。另一方面，假若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确凿，具有可靠的人证物证，即使被告人自己拒不认罪，也可以根据罪证来判决。不仅如此，而且唐律还规定，政府除了解犯罪者的行为和后果以外，还要了解犯罪的动机是否是出于有意识，把犯罪的情况作出全面分析以后，再量刑定罪。例如长安令杨纂，在处理“袁氏妖逆”案件时，在审查后找不到可靠犯罪证据，就没有定罪。又如，当刑部尚书张亮揭发侯君集约他共同谋反时，唐太宗说：“这件事如果叫大理寺审理，侯君集必要矢口否认，如果他以‘两人相证，事未可知’为理由来反驳，我们毫无办法。”因此，唐太宗未处理这一问题。不仅叫侯君集照常当官，而且按原计划把他的画像陈列在凌烟阁。但是，后来侯君集谋反之事暴露了，太宗根据其罪证判他死刑，枭首示众，并“籍没其家”。

另一方面，贞观年间还注意保护好人，严防坏人栽赃陷害。《唐律》规定：“诸诬告人者，各反坐。”这就是说，以其诬告别人罪状的刑罚来处分诬告者。例如高甑生就是因为他诬陷大将李靖，把他削职徙边的。

为了减少错案，唐初允许被告人自己申辩。法官如果拒不接受，有意阻挠被告人申辩，即是犯罪行为，要打50或100大板。

唐太宗时期，虽然也有冤假错案，但一般能够及时纠正。例如，刘世让原是并州行军大总管，突厥贵族非常恨他，用反间计，诬陷他与突厥可汗通谋叛国。皇帝信以为真，不加细察，便杀了刘世让，其财产也被查抄没收。到了贞观时期，突厥投降的贵族说：“过去刘世让根本没有与突厥通谋，你们当时中了反间计。”唐太宗重新调查了刘世让的案件，证明刘世让无罪，就给刘世让平了反。当时还有一个大臣刘文静，他是太原起兵的发起人之一，是李唐王朝建国的元勋。被河东大族裴寂诬陷，惨遭杀戮。唐太宗掌权

以后，发现了刘文静的冤案，终于平反昭雪，“追复官爵”。

由于贞观时期法治较严，重视证据，严禁逼供，所以当时判死刑者很少，唐太宗在位时期史书记载只有 29 人。

六、反击突厥和统一西域

——“贞观之治”第三

唐政府统一全国以后，中原的封建秩序逐渐稳定，民族矛盾更加突出，反击突厥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唐太宗为了保护社会经济生产和人民的安全，决心反击突厥，为此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加强战备教育和训练。他反复对将士们说：“戎狄侵犯之事哪个朝代都有，最可怕的是边境稍稍安宁，国君就放松警惕，沉湎酒色，不务正业。在这样情况下，一旦敌人进犯，便束手无策。我现在不叫你们凿池塘、造行宫，希望你们集中力量学好骑射。平时我是你们的老师，战时我做你们的统帅。只有做好战争准备，才可以保持边区的安全。”将士们听了，都心悦诚服。

唐太宗不仅对将士进行战备教育，而且经常亲自教战士射箭，并进行考核，成绩优异者给予奖励。经过数年时间，京城卫士，多经过严格训练，增强了战斗力。

正值唐政府积极练兵准备反攻的时候，突厥内部却出现严重危机。贞观四年（630）至七年，突厥境内连续发生旱灾，以致“六畜多死”，“国中大馁”。

另一方面，由于突厥境内包括很多被征服的民族，主要有奚、契丹、回纥、薛延陀等。在唐朝初期，由于突厥“征税无度”，奚和契丹投降了唐政府。他们乘突厥灾荒反抗颉利可汗。当时回纥 5 000骑兵，在菩萨率领之下，于马鬣山击溃突厥的 10 万大军。但颉利可汗不甘心失败，于是特令突利可汗率众反击。突利可汗连战

连败，丧失不少土地，自己轻骑奔还。颉利召突利入帐，严厉斥责并且鞭打了他，又把他囚禁十余天，因此激化了颉利和突利可汗之间的矛盾。后来颉利可汗又向突利征兵，从而迫使突利可汗降唐。

突厥内部的衰弱，大大地改变了唐与突厥双方斗争的形势。从此开始，唐对突厥的战略方针便从防御转为进攻。

唐政府为了削弱突厥的力量，首先分化瓦解突厥国家各民族的联盟，扩大其内部矛盾。贞观二年（628）唐太宗派使者到薛延陀，册封其首领俟斤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以旗鼓等，与他们结成同盟。

这时，代州都督张公谨上表说：突厥颉利可汗穷凶极恶，人民怨恨，所属同罗、回纥、拔也古等部，纷纷独立，众叛亲离，加以连年灾荒，粮食缺乏，建议抓紧有利时机兴兵讨伐。

唐太宗同意张公谨的建议。贞观三年（629）十一月，太宗以李靖为行军总管，张公谨为副，又以李勣、柴绍、薛万彻等为诸道总管，领兵十余万远征突厥。

李靖先领数千骑兵从云州（今山西省大同市）向北挺进，直奔恶阳岭（今山西定襄县南），使突厥“一日数惊”。颉利可汗被迫向碛石（今阴山以北）撤退。李靖乘机夺取了定襄（今山西定襄）。同时，并州大总管李勣又从云中杀过来，颉利可汗急忙派兵防守白道，又被李勣所败。颉利可汗又从碛石窜入铁山。此时，颉利可汗很害怕，就派执失思力赴长安谢罪，准备举国投降。唐太宗派鸿胪卿唐俭和安修仁出使突厥，与之议和。

李靖看清了颉利可汗的意图，对张公谨说：“颉利暂时虽败，但他部众仍然很多，假若放纵他们逃到漠北，有朝一日还可能东山再起。现在应当乘唐使到突厥协商停战之机，突然袭击。”

张公谨说：“目前皇帝陛下已经允许同突厥讲和，并且派鸿胪卿前去商谈，我们如果骤然发兵，岂不要伤害我们自己的使臣吗?”李靖说：“兵不厌诈，韩信破齐就是用这个计策，牺牲一个唐俭有什么了不起?”这时正好李勣也率兵来会，李靖和李勣商议

好了，立即选一万精骑，带20天口粮，尾随在出使突厥的唐俭以后。颉利可汗果然由于唐使前来放松戒备。闻报唐兵来袭，质问唐使。唐俭说："我们二人是从长安来的，双方议和之事，朝廷尚未通知前线将士。只要我们前去向李尚书说明情况，他们会立即退兵。"颉利可汗信以为真，就让唐俭同副使安修仁出帐而去，仍然未加戒备。李靖乘虚进攻，杀突厥一万余人，俘虏十余万口，颉利可汗逃走。这时，李勣的部队已切断了颉利可汗北逃的道路，迫使许多帐落投降，并俘获五万余口。灵州总管李道宗，从另一路追杀，俘虏了颉利，反击突厥的战争取得全胜。从此，从阴山到大漠，都被唐政府统一，赢得了几十年的和平。


李 靖

东突厥失败以后，他们有的投奔西突厥，也有的归附薛延陀，并有十余万归唐。唐太宗把降服的突厥安置在北方边区，设六都督府管辖。另一方面，突厥上层人员迁到长安，其中封五品官者百余人，还有少数人当了将军。

唐太宗统一大漠南北以后，接着就扫除"丝绸之路"的障碍，完成统一西域的事业。

唐朝的西域，主要指巴尔喀什湖以南以东的新疆、青海广大区域。早在西汉时期，中央政府就在这里设置西域都护府，代表中央政府行使主权，它的管辖范围包括巴尔喀什湖在内的帕米尔地区。东汉继续设都护或校尉进行管理。中原和西域始终保持密切联系。隋朝平定吐谷浑以后，又重建伊吾城，西域和内地经济文化的交流更加频繁。

隋末农民起义以后，中原连年内战，西突厥乘机占领西域，在各地设立吐屯社，强迫征收赋税，破坏了"丝绸之路"的交通。

另一个阻塞“丝绸之路”的割据势力是汉族麴氏建立的高昌政权，它的经济、政治、文化，和中原基本相同。

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区域）地处西域和中原之间，是中西交通的枢纽。贞观六年（632）七月，焉耆遣使向唐朝入贡，请求唐朝恢复从焉耆到内地的碛路，以促进双方经济交流，得到唐太宗的支持。高昌王有意识堵塞碛路，派兵袭击焉耆，大肆掠夺。又勾结西突厥，占领焉耆五城，掠男女1 500余人。

贞观十三年（639），麴文泰又进攻唐朝的西伊州，“伊吾之右，波斯以东”，本来“职贡不绝，商旅相继”。现在却“琛赍遭其寇攘，道路由其拥塞”（《册府元龟》卷九百八十五）。阻挠和破坏了各少数民族和唐朝政府友好关系的发展。

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唐太宗令交河行军大总管、吏部尚书侯君集，副总管左屯卫大将军薛万钧，率兵讨伐麴文泰。

贞观十四年五月，麴文泰病死，其子智盛即位。唐军到达柳谷渡，听说麴文泰已死，高昌正忙着办丧事。唐朝将士主张乘机进攻高昌。大总管侯君集说：“皇帝陛下因高昌无礼，才勅令讨伐。如果我们乘人之危，袭人墟墓，岂不是同样无礼吗？我们不能那样做。对于高昌我们要正正堂堂地去打他们。”等高昌办完丧事，侯君集便下令进攻，一举攻陷了田城，掳男女7 000余口。又令中郎将辛獠儿为前锋，乘夜前进，一直打到都城。侯君集亲自督战，把高昌都城团团围住。这时的高昌王麴智盛依恃与西突厥订有盟约，还幻想西突厥来援。但是西突厥兵在途中听说唐军已达高昌，中途折回，实际高昌已完全孤立。侯君集用高达十余丈的巢车攻打高昌，站在车上可以俯瞰城内。高昌无计可施，只得开城出降。侯君集分兵出击，连下22城，收降8 000余户，1.7万余人。

平定高昌以后，唐政府在高昌故地设立西、庭二州。贞观十四年（640），在西域建立了安西、北庭都护府，治所暂设交河城。

唐政府平定高昌后，西突厥又利用龟兹破坏唐通往西域的商路。为了打通“丝绸之路”，彻底完成统一西域的事业，贞观二十

一年（647）十二月，唐太宗派崑丘道大总管阿史那社尔和安西都护郭孝恪讨伐龟兹（今新疆库车）。第二年四月，由于西突厥内部分化，叶护阿史那贺鲁率部众投降唐朝，自愿担任向导，参加统一西域的战争。太宗任命他担任崑丘道行军总管。

贞观二十二年（648）九月，阿史那社尔败西突厥处月、处密两部并迫其投降后，引兵从焉耆以西奔龟兹之北境，分兵为五道，出其不意，对龟兹发动攻势。

阿史那社尔率领的唐军，前后破龟兹五个大城。唐政府把安西都护府迁到龟兹，管辖焉耆、龟兹、碎叶、疏勒四镇，从此西域大部分统一于唐。唐高宗初年，打败了西突厥，在庭州设立北庭都护府，最后完成了统一西域的事业。

唐朝统一了西域以后，用中原的政治经济制度实行统治。在安西北庭都护府下，设立若干都督府和州县，有效的行使统治权力，推行中央政府的政令。高宗显庆三年（658），又在西州设立都督府。1973 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唐文书中，发现功曹、仓曹、兵曹、法曹的官衔，说明唐朝在西域设立的西州，与内地州县的机构完全相同。

西域和内地一样，也推行均田制度租庸调法。上世纪 30 年代在吐鲁番发现数百件土地文书，其中包括给田、欠田、退田文书，证明在西域地区，确实推行了均田制度。

西域也实施府兵制度，据《唐会要》记载，在安西都护府管区内，设置军府 126 个。阿斯塔那墓葬里又发现了开元年间“西州营名簿”，簿中列举队长、火长，而队火的编制和内地府兵编制完全相同。在西州地区，共发现四个折冲府，这就是高昌县的前庭府，交河县的岸头府，天山县的天山府，蒲昌县的蒲昌府。在西域设置折冲府，保证了唐政府在西域地区可以征集部分军队。

关于商业和交通，唐政府在全国各地交通要道，设有关、津、镇、戍，行人往来都需携带“过所”（通行证）。在吐鲁番文书里，发现不少“过所”，反映唐朝交通法令在西域的实施。同时，唐政

府管理商业的制度，也在西域推行。

上述情况反映西域和唐朝不是简单的从属关系，而是唐朝的统治区，证明1200年前，新疆就是中国的领土。

唐太宗是我国封建时代地主阶级中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在推翻腐朽的隋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他统治的贞观年间，以亡隋为戒，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继续进行改革。他的“用人唯贤”和纳谏，又保证了这些改革措施的实现，重建并巩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促进了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唐王朝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封建王国。

七、均田制度

均田制度是北魏太和九年（485）建立的土地制度，隋朝沿袭下来。隋末唐初，由于长期战争，出现了很多荒地。祖君彦在讨伐隋炀帝的时候说：“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这种情况直到贞观时期还没有彻底改变过来，当时伊洛以东，直到沿海，仍然是“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7世纪30年代，全国人口只有300万户，相当隋朝1/3左右。从唐初人口的锐减，也可以看出大量荒地的存在。唐初存在大量荒田，是实行均田制度的物质条件。

另一方面，唐朝最高统治集团，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不得不分给农民一点土地，实行均田制使他们有条件从事生产，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以保持封建秩序的稳定。

唐朝均田制规定，丁男、中男受田百亩，老男、笃疾、废疾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

凡道士、和尚给田30亩，冠、尼20亩。官户受田等于良丁之半。工商业者和官户相同。

丁男、中男的土地分为两类，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

以上是一般百姓受田的数量，贵族官员的受田数量大大超过平

民，如永业田：亲王1万亩，一品职事官6 000亩，郡王和从一品职事官各5 000亩，国公和正二品官各4 000亩，郡公和从二品官各3 500亩，县公和正三品官各2 500亩……

五品以上官员的永业田，必须在宽乡分配，不许给狭乡田。

六品以下官员也给永业田，允许在本乡用“还公田”（即退田）分配，也可以在宽乡分给。

永业田实际是私有财产，所以各级贵族官员都是大地主。

九品官员除了取得永业田以外，他们还有职分田。

职分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当官员调动或免职时，必须把职分田退还。职分田原则上都分配在城市百里之内，但有时也分配在百里以外。统治者用强制手段令百姓耕种，又迫使他们到百里之外交租，这是农民沉重的负担之一。

以上就是唐朝均田制度的具体内容。唐朝均田制具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取消了奴婢受田的制度，唐政府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由于奴婢不受田，地主官僚有可能减少奴婢数量，从而扩大国家的编户，限制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

其次，唐朝贵族官员的永业田和职分田，比较北朝显著增多。至于公廨田，则是隋唐时期新增加的。正因为唐朝各级官员都有永业田和职分田，因此当时奴婢不受田对他们影响不大。唐朝均田制内官员永业田的增多，反映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均田制度内部矛盾更加扩大。

第三，唐朝授田的对象比较北魏更广，僧、尼、道士、女冠和工商业者，都有权取得一部分土地。这是因为隋朝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倡导，佛教和道教大大发展，寺院占田相当普遍，从而法令中不得不承认这种既成的事实。允许工商业者占田，反映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者地位的提高。

唐朝放宽了永业田买卖的限制，无论农民的还是官员的永业田，都允许买卖。唐朝不仅放宽了买卖永业田的条件，而且口分田在“乐迁”或要做园宅、碾硙、邸店时，都可以买卖。

唐朝的均田制度，并不是一纸空文，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贯彻执

行了的。例如关内道的灵口农民，每人受田30亩。贾敦颐担任洛州刺史时期，曾没收豪强过限的土地30多万亩，按均田制度分给贫民。泽州刺史长孙顺德，把几千亩田分给贫户。这就是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实施均田制的情况。


赵怀满租田契

除了内地以外，在河西、陇右道和西域地区，曾发现唐代的手实、户籍、给田文书、退田文书和欠田文书。这几种文书是河西陇右及西域执行均田制度的实物证据。

唐政府用以均田的土地，主要是可耕荒田。同时，把农民在隋末起义中夺回的小块土地，和地主、农民原有的土地，都作为均田制下的永业田、口分田。唐朝实行均田制度，并没有取消土地私有制度。

分配土地和户籍制度具有密切关系。唐政府规定，每年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在编制计账以前，先由户主自己写一个报告书，这个报告书叫做“手实”。“手实”上要写出全家人员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健康状况、土地数量、土地坐落、户等。所谓计账，就是在“手实”上记入来年的课役，然后再根据“手实”和计账，三年造一次户籍，作为实施均田制度和征收租庸调的根据。分田的原则是先给课户后给不课户，先给无田户，后给少田户。分田的具体方法是这样的，于每年十月，里正根据本地各户退田的情况作出统计，然后再根据应受田人数，把退田再重新分配给无田者或少田者。因此某一地方每年受田数量，就是这一年退田的总面积，这种分配土地的方法叫做“对供给授”。正因为实行这种分配方法，所以均田户得到的土地，都很零碎，经营管理非常

不便。

唐政府实施均田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要控制劳动人手，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以保证封建主的赋役。因为凡受田的农民和部分地主，都要负担租、庸、调、地税、户税和杂徭。凡受田者都交纳粟两石，绢（或絁、绫）两丈（布加分之一）。纳绢絁者另外加绵三两，输布者加麻三斤。每丁劳役 20 天，如果政府无事，农民可以不役交庸，每天三尺绢。如果超期服役，过 15 天免调，过 30 天租调全免。

凡是封建贵族和九品官员以及被朝廷旌表的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都不纳租庸调。

另一种负担是户税。武德六年（623），把全国人户划分为三等，贞观九年（535）又分为九等。最初是根据户等分摊不同类型的徭役，如捉驿、租纲、脚士等。后来又按户等征收货币，这种税有时称为“税钱”、“税户钱”，也有时谓之“税户”，后来史学家称为户税。户税的起源史无明文，但在唐高宗永徽年间，就利用户税充部分俸料。开元时期，户税的征收分为两种，每年收小税，共 40 万贯，三年收大税，150 万贯，补助地方官员的俸料和机关办公费。天宝时期，全国户税总数 200 余万贯，相当于租庸调的百分之三到五。每户的具体户税量，八等户 452 文，九等户 220 文。

户税征收的对象和租调不同，百姓和贵族官员都须纳税。

地税又名义仓粮，亩收二升。这种粮食最初保存在地方，作为荒年救济之用。唐中宗时期，国家动用了这种粮食，后来逐渐把地税变成政府的正式税收之一。开元二十五年（737），凡有田者，每亩都交纳二升粮食，商贾和无地户按户等的高低征地税，上上户交五石，中下户一石五斗，下下户不收。

根据史籍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知道，均田农民所受土地很少，一般只有三二十亩，或者十亩八亩，50 亩以上者极少。假若按每丁 30 亩计算，按当时产量，一年可收粮 30 石左右，则五口之家只能靠这 30 石粮交纳赋税和维持生计。

要交纳的各种赋税是：一丁交租两石，地税每亩二升，共六升；调绢二丈。按天宝年间物价，半匹绢 105 文。户税据杜佑计算，平均每户 250 文，则调和户税共 355 文。天宝时斗米值 13 文，355 文折合米两石八斗。以上所交租、调、户税、地税共折米五石四斗。交出这些赋税以后，30 石只余 24 石 6 斗了。

五口之家所须口粮，按唐朝官奴口粮标准是"丁口日给二升，中口一升五合，小口六合。诸户留长上者，丁口日给二升五合，中男二升。"参考这个口粮标准，则五口之家的口粮每天丁男二升五合，丁女二升，小儿三口每天一升八合，全家每天须粮六升三合，一年须口粮二十二石九斗九升五合。但是，交纳租庸调户税地税以后，每家只余二十四石，因此除掉口粮，最多能剩一石零五升。这一石粮还要作种子和其他费用，显然是不够的。均田农民为了活下去，必须找其他生路，如租种寺院或官僚的土地，搞副业等。

当然，也有少数农民，他们占有五六十亩土地，如果年景好，经济生活略好一些。

以上是就正常年景而言，假若遇到战争，徭役繁数，或逢水旱灾荒之年，则大量均田农民破产失业。武周以来，由于政治腐败，剥削加重，农民破产逃亡者越来越多。因此，宰相韦嗣立说："今天下户口，逃亡过半"。当时雍州、同州、泰州等地，不少农民没有土地，多变为佃食的农民。

唐朝实行均田制度，首先，使唐政府剥削的对象不断增加，国家的收入逐渐上升，从而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使唐朝国家繁荣富强。例如，唐太宗时期，"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通典》卷七）。这段记载虽然有溢美成分，但也说明贞观年间经济发展的部分情况。

其次，通过均田制度的实施，垦辟了不少荒地，从而扩大了耕地面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均田制是奖励狭乡居民迁往宽乡荒闲地区的。例如南州（今四川省綦江县南）所属夜郎县、

丽皇县等，都是贞观时开山洞设置的。福州的龙溪县、古田县，是开元年间开山洞设置的。合州（今四川省合川市）的铜梁县，因“侨户辐凑”，在长安年间才置县。剑南东川的渝州（今重庆市）壁山县，是天宝年间开辟的。以上事实说明，均田制下的农民投奔各地荒闲之处，积极开荒，扩大了耕地面积，发展了边远地区的农业。

八、府兵制度

府兵制度是唐朝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也是中央集权国家的支柱。这种兵制是西魏北周以来逐步形成的。隋末动乱，府兵组织解体，一部分府兵被军阀所掌握，变成私人的武装。李唐建国以后，又恢复了府兵制度。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府兵制度经过整顿，进入全盛时期。从此时起直到8世纪初，府兵在宿卫和征战当中，都起了重要作用。

唐朝统领全国府兵的机构是十二卫和太子卫率。卫下设折冲府。

所谓十二卫，一是左右卫，领武安、武成等各50余府。

二是左、右武卫（或鹰扬卫），领风亭等各49府。

三是左、右侯卫（金吾卫），领同轨、宝图各50余府。

四是左、右领军卫（戎卫），领万年、万敌等各60余府。

五是左、右屯卫（或威卫），领宜阳等各50府。

六是左、右骁卫（或武威卫），领永固等各49府。

此外，还有太子左右卫率，领广济等各5府。太子左右司御率，领郊城等各五府。太子左右清道率，领绛邑等各3府。

合十二卫和太子卫率所领折冲府的总数共657府。

折冲府是府兵的基层组织，专管有关府兵的具体事务。

折冲府分布的范围非常广泛，但在全国各道的有多有少，很不平衡。每一道里又分“有军府州”与“无军府州”，而一州之内又

有轻役和重役之别。从现有的唐史资料看来，全国折冲府的分布情况大体如下表。

十道折冲府数比较表①

道名	关内	河东	河南	河北	陇右	山南	剑南	淮南	岭南	江南	总计
军府数	288	164	74	46	37	14	13	10	6	5	657
占军府总数的百分比	43.9	24.9	11.2	7	5.6	2.13	1.98	1.52	0.91	0.76	100

关内道折冲府数比较表

府州名	京兆府	同州	华州	凤翔府	鄜州	宁州	邠州	其他十三个有军府州	总计
军府数	131	26	20	15	13	12	11	60	有军府州 20
占军府总数的百分比	45.4	9	7	5.2	4.5	4.1	3.8	21	军府 288

河东道折冲府数比较表

府州名	河中府	绛州	太原府	晋州	汾州	隰州	潞州	其他十个有军府州	总计
军府数	36	35	20	19	12	7	7	28	有军府州 17
占军府总数的百分比	21.9	21.3	12.2	11.6	7.3	4.3	4.3	17.1	军府 164

---

① 以下三表皆引自谷霁光著《府兵制度考释》。

从这三个表可以看出，唐朝设置军府的主要目的是保卫首都和皇帝，正因为如此，所以全国多数军府分布在首都附近。如关内、河东、河南三道，共有526府，占全国折冲府总数80%。京兆府有131府，占总数20%，这是全国折冲府最集中的地方。折冲府分布的情况，反映了唐安史之乱以前“内重外轻”的局面和“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方针。“内重外轻”是唐朝建国以来固定不移的政策。

折冲都尉以下设有校尉，从七品下。校尉以下有旅帅，从八品上。旅帅下有队正，正九品下。最后一级是火长，系流外官。

唐朝折冲府的编制已完全制度化，列表如下：

等第	府		团		旅		队		火	兵种
	兵数	团数	兵数	旅数	兵数	队数	兵数	火数	兵数	
上	1 200人	6	200人	12	100人	24	50人	120	10人	步兵占90% 越骑占10%
中	1 000人	5	〃	10	〃	20	〃	100	〃	
下	800人	4	〃	8	〃	16	〃	80	〃	
特	1 500人	5	300人	15	〃	30	〃	150	〃	

各级折冲府所辖的团、队、火的兵额，全国各地是统一的，无论平时和战时，都是每火10人，每队50人。

折冲府虽然分布在全国各县，但是它受十二卫的领导，不受地方长官的管辖。同时，折冲都尉也不干涉地方行政。兵部尚书和卫大将军都不得专决，这是府兵制的特点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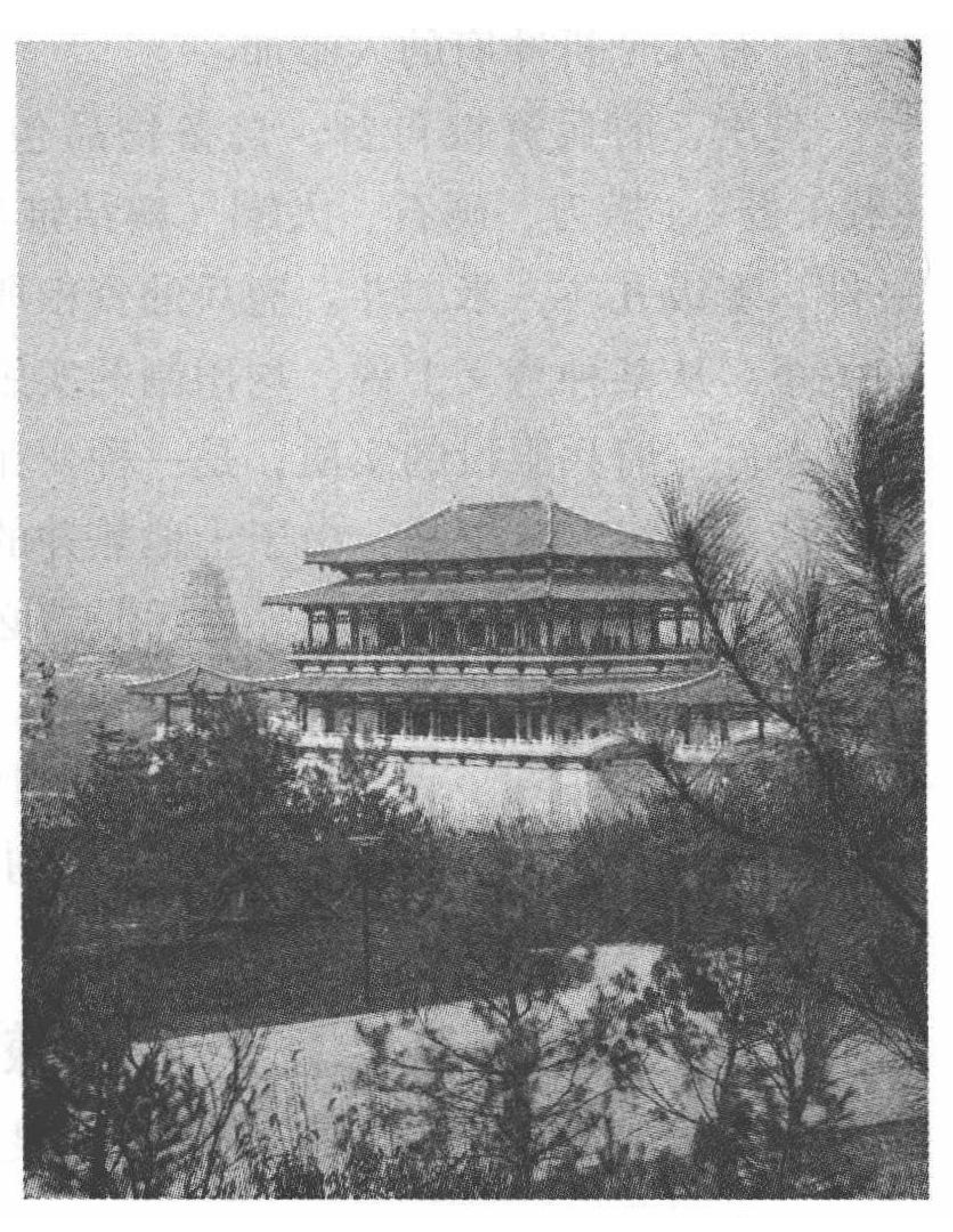
由于折冲府分布在全国各地，地方长官对折冲府也担负相当职责。主要是：根据兵部卫大将军传达的敕书和兵符，会同地方长官按规定发兵。其次是练兵，查阅军备和点兵。

府兵的训练分为两种形式，平时分散练兵，冬季集中校阅，地方刺史有检查督促之权。

府兵所用马匹的补充或淘汰，也由刺史和折冲都尉共同处理。府兵上番宿卫或奉令征防，由刺史和都尉共同发给“食券”（食券是府兵用粮食兑换的）。

府兵的检点是根据籍账上报的丁口，由县令直接负责。

从上述情况看来，地方官可以参与折冲府的军事行政，军队的调动，根据敕令由刺史和折冲都尉共同执行。职权范围规定得十分清楚，行政和军事两个系统，互相监督。



唐芙蓉园

全国府兵在皇帝总领之下，统领于诸卫。府兵的调发属于尚书省兵部，反映唐朝的军权是高度集中的。

府兵的具体任务有二：一是上番宿卫，二是保卫各地。所谓宿卫，就是定期到首都护卫皇帝和中央政府。具体服役办法是：距京城五百里内的府兵一年之内五番，即分五个组轮流入京值班。500 到1 000里七番。1 000 里到1 500里八番。每次值班时间都是一个月。例如上府 1 200 人，五番则每次派出 240 人，七番则 171 人，八番则 150 人。因此，五百里内五番，五年之中就得值班 12 次。500 里到 1 000 里七番，七年之中就得值班 12 次。

每次值班的一个月，指在京城实际服役时间，并不包括旅程往返时间。因此，500 里内五番，一年要上番两次多，每年在京城宿卫须要 66 天的实际日数，如果加上旅程往返日数，比 66 天要多得多。

府兵的另一任务是征防，它和地方兵或边防兵结合在一起，并且时常被看成是中坚力量。如贞观初年，李靖袭击突厥于碛石，即以匡道折冲府苏定方的200骑兵为前锋，获得战果。贞观十五年(641)，唐与吐谷浑发生战争，当时果毅都尉席君买，以精骑120人击败吐谷浑丞相所领的部队。武则天初期，在姚州打败设蒙俭的兵力，有八个折冲府的人参加。

其次，府兵资粮自备。自备物品包括弓一支，矢三十，胡禄(载矢器)、横刀、砺石、大觿（解结锥)、毡帽、毡装、行縢皆各一件，麦饭九斗，米二斗。府兵的资粮所以自备，和均田制度有密切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均田制的实施，为府兵自备资粮提供了经济条件。府兵服役的实质，是一种变相的劳役地租。

从7世纪末叶以来，由于土地兼并的激化，均田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迫使人民纷纷逃亡。府兵既然必须自备衣粮，农民贫困当然无力服役。而当兵以后，又受节度使、都督的剥削，逃役现象十分严重。因此，到了武周时期，府兵制度便逐渐破坏。天宝八载(749)，各折冲府已无兵可交，府兵制彻底破坏。

九、“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科举制度

唐代继承了隋朝的科举制度，并使它更加完备。

所谓科举就是分科考试选拔人才。隋朝的科举还处在萌芽状态，当时有常选和特选两种。开皇年间，曾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炀帝大业年间，又提出“四科”和“十科”举人。以上几科，都是临时提出的，类似唐朝的“制科”。此外，隋朝还有常选，就是进士、明经和秀才。隋朝虽然创立了科举制度，当时并不经常举行考试，各科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尚未形成固定制度。

唐太宗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士族门阀的权势，除了重新修

改《氏族志》以外，更积极推行科举制度。唐朝科举的科目比隋朝增加三四倍，除了秀才、进士、明经以外，还设置武举、明法、明算、明书、开元礼、道举、三史等科。

考生的来源有二：一部分是国子监所属各学馆的生徒，另一部分是全国各州推荐的贡生。各类学校和州县每年推荐考生的具体人数，由中央政府来规定。这个数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根据不同情况作出适当调整。按会昌五年举格规定：国子监所属各学馆，每年推荐明经考生 200 名，进士考生 200 名。

直接主持考试的，最初是吏部的考功员外郎。后来由于考功员外郎的职位较低，在开元二十四年（736）以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此后主考权虽然划归礼部，但有时中书省还要复试。

考试的时间是每年二月，地点在首都长安，有时在洛阳举行。因此，边远州县的应试者，必须在考试前一年秋季从住地出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二月以前到达两都应试。

唐朝科举虽然共有十二科，但其中主要的是进士科和明经科。特别是进士科更被社会所重视，因为进士及第以后，“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因此当时有人称进士为“白衣公卿”或“一品白衫”，“每岁得第之人，不浃旬而周闻天下”（《通典》卷十五）。

关于考试的具体内容，唐初进士科考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春秋左传》、《礼记》是大经，任选一种）。帖经和时务策全优为甲第。

至于明经科，主要考试《九经》。《九经》之中也有主次。唐朝把《九经》分为三类，《左传》和《礼记》定为大经，《诗》和《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公羊传》、《穀梁传》是小经。凡是考两经者，限大经、小经各考一种；考三经者，必须中经、大经、小经各试一种；通五经者，除了考两种大经以外，另外试中经和小经。考试的方式有三种：一是帖经，二是口试经义十条，三是笔试时务策三道。经问大义通七条，时务策通两条者及第。无论考

哪一种明经，都要加试《孝经》和《论语》。

武周长安二年（702），创立了武举科，专门选拔军事人才，由兵部主持。考试科目有三：一是用一石弓和六钱重的镞射箭；二是用八斤重的长矛刺枪；三是举重。合乎标准者及第，任命为武官。唐朝著名的大将郭子仪，就是从武举出身的。

唐朝科举考试每年举行一次，有时因战争或荒年暂停考试，延期举行。每年录取人数，进士约二三十名，明经约四五十名。现在把各朝录取情况，列表说明如下：

时　间	进士及第数	明经及第数	秀才及第数	材料出处
高祖朝	22		6	《文献考通》卷二十九
太宗朝	190		21	〃
高宗武周朝	1 013	85	1	〃
中宗朝	132	83		〃
睿宗朝	89	56	6	〃
玄宗朝	1 057	117		〃
肃宗朝	154			〃
代宗朝	417	47		〃
德宗朝	574	215		〃
顺宗朝	29	10		〃
宪宗朝	418	219		〃
穆宗朝	123	82		〃
敬宗朝	68	44		〃
文宗朝	425	155		〃
武宗朝	150	60		〃
宣宗朝	400	141		〃
懿宗朝	390	142		〃

（续表）

僖宗朝	357	73		〃
昭宗朝	419	51		〃
总　计	6 427	1 580	34	〃

仅从上表看来，在整个唐朝289年期间，共录取进士6 427名，明经1 580名，秀才34名。这个统计数字并不完备，特别是明经及第人数过少。

科举制度在实行中，逐渐被大官僚集团所把持，从而出现了种种弊端。唐玄宗时期，已经出现“考功举人，请托大行，取士颇滥”（《旧唐书》卷一百《王丘传》）的问题。到唐朝后期，科举中的流弊就更加严重。贵族官僚时常受托干扰主考，韩愈就曾推荐十名考生给主考官陆傪。而参加科举的考生，也积极奔走权门，写送“行卷”，希冀吹嘘推荐，以致弄得“每岁策名，无不先定”，“牓出，率皆权豪子弟”（《唐语林》卷三）。大中十四年（860）取士之滥是具有典型性的。当时参加考试的人非常多，投考进士者过千人，“然中第者皆衣冠之子”。其中郑义则，是故尚书郑瀚之子；裴弘，是故相裴休之子；魏当是故相魏扶之子；令狐滈、是故相令狐绹之子。“馀不能遍举，皆以门阀取之”。只有陈河一人出身“孤平”（《册府元龟》卷六百五十一）。由于科举制度被大官僚集团把持，无财无势的人很难考中。如才华出众的大诗人杜甫，两次应试都名落孙山。

进士和明经及第以后，必须经过“省试”（吏部考试）合格以后才分配当官。吏部考试的内容是“身、言、书、判”，所谓“身”就是考察人物的相貌及健康状况，“言”就是言谈举止，“书”是书法，“判”是考察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分配当官的进士，初任官职级别很低，一般都任县尉或校书郎、监察御史里行等，但是提升很快，其中有很多人升任中央高级官员和地方大吏。唐德宗以后的各代宰相，多数都是进士出身。

明经及第以后，经过“省试”虽然也分配当官，但升迁较慢，社会地位较低，只有少数人担任高级官职。

科举制度实施以后，培养出新的特权阶层。唐朝进士及第以后，不仅本人当官，而且全家变成“衣冠户”，具有免役之权。由于“衣冠户”合法免役，所以当时有不少富户投靠“衣冠户”以求荫庇。只要富家送钱给“衣冠户”，把产业寄托在他们的名下，这些富户便可以逃避差科，而将徭役完全转移到农民身上。

唐朝实施科举制度，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收到成效。首先，它巩固了中央集权。在隋唐以前，通过九品中正制度选拔人才、分定等第，其权力完全掌握在地方担任中正的士族门阀之手。当时的中央政府，基本上都是按着州郡大小中正所选拔和评定的等第来任用官员的。这样一来，人才的任用和升降，表面上虽然通过中央政府，实质上都掌握在地方的中正手里。而州郡的中正，又是本地的士族门阀，也就是说，选举权掌握在地方名门大族之手。同时，选出的人又必然是士族门阀，而且门第越高，品第也越高。因此，九品中正制度是支持士族专政的大杠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很难真正做到中央集权。隋唐实施科举制度以后，审查录取人才的权力掌握在礼部，任用官员之权掌握在吏部。朝廷以此来笼络人才，使全国地主必须向中央政府靠拢，这就摧毁了士族门阀对仕途的垄断权，使中央集权更加巩固。

另一方面，科举制度又是统治思想的手段。无论进士科或明经科都要考“帖经”。为了通过这场考试，应试者必须熟读几种主要经典，特别是《春秋左传》和《礼记》，不仅要背诵，而且必须学会熟练运用。这样，使知识分子的思想局限在纲常名教之内。可以说，隋唐以后纲常名教的宣传贯彻，主要是依靠科举制度完成的。

高宗永隆二年（681）以后，进士科开始考试杂文（主要考诗赋），以后成为定制，变成进士科考试的主要内容。唐玄宗时，制科也考诗赋。因此，欲投考进士科，必须把诗作好，因而对于唐诗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十、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

——唐代汉藏友好关系

唐朝初年，在西藏高原上，出现一个强大的民族政权——吐蕃。吐蕃是今天藏族的祖先，他们原来是汉朝羌族的一支，后来逐步西迁，在雅鲁藏布江南岸渐渐发展起来。到公元7世纪中叶，吐蕃从分裂逐渐统一，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正在这个时期，吐蕃出现一位民族英雄——松赞干布，他实行民族友好政策，和唐朝建立了亲密关系。



松赞干布雕像

大业元年（605），松赞干布生于西藏高原的泽当（拉萨东南）。他13岁那年，吐蕃苏毗王族的残部大搞分裂，爆发了叛乱。在他西部的另一部落羊同，又从外部进攻，一时吐蕃处于内乱之中。

年轻的松赞干布担负起平定叛乱的重任。在吐蕃旧部尚囊白乌苏和率弄刻尔的协助之下，平定了内乱，使吐蕃重新统一。松赞干布没收了私有土地和犯罪大臣的土地，创立国有王田制度，使用奴隶耕种。奴隶劳动按户计算，每户分给土地，然后向国家纳税服役。在政治方面，松赞干布创立中央集权制度。过去，吐蕃赞普统治13个小王。他们下

面，又分别管辖25个家臣。他们各有一个堡塞，相互之间并无统属关系，只和国王具有松懈的联盟，三年会盟一次。松赞干布把他所辖地区划分为8个大区，每个区叫“如”，每“如”又分为若干千户所，实行全民（自由民）皆兵。军事和民政分别管辖。每“如”设元帅、副将、判官各1人，各“如”具有自己不同毛色的“如马”和不同图案、不同彩色的“如旗”。千户所管理军事的官名为“东本”（千户长），管理民政的官是“德巴”。八如以上又设兵马都元帅和兵马副都元帅，他们的地位相当于副宰相。千户长归吏部尚书统领。正宰相权力较大，既掌军权又管民政，总揽内外一切国政，最后由国王裁决。国王和官员每年盟会一次，国王要求这些官员尽忠职守，盟会时检阅军队，调查户门。松赞干布新建的制度和政策，巩固了吐蕃内部的统一。

在吐蕃的北部，由于唐朝打败了突厥和吐谷浑，过去被突厥吐谷浑统治的党项、多弥、白兰、春桑、迷桑等部，都向松赞干布称臣纳贡。吐蕃的领土扩充到现在的甘肃西部、青海南部及新疆的一部分。吐蕃与唐朝和天竺直接接触，两国对吐蕃都有重要影响。

因为吐蕃和羊同不断发生战争，促使松赞干布和唐保持和平亲睦的关系。松赞干布为了与唐朝建立亲密的关系，贞观八年(634)，派使臣到达长安，从此汉藏两族关系发展到新阶段。

7年以后，松赞干布派禄东赞（藏文史书名“伦噶尔”）来唐。他从逻些（今拉萨）出发，经过数千里的草原，到了唐朝首都，献给唐太宗大量黄金珠宝，代替松赞干布求婚。唐太宗以汉藏友谊为重，答应把宗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并特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入藏。

文成公主是一位献身于汉藏两大民族友好团结伟大事业的优秀女性。

文成公主出嫁的消息传到吐蕃以后，引起了吐蕃人民莫大的喜悦和兴趣。为了减少公主在旅途中的艰苦，他们在很多地方都准备了马匹、牦牛、船只、食物和饮水，以表示对公主的热烈欢迎。吐

蕃王松赞干布亲自率领大队侍从和护卫人员，从逻些（今拉萨）起程到青海去迎接。

唐太宗为文成公主一行预先在青海南部的河源修了一所负责接待的离宫，经过的地方都有官民迎送。一个多月后，公主到达河源，在河源附近的柏海，会见了前来迎接的松赞干布。当时松赞干布以唐皇帝女婿的身份拜见了前来送行的江夏王李道宗，对唐太宗表示感谢，并请李道宗代向太宗问好。松赞干布陪文成公主到了逻些。

松赞干布原来住在帐篷里，为了和文成公主结婚，在逻些专门建筑了一座华丽的王宫，就是现在的布达拉宫。在这座王宫里，他和文成公主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现在布达拉宫还保存着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结婚时洞房的遗迹。

文成公主进藏，是吐蕃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多少年来留下很多传说。在传说里，她简直变成了神仙。这不仅是由于唐太宗把那善良多才美丽的公主嫁给吐蕃王是一件光荣的值得纪念的大事，更重要的是公主进藏促进了汉藏经济文化的交流，给吐蕃人民带来了切身利益。

在文成公主进入吐蕃的道上，吐蕃人民把很多地名与文成公主都联系起来。例如，青海有一座日月山，是现在青藏公路必经之处。据说1300年前，当文成公主到达这儿时，她感到过了这座山，又是一重天，远离家乡的愁思未免触景而生。唐太宗为了宽慰她，特地用黄金铸造了日月的模型各一个，远道送来，叫她带在身边，以免悬念。从此这座山就命名为日月山了。现在山上仍然有一座碑，碑上刻的“日月山”三个大字还隐约可见。

青海还有一条倒淌河，这条河从东向西流入青海湖。传说文成公主从这条河开始，要弃轿骑马，进入草原。她感到从此和家乡的距离一天比一天远了，不禁痛哭失声。公主这一哭感动了天地，结果使这里发生“天下江河皆东去，唯有此水向西流”的现象。据说倒淌河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

文成公主对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文成公主到达吐蕃，不仅带去各种谷物、蔬菜种子，而且带去了工艺品、药材、茶叶及各种书籍。

在文成公主以前，吐蕃已经有了农业，但经营粗略。他们只用石头围住一大块地，在里面耕耘，还不会整地，也不知保持水土。唐朝先进生产技术传入后，出现小块农田，学会防止水土流失和平整土地。

吐蕃的手工业，很大部分是唐朝汉族工匠直接帮助建立的，如酿酒、造纸、造墨、缫丝、安装碾硙等都是这样。文成公主和她的侍女，曾协助吐蕃的妇女改进纺织技术。特别是在染色和图案设计上，给吐蕃提供了很多改进，使吐蕃的氆氇成为有特色的纺织品。

过去吐蕃人都住帐篷，文成公主进藏后，上层人物都改住房屋。在衣着方面，吐蕃人穿的是毡裘，又笨又重。双方和亲以后，一部分人开始用绫罗绸缎。同时，用唐式石磨加工谷物，不仅省工，而且减少损耗，从而改善了人民生活。

吐蕃过去没有文字，无论什么事都用绳打结，或在木头上刻符号表示。文成公主劝松赞干布设法造字。于是他指令桑扎布去研究，后来造出30个字母和拼音造句的文法。松赞干布认真学习新文字，并把这些字刻在宫殿的石崖上，从此吐蕃有了自己的文字。他们用吐蕃文翻译唐朝的儒经和佛经，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吐蕃自己没有正式可靠的历法，以麦熟的三月为一年之始。文成公主把天文历法带到逻些，吐蕃开始用唐朝的农历，依十二属相和六十甲子计算时日，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正因为文成公主对吐蕃人民生活有着伟大贡献，所以流传不少颂扬公主的诗歌，其中一首歌的歌词大意这样说：

从汉族地区来的文成公主，
带来了各种粮食三千八百种，
给吐蕃粮库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汉族地区来的文成公主，
带来各种手艺的工匠五千五百人，
给吐蕃工艺打开了发展的大门；
从汉族地区来的文成公主，
带来了各种牲畜共有五千五百种，
使西藏的乳酪酥油从此年年丰收。

这首诗虽然不免有文字上的夸张，但绝不是毫无根据。可以肯定，从文成公主到吐蕃以后，汉族地区的农产品及手工业产品，必然源源运到西藏高原。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也跟着传入吐蕃，促进他们的经济文化发展。

由于唐与吐蕃经济文化发生了密切关系，必然导致双方政治上的联合。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结婚以后，对唐太宗称臣。当唐太宗征高丽回到长安以后，他派大臣禄东赞到京致贺，并送来金鹅一支，高七尺，可盛酒三斛。

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太宗派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出使天竺，在途中遇到中天竺的阿罗那顺发兵劫掠，玄策派人向松赞干布借兵。他立即发兵1 200人，又调尼婆罗兵7 000人助战，平定了叛乱，使王玄策得以到达天竺，对加强中印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

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逝世，松赞干布到长安吊丧，并献金银珠宝15种，“请置太宗灵座之前”。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并赐物二千段。松赞干布给唐宰相长孙无忌写信说：“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愿勒兵共讨之。”这反映了松赞干布非常珍视与唐朝的友谊，把保卫大唐的安全作为人臣应尽的职责。唐高宗很嘉许他，并且从“西海郡王”又升为“宾王”。

永徽元年（650），松赞干布逝世，其孙芒松芒赞继位赞普，遣使到长安报丧，唐高宗派右武卫将军鲜于匡济前往吊唁。松赞干

布死后，文成公主又活了30年，继续致力于唐与吐蕃友好团结的伟大事业。

唐中宗时期，吐蕃王尺带丹珠的祖母为孙子向唐政府求婚，中宗以金城公主嫁给尺带丹珠。景云元年（710），金城公主赴藏，带去数千匹绫罗绸缎，以及大批手工业品和龟兹音乐。后来吐蕃王又派人到长安，取《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进一步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

十一、“西天取经”

——卓越的翻译家和宗教家玄奘

从《西游记》问世以来，“西天取经”的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西游记》的内容，绝大部分是虚构的，只是唐僧确有其人，那就是玄奘。玄奘是唐代著名的翻译家、探险家和佛学大师，他架起中印友谊的桥梁，在世界文化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玄奘原名陈祎，玄奘是他的法号，开皇十六年（596），生在河南缑氏县（今河南偃师）。他父亲陈惠，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的二哥长捷，在洛阳净土寺当和尚。玄奘时常到净土寺玩耍，13岁那年，受剃度做了和尚。从此以后，他就和哥哥常在一起，诵读佛经。他很聪明，而且废寝忘食地研究经典。他15岁的时候，不但能背诵《涅槃经》，并且还能讲解。

他为了继续深造，毅然离开哥哥，只身一人沿长江东下，到达荆州，在天皇寺和僧众研究半年经典，然后又北上河南、河北、山东等地，访问各地著名的高僧，钻研各家的学说。玄奘仍不满足，他学得越深，疑问越多。他发现，国内佛经不仅译本缺乏，已有的译本译文也有很多舛错。为了了解经典的真义，寻求佛教的究竟，他决心到佛教“圣地”“求法”。于是玄奘又回到长安，向外国人学习天竺语文，筹集旅费，作出国的准备。

我国和西方国家的交通，出了玉门关、横过沙漠以后有两条路：一条是北路，沿天山南麓向西过葱岭；另一条是南路，沿昆仑山北麓向西过葱岭，最后进入中亚地区。这两条路都要经过很大的沙漠，危险也多。公元4世纪中叶，通过西域的道路逐渐向东北转移，大体走的是瓜州到伊吾（今哈密）一线。虽然也必须经过沙漠地带，但距离稍近，比较安全。玄奘准备走的，正是这条道路。

玄奘在瓜州，结识了西域人石槃陀，并请他当向导，又得到瓜州老人送给他的一匹瘦马。这匹马虽然瘦，但是它曾经往返伊吾走过10余次，认识道路。

玄奘

玄奘从瓜州出发，走了50多里，绕过玉门关。再向西北经过四座烽火台，奔向野马泉，开始进入莫贺延碛（意为大沙漠即今安西到哈密的一段沙漠）。这时向导已经跑掉，在这八百里的沙漠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玄奘只有伴着自己的影子前进。走了两天，他在一片茫茫的沙漠中迷了路，找不着野马泉，心里十分焦急，身体也很疲倦。他拿起皮囊准备饮水，一时心慌失手，把一皮囊水倾倒在沙漠里。这是无法补偿的损失。他懊悔极了。于是调转马头往回走。走了一段路他忽然想：“我自己宣过誓，若不到达印度，决不往东走一步，现在我宁可西行而死，决不东归而生。”于是他立刻回头继续向西前进。他在沙漠中走了五天四夜，一滴水未曾入口。头两天只觉得口干舌燥。后来全身焦躁，嘴唇出血，呼吸困难，头晕目眩。同时马也不能走了，最后人和马都倒在沙漠里，昏了过去。这一天的半夜，他被一阵凉风吹醒，渐渐有了精神，马也站起来了。玄奘勉强走了几里路，发现前面绿油油一片草地。到了那里，还发现清澈的泉水。玄奘异常高

兴。在那里休息一天，装满了水，又继续走两天路，才离开沙漠，到达伊吾国境。

玄奘在伊吾国住了十余天，后来又到高昌。高昌王麴文泰，亲自出来迎接。接着，王妃大臣也前来礼拜，并请玄奘讲经。他在高昌停留将近两个月，离开高昌时，麴文泰送他黄金100两，白银30 000两，绢500匹，马30匹，和尚4名，工人25名，并写了25封介绍信，请沿途国王保护。玄奘非常感激。

玄奘一行从高昌出发，经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屈支国（今新疆库车）、龟兹等地，到达碎叶城。这个时候从高昌护送的人，有的冻死，有的逃亡，已丧失了一半。玄奘在这里见了西突厥的叶护可汗。叶护可汗看了麴文泰的信，热情地接待了玄奘，并给中亚诸国国王写信，要他们保护玄奘。就这样，玄奘比较顺利地通过吐火罗等国，进入北印度国境。

玄奘从贞观元年离开长安，大约第二在夏天到达印度，长途跋涉近一年之久。

玄奘进了北印度以后，在印度河上游和迦释尼罗（克什米尔），参观佛教古迹，向高僧学习。从贞观二年（628）到贞观五年，他参观了恒河流域著名的佛迹，走访了许多高僧，然后到达摩揭陀国（印度的伽耶城及贝拿勒斯城），最后入那烂陀寺。

那烂陀寺是印度全国最大的寺院，也是最高学府。这里“僧徒主客常有万人”。在这里除了学习佛教各派经论以外，印度的因明学（逻辑）、声明学（音韵学）、婆罗门经典、医方术数，也是研究的对象。主持这个寺院的，是戒贤法师。当时他已经100多岁了，是当时印度首屈一指的大学者。

那烂陀寺的僧众，听说唐玄奘到来，派了200多和尚，1 000余人欢迎他。

玄奘进了那烂陀寺，拜会戒贤法师。戒贤法师已经多年不讲经，却特地为他开讲《瑜珈论》，先后达15个月。玄奘在寺里5年，把寺内所藏各类经论都读了一遍，并随时向戒贤法师及寺内高

僧质疑问难，通晓了经论真义，但他并不满足，辞别了戒贤法师又到南印度去游学。

他先到伊烂那钵多国（奥里萨），向高僧坦仑揭多毱多学习。在中印度，研究《因明学》。在印度最西部的狼揭罗国（喀拉蚩一带）和北印度等地研究《唯识论》及天文、地理等。在离开那烂陀的6年时间，玄奘走遍了五印度大小100余国。6年以后，他又回到那烂陀寺。戒贤法师令玄奘担任讲座，为全寺僧众宣讲《摄大乘论》。

当时有一个婆罗门，写了十余条理论，挂在那烂陀寺门口，并且狂妄地宣称："如果有人驳倒我一条，我甘愿把头割下来认错。"很长时间没有人敢出来驳斥他。玄奘请戒贤法师等作证人，和那个婆罗门辩论。辩论到最后，那个婆罗门不得不低头认输，请求照约办理。玄奘说："和尚不杀人，你跟着我当佣人吧。"

玄奘在印度宣扬大乘论对印度各地影响巨大，羯若鞠闍国的戒日王，和东印度迦摩缕波国（今孟加拉）国王鸠摩罗，都很仰慕玄奘。他们特派使者聘请玄奘，并以两国国王的名义通知各国，在羯若鞠闍国的首都曲女城召开全印佛教大会，聆听唐僧玄奘的学说。

贞观十六年（642）十二月，大会正式开始。参加大会的有五印度18个国家的国王，精通大小乘的高僧3 000余人，那烂陀寺的僧众2 000余人以及婆罗门等外道2 000余人。这是五印度文化名人的大聚会，是印度历史上第一次盛会。

玄奘任大会主讲，宣讲的主要内容是《大乘论》，同时他又写了一本《破恶见论》，悬挂在会场门外，向与会者公布自己的观点。但是，公布以后，从早到晚，没有人敢站出来辩论。这次大会开了18天，大家恭听玄奘的议论，始终没有一个人提出不同意见。在大会结束的时候，戒日王赠他黄金1万，铜钱3万，上等僧衣100领，玄奘都拒绝了。

按照印度的习惯，辩论胜利者必须骑着大象游行。玄奘推辞不

过，只好尊重印度的风俗。僧众们在大象两旁掀着玄奘的袈裟，向群众宣扬，“中国法师立大乘义，破诸异端，十八日来无敢论者”。接着全场欢呼，烧香散花，十分热闹。从此以后，印度佛教界公认玄奘是佛学的最高权威，名扬印度全境。

曲女城大会以后，戒日王诚恳挽留玄奘，作了印度五年一次的75天的无遮大会，当时与会僧俗50万人，这也是印度有史以来的一次空前盛会。

玄奘在印度留学15年中，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祖国。贞观十七年（643），他用大象和马匹驮着675部佛经及其他物品起程回国，第二年到达于阗（今新疆和阗）。这时于阗高昌一带变化很大，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征服高昌，威震西域。于阗王遣质子到长安入侍，西域统一在中央政府之下。当时玄奘在于阗王挽留下，停留7个月，同时向唐政府请示行止。唐太宗立即回信，对他的归来表示高兴，祝愿早日和他见面，还勅令于阗等国，出夫役马匹，护送他回国，并令敦煌官府在流沙迎接，鄯善国（今新疆婼羌）在沮沫迎接。

贞观二十年（646）正月二十四日，玄奘平安回到长安。他先后旅行18年，历经120余国，回国时已经是两鬓苍苍的老者了。

唐太宗听说玄奘回来，派宰相房玄龄、大将军侯莫、长安令李乾祐等迎接。长安市民在朱雀大街开了欢迎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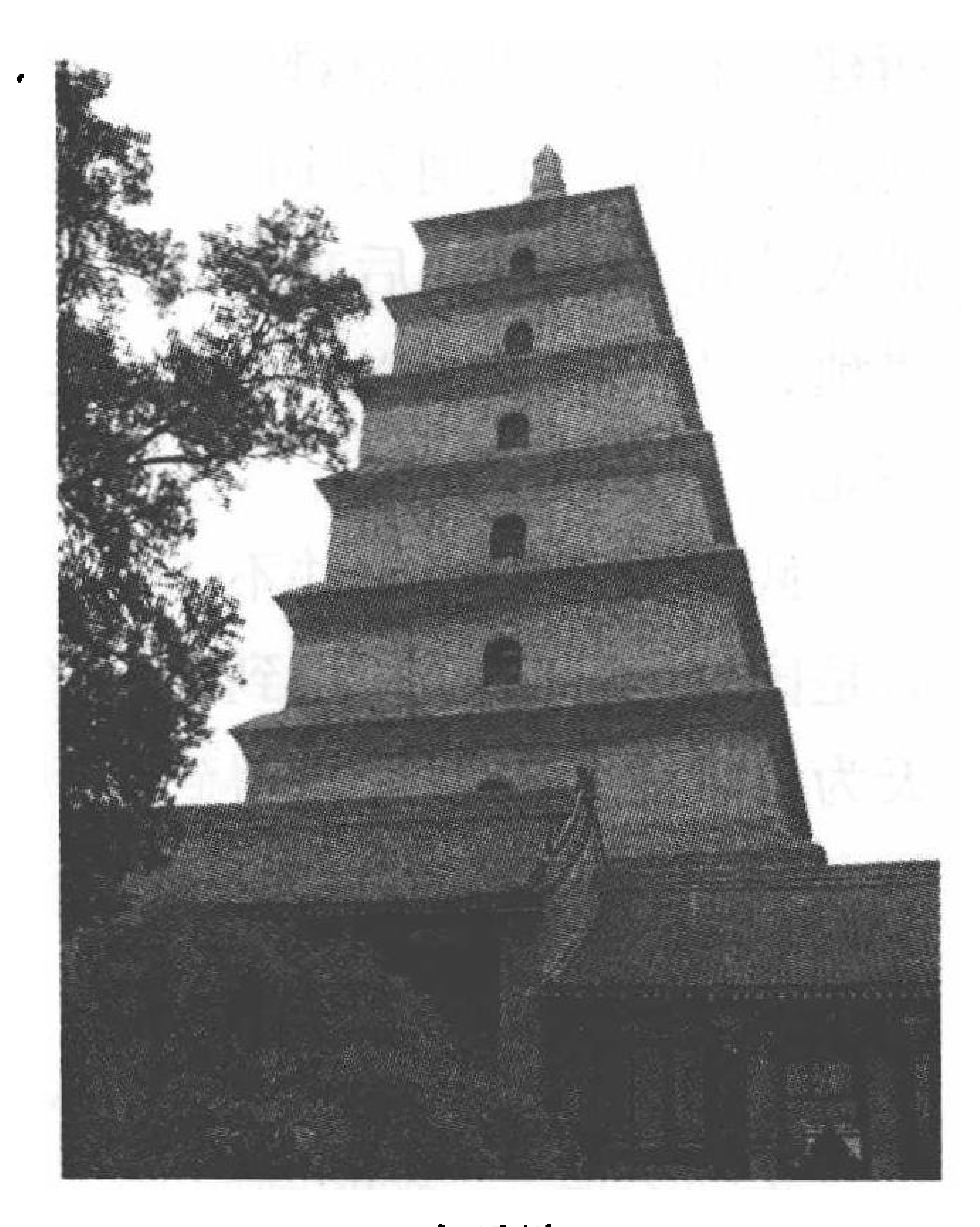
玄奘从长安到洛阳会见唐太宗以后，便回到长安，开始他的译经和写作事业。

在他回国以后的第三个月，贞观二十年（646）五月初，玄奘便打开梵本，正式翻译了。从这个时候起，整整19年，他一直全神贯注地坚持译经。他每天早晨都规定好进度，假若白天有事没有完成，夜里一定设法补上。同时，他每天还要拨出一定时间为弟子们讲解新译的经论，并接待来访客僧。他学识高深，工作热情，越到晚年，愈益高涨。据佛教史家统计，在19年中间，他平均每年译经70卷。而最后4年之间，提高到年译170卷之多。在他逝世

的前一年的冬天，完成了我国佛教经典中卷帙最大的《大般若经》600 卷。在 19 年中，玄奘共译经论 74 部，1 365 卷。

玄奘法师不仅使我国译经制度分工协作的优良传统得到充分发挥，取得最大的效果，而且还把我国古代翻译文学的水平，推到新的高峰。

玄奘另一伟大贡献是作了《大唐西域记》12 卷，10 余万字。这部书虽然是应唐太宗的嘱托，并由他弟子辩机执笔写成，但其内容则显然是玄奘在旅行中有意识地随时采访搜集来的。这本书对于中亚印度各国的山川、气候、物产、人情、风俗以及古迹传说等，做了忠实的记录。《大唐西域记》不仅是古典的游记，而且是一部记述中亚印度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所以英、法、德、日、俄等国，都出版了这部书的译本，并且出现了不少专门研究《大唐西域记》的专家学者。大家一致公认，这是一部古代东西洋旅行记中的范围广大、记述正确、内容丰富、最有价值的书籍。今天，研究 7 世纪中亚印度历史地理者多依据这部著作。埋没了几百年的印度那烂陀寺，就是根据《大唐西域记》提供的线索发掘出来的。



大雁塔

玄奘还有一个贡献，就是把老子的《道德经》译成梵文，介绍给印度。

《秦王破阵乐》，也是玄奘介绍给印度的。当戒日王了解《秦王破阵乐》的来源以后，决定派使臣到长安，和我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高宗永淳元年（682）二月初五日，玄奘死于玉华寺。四月十

四日，安葬在终南山下。在举行葬礼时，长安周围500里内，有100余万人前来送葬。3万余人庐于墓旁，可见当时的人对玄奘的爱戴了。

十二、武则天的统治（上）

武则天出身大贵族大官僚家庭。她的父亲武士彟，由于参与李唐建国有功，封太原郡公、应国公，任工部尚书，食实封800户，赐田300顷。武则天14岁入宫，当了唐太宗的才人。太宗死后，她入感业寺为尼。后来高宗又把她召到宫里。武则天入宫时，谦虚谨慎，“卑辞屈体以事后”。王皇后“数称美于上”，于是她当了宸妃。

武则天作了宸妃并不满足，还想当皇后。在封建社会，废立皇后是国家大事，必须得到朝臣的支持。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对立武则天为皇后表示反对，却得到李勣、许敬宗、李义府的支持。永徽六年（655）十一月，武则天被册封为皇后。

关于武则天，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她的为人。唐太宗有一匹烈马，名叫狮子骢，性情暴烈，谁也不敢骑它，也没有人能制服它。武则天说：“我能制服它，但须有三件东西。”太宗说：“要哪三件东西？”武则天说：“我要一条铁鞭，一把铁锤，一把匕首。马不听话，我就用铁鞭抽它；再不听话，我就用铁锤锤它；还不听话，就用匕首刺死它。”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武则天的性格。她执政后，就是用驯马精神控制群臣，以维护自己的统治。

显庆五年（660），武则天开始参与朝政，进一步又想夺取皇位。首先，她利用佛教制造登基的舆论。当时和尚法明等编了一部《大云经疏》，宣扬武则天是弥勒佛化身，应当称帝。为此，她下令全国各州都要建立大云寺，藏一部《大云经》，由高僧向群众宣讲，利用宗教迷信为她夺取皇位制造舆论。其次，武则天又叫酷吏付游艺纠合数百人“劝进”。后来，文武百官、和尚、道士等六万

余人也跟着上书，表示拥护改唐为周。天授元年（690），武则天改国号为周，号“圣神皇帝。”

武则天执政以来，继续推行唐初的基本国策：坚持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压抑部分士族，扶助新兴庶族；反对民族压迫，保卫边防安全。她虽然没有重大建树，但并没有把唐朝引向衰败。

武则天执政时期，均田制度还继续实施。当然，农民受田数量已越来越少，均田制的作用已很有限。

武则天很重视农业。她责成北门学士编写《臣轨》，亲自作序，并下令把《臣轨》作为举人考试科目，和九品官员必读之书。这本书很重视农业，在《利人章》中写道：“然俱王天下者，必国富而粟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劝农之急，必先禁末作。末作禁则无游食；人无游食则务农；务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故建国之本，必在于农，忠臣之思利人者，务在劝导。家足人足，则国自安焉”。她经常发布诏令劝课农桑，规定州县官的统治区，如果“田畴垦辟，家有余粮”者即可升官；反之“为政苛滥，户口流移”者要被降级。垂拱二年（686），她当了皇帝以后，更加抓农业。她还勅令大臣编一本《兆人本业》，颁发给朝集使，要求地方官搞好农业生产。这些政策对农业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农业生产发展的具体表现，首先是粮食产量提高和储备增加。我国考古学者于1971年在洛阳发现了唐代的含嘉仓，这个仓包括290个仓窖，每窖藏谷50万斤，仓储总额是5 803 400余石。含嘉仓还发现登记粮食的铭砖，年代可考者有天授、长寿、万岁通天、圣历等。长安四年（704），大臣杨齐哲说：“神都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行”（《唐会要》卷二七）。可见武则天执政时期粮食储备是相当丰富的。

兴修水利是农业发达的另一标志。例如光宅元年（684），于朗州武陵开永泰渠。垂拱四年（688），在巴西利用旧渠道开广济陂，灌田万余亩。于涟水开新弯渠，通海州、沂州、密州。证圣年

间，在宝应开白水塘、羡塘。圣历初年，于湖州安吉建石鼓堰，引天目山水灌田。

在政治上压抑贵戚和部分老士族，提高庶族地主的政治地位。武则天上台不久，便令许敬宗、李义府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规定凡是在唐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旧唐书》82《李义府传》）。这个做法，就是将参与唐朝政权的庶族都提升为士族，以压抑旧士族地位。

武则天继续发展科举制度，广泛罗致人才。隋和唐初举人答卷，没有糊名制度，评卷时容易营私舞弊。武则天上台后，改革科举中试卷管理办法，采用糊名制度，使评卷人不能了解答卷者的姓名，有利于人才的选拔。天授元年（690），她“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殿前试人自此始。”长安三年（703），又创武举，以后“每岁如明经、进士之法，行乡饮酒礼，送于兵部”，进行考试。在辅佐高宗时，已开“南选”，她称帝以后，“南选”更盛，从而使岭南、福建等边远地区的人才，得到当官的机会。

为了广揽人才，她创立“自荐”和“试官”制度，在各阶层中广泛罗致人才，结果使“天下残明经、进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扬，不曾试练，并与美职”（《朝野佥载》卷一）。未经考试“起家至御史、评事、拾遗、补阙者，不可胜数”。在乾封以前吏部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这种做法的目的是要以新官僚代替被罢黜的老官僚，尤其要以官位收买天下人心，寻找自己的支持者。但是，不可否认，武则天确实发现、提拔一批贤能俊杰之士。如文臣之中富有才干的狄仁杰、姚崇、魏元忠、杜景俭、郝处俊等；武将中有善于统军御敌足智多谋的娄师德、裴行俭、王孝杰、唐休景等；还有能急言直谏的李昭德、王及善、徐有功等。

由于武则天进行的一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士族势力，使庶族等阶层进一步上升，扩大了政权基础，又注意发展农业并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加之发展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从而在武则天统治

时期，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全国户口从永徽时的380万户，到她临终时增至610万户。

十三、武则天的统治（下）

武则天取得政权后，诛杀唐宗室贵戚，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发展。光宅元年（684）冬天，政治野心家徐敬业利用宗室贵戚的不满，在扬州组织叛乱。参加叛乱的都是被贬的失意官僚，对朝廷怨恨。这些人纠集起来在扬州组织叛军，以匡复唐室为名，反对以武则天为首的中央政府，企图取而代之。在徐敬业的煽动和恐吓下，一时参加叛军的有十万之众。叛军设立了匡复府、扬州大都督府，徐敬业自任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



武则天

匡复府成立以后，下一步怎样行动，几个头子看法不一致。当时军师魏思温说："从当前形势看，应先行北上，直奔神都。这样，山东豪杰在我们进军途中可能望风响应，天下垂手可得"。行军司马薛仲璋却认为：金陵是六朝故都，北有长江天险，南是鱼米之乡。首先应当南渡长江，占领常、润（今江苏镇江），作为称霸的基地，然后北伐中原。这样，进可攻退可守，此乃万全之计。徐敬业同意薛仲璋的主张。于是，他派左史唐之奇守扬州，自己率主力军南渡长江，夺取常、润。又派徐敬猷北上，攻占淮阴（今江苏淮安）。叛军进攻润州时遭到润州刺史李思文的反抗，曲阿县令尹元贞也领兵来保润州，经过激烈战斗，叛军终于占了润州。

正当叛军头子们得意忘形的时候，武则天临危不惧，当机立断，派遣左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侍御史魏元忠，率讨逆军30万众，日夜兼程开赴江淮前线。讨叛军总部临时设在泗州（今安徽盱眙对岸）。受叛军迫害的难民纷纷投奔淮北。徐敬业听说讨逆军前来，急忙从润州带主力部队回到扬州一带，暂屯下阿溪。另一支叛军在徐敬猷指挥下占领淮阴，别将韦超则屯兵都梁山（今盱眙县南）。

战争一开始，叛将韦超星夜逃窜，都梁山方面不战自溃。淮阴方面，徐敬猷节节败退，讨逆军顺利夺取了淮阴等地。大将军李孝逸乘淮阴大捷之机，率兵沿运河南下。在进攻江都下河溪时，战斗非常激烈。唐后军总管苏孝祥，乘黑夜率领五千人，乘小舟渡溪打击叛军，遭叛军伏击，讨伐军伤亡很大，苏孝祥当场牺牲，士卒溺死者两三千人。左豹韬卫果毅成三朗被俘以后，叛军对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劝他投降。成三朗痛骂叛军，坚贞不屈，终于慷慨就义。

大将军李孝逸亲自督军上阵，但初战不利。侍御史魏元忠建议："风顺荻乾，应当以火攻之。"叛军作战日久，士卒疲惫，纪律废弛。李孝逸因风纵火，大败叛军，斩首7 000余人，在溪中溺死者不可胜计。

叛军头子徐敬业带着妻子财帛逃往润州，准备流窜海岛。李孝逸分兵追击。徐敬业逃到海陵（今江苏省泰州市）一带，被其部将王那相斩首。王那相又杀了徐敬猷、骆宾王，拿着3个叛乱头子的脑袋投降李孝逸。徐敬业的余党魏思温、唐之奇也相继归案，传首神都。

徐敬业策划的叛乱，历时50余天，即被讨伐军平定。全国重新统一。

对于西域的安全问题，武则天也是比较重视的。从7世纪开始，吐蕃奴隶主贵族逐渐强大起来。咸亨元年（670），薛仁贵军在大非川覆没，西域四镇被吐蕃占领。长寿元年（692），王孝杰率兵大破吐蕃军，夺回了四镇，然后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屯兵镇守。当时朝廷内部对保卫四镇问题有两种看法，宰相狄仁杰认为西域地处边塞，多硗确之地，得到这块土地不能耕织，得其人不能增

税。而且国家连年出师，所费甚广，“调发日加，百姓虚弊”，“费用不支，有损无益”。另一方面，由于人民负担繁重，“相率为盗”。如果大乱爆发，国家前途不堪设想。为此，他主张放弃安西四镇，用全力维护中原。右史崔融主张维护西域，他说：“高宗时主管官员玩忽职守，未能坚守四镇，吐蕃因而强大，从焉耆而长驱东来，经高昌、车师、常乐，过莫贺延碛，就兵临敦煌。现在王孝杰一战收复四镇，怎能弃而不要？如果四镇失守，吐蕃一定占领西域，住在西域南部的群羌，势必投降吐蕃，吐蕃如果与群羌结合，河西四郡必受威胁。而莫贺延碛宽 2 000 里，没有水草，如果吐蕃控制了沙碛，我军便无法通行。这样一来，伊州、西州、北庭、安西将全部失守。”武则天接受了崔融的意见。武则天的决策对保卫西域、促进中外贸易，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万岁通天元年（696），吐蕃乘武则天反击契丹的时机，以和亲为名，企图诱使武则天放弃安西四镇，并要求分给突厥十姓的土地。武则天派颇有远见的郭元振出使吐蕃，郭元振回到神都以后，向武则天建议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武则天采纳郭元振的正确意见，吐蕃奴隶主贵族的阴谋未能得逞。后来虽然失掉碎叶，其他三镇一直掌握在唐政府手中。武则天在处理西域问题上，是具有一定功绩的。

以上是武则天的主要政绩，此外，在她执政时期，还有一些弊政。首先，武则天用人较滥，主要是重用武氏家族，如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武攸绪、武攸宁、武攸暨等。这些人不学无术、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却长期担任宰相、尚书、总管等要职，影响极坏。

武则天的面首也是她依靠的力量之一，如大流氓薛怀义，从得到武则天的宠爱以后，立刻飞黄腾达。他曾四次担任行军大总管，掌握数十万武装，多次战败，却被武则天重用 10 年之久。

其次，武则天晚年穷奢极欲。她迷信佛教，建筑兴泰宫等，“功费甚广，百姓苦之。”作明堂，“凡役数万人”；又作天堂，“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内，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

(《通鉴》卷二百七)。又作天枢，“买铜铁不足，赋民间农器以足之。”

第三，武则天称帝以后，社会矛盾进一步发展。当时阶级斗争最普通的形式是逃亡。一种是逃赋役，即所谓“偷避徭役”；一种是逃兵役，即所谓“违背军镇”；另一种是逃荒，即所谓“因缘逐粮”。为此武则天采取了相应措施，农民广泛开展逃亡斗争，使统治集团非常忧虑和恐惧。宰相韦嗣立说：“今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租调既减，国用不足，理人之急，尤切于兹”(《旧唐书》卷八八《韦嗣立传》)。因此武则天立即派遣使臣“括天下亡户”，规定：“其有诸州人，或先缘饥岁，流宕忘归”者，“并限百日内首尽，任于神都及畿内、怀、汴、许、汝等州附贯”(《全唐文》卷九五、武皇后《置鸣鸿宜鼎稷等州制》)。为了招诱逃户归业，还规定免除一二年租赋。

逃亡者越来越多，必然发展成武装暴动。狄仁杰指出：“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弘道元年(683)，绥州白铁余起义，攻陷绥德大斌县。在剑南道，出现三万逃户暴动，他们活动于果、蓬、遂、渠四州之地，“结为光火大贼，依凭林险，巢穴其中。若以甲兵捕之，则鸟散山谷，如州县怠慢，则劫杀公行。”“攻城劫县，徒众日多”(《陈子昂集》卷八)。

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矛盾虽然有所发展，但是，从总的情况看来，还不是斗争的高潮。

十四、“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开元之治”(上)

长安四年(705)正月，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文武大臣率兵进宫，杀了武则天的嬖臣张昌宗、张易之，拥唐中宗复位，取消武周国号。冬天，武则天病死。唐中宗李显即位，中宗庸懦无

能，专信韦皇后。当时以武三思为司空，安乐公主、太平公主都参与朝政。兵部尚书宗楚客、太府卿纪处讷、将作大匠宗晋卿等，都是武三思的党羽，武氏势力东山再起。景龙元年（707），皇太子李重俊约集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将军李思冲等，矫诏杀武三思集团十余人，太子也被韦后杀害。从此韦后更加肆无忌惮，韦后女儿安乐公主公开出卖官爵。这种官当时称“斜封官”，计数千人。


唐玄宗

景云元年（710），安乐公主为了让韦皇后临朝称制，自己当皇太女，便同韦后合谋杀了她父亲唐中宗。韦氏党徒分别统兵五万余人，准备拥韦后登基。李旦之子李隆基发动羽林军，打进宫里，杀掉韦皇后、安乐公主、武延秀，铲除武韦集团。随后，李隆基的姑母太平公主出面，恢复唐睿宗李旦的帝位。睿宗即位以后，立其子李隆基为太子。712年，睿宗让位给李隆基，即唐玄宗。开元元年（713）七月，玄宗杀太平公主门下的宰相窦怀贞、肖至忠、岑羲等，太平公主被赐死家中，从此唐玄宗才彻底掌握了政权。

在皇族内部争夺权力的同时，政治危机和边防危机都很严重，大江南北不断出现小股农民暴动，吐蕃、契丹、突厥等奴隶主贵族乘机侵犯内地。唐玄宗正视现实，大胆进行改革。

首先，改革吏治。开元年间，姚崇、宋璟、张嘉贞、张九龄等先后担任宰相。这些人各有所长，都能直言急谏，玄宗也能听取意见。

唐人杜佑说：“武太后临朝，务悦人心，不问贤愚，选集者多收之，故当时有车载斗量之谣”（《通典》卷十七）。这时，玄宗针对武则天“放手招官，不问贤愚”的作法，于开元三年（715）明确宣称：“官不滥升，才不虚受，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左贤右戚，岂资于谬赏”（《唐会要》卷八一）。根据这种精神，他先解决

了两个问题：一是裁汰冗员、精简机构，把武周中宗以来所置员外官、试官、斜封官数千人，一律撤销，节约了开支。二是恢复谏官、史官参加宰相议事制度。

玄宗还特别重视县令的选择，他说："郡县者国之本，牧宰者政之先，朕每属意此官，有殊馀职。"有时亲自出题考试，了解应考者是否通晓治国之道。凡考试成绩优秀者即被任用，拙劣者被罢免。在开元四年组织的县令考试中，有45人不合格，这些人立即被淘汰，"放归学问"（《通鉴》卷二百十一）。不仅如此，当县令上任以前，玄宗还亲自召见，面授机宜。唐玄宗对于那些在职的地方官员，还循名责实，进行比较严格的考核，作为黜陟的根据。为此，他专门颁布了《整饬吏治诏》，规定每年十月，委各道按察使"校量理行殿最，从第一等至第五等奏闻校考，使吏部长官总详覆。上等为最，下等为殿，中间三等依次定优劣，改转凭为升降，刺史第一与京官"（《全唐文》卷二十七《劝奖县令诏》）。这一政策的实施，对改善地方政治，起了一定作用。

唐玄宗把励行法治严明赏罚作为改善吏治的根本措施。他认为："有善必赏，所以劝能；有罪必罚，所以惩恶。"开元二十四年（736）以前，基本上贯彻了这种精神。例如，同州刺史姜师度非常重视发展农业，在他任职期间，组织同州农民开朝邑、河西两县的通灵陂，并"引雒水及堰黄河灌之"，种稻田二十万亩，因此唐玄宗为他颁布《褒姜师度诏》，赐帛三百匹，特加封金紫光禄大夫①。营州都督宋庆礼，组织兵民屯田80余所，数年之间，"仓廪丰实，居人渐殷"。宋庆礼因此被擢任御史中丞②。对于那些贪赃枉法之徒，不论职位高低，都依法制裁。如刺史裴景先，由于他私自聚敛五千匹绢，玄宗亲自下诏把他处死。前太子太傅萧嵩，由于向中官牛仙童纳贿，被贬为青州刺史。营州刺史张守珪，曾建立很

① 金紫光禄大夫：散官从三品，无具体职责，属荣誉衔。

② 御史中丞：御史台副长官，协助御史大夫监察各级官员。

大战功，但后来由于谎报军情，贿赂中使，被贬为括州刺史。

刺史县令是亲民之官，唐玄宗的改革政策，主要是通过他们贯彻执行。

其次，打击豪强大族，励行均田制度，并兴修了农田水利。8世纪初年，唐政府的勒索和大族豪强的土地兼并，使均田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时常无力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简单再生产，从而出现了“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的情况，而这些逃户，大都变成了豪强大族的“私属”。由于纳税者的减少，使政府内藏匮乏，水利失修，军备不整，国防空虚。唐玄宗执政后，为了挽救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便不得不和豪强大族进行斗争，从他们手里争夺土地和劳动力，以维护均田制度。玄宗一贯支持官吏打击豪强，李元纮任京兆尹时[①]，“诸王公权要之家，皆缘（郑白）渠立碓，以害水田”。元纮“令吏人一切毁之，百姓大获其利”（《旧唐书》卷九十八《李元纮传》）。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侵暴百姓”，强夺民田，有关人员打算依法制裁他。李业向玄宗求情，在宰相姚崇、卢怀慎的坚持下，唐玄宗依法惩办了王仙童，从此“贵戚束手”。开元初年虽然制裁一些豪强、大族，但从全国范围看，打击得很不彻底，也不可能是彻底的，当时仍然有不少黑地和劳力被豪强大族控制，从而使唐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为了挽救财政危机，从开元九年（721）至十二年，唐政府利用四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检田括户运动：勅令宇文融任全国覆田劝农使，下设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头到全国各地检查黑地和豪族、官僚等荫庇的劳动力；把检括的“籍外”土地没收，按均田制分给无地客户，对于“账外”人口，则重新登记注册，就地入籍，免六年租庸调，只交户税。这次括户运动的结果，中央政府增80万户，“岁终征得户税钱数百万。”

由此可见，检田括户运动的结果，加强了中央集权，增加了国

① 京兆尹：长安及周围22县的最高行政长官。

家的收入，限制了土地兼并，并借以缓和了阶级矛盾。从主流看，唐玄宗这一措施，确实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当时地主阶级中一部分人，如卢从愿、张说、杨瑒、皇甫憬等，却猖狂反对，他们宣称："括客不利居人，征籍外田税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补所失。"这完全是为那些"籍外占田"之人辩护的。因为在封建社会，有权在"籍外占田"的，主要是大族、官僚或豪强，普通农民根本没有条件"籍外占田"，至于非法荫庇客户者，更是那些豪绅之家。当然，在括户过程中，也有少数逃到荒僻地区的无籍户，又被重新套上封建枷锁，但这种人为数是很少的。

由于唐玄宗重视农业的发展，因此，开元年间，全国兴修很多水利工程，其中最著名的是蔡州新息县的玉梁渠，灌田 30 余万亩。蓟州三河县的孤山陂，灌田 20 余万亩。晋州文水县的甘泉渠、灵长渠，灌田数十万亩。综合起来，在唐玄宗执政期间，全国共建 56 个农田水利工程，超过高武两朝所建工程之和，相当于唐朝所修工程总数的 20% 以上（《新唐书》卷三十七至四十三《地理志》）。这些水利工程建设，对唐朝农业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第三，打击佛教势力，扩大中央政府的税源。唐玄宗执政以后，开元初年，下诏裁汰天下僧尼，当时各地还俗者 12 000 余人。同年八月，玄宗还下令严禁新造佛寺，并禁铸佛像，禁抄佛经。同时又禁止贵族官员与僧尼交际，使佛教势力受到很大打击。

第四，重视学术文化的发展。南北朝时期，文物典籍丧失殆尽，唐初虽然做了一些搜集整理的工作，但收获不大。到了开元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学术文化也有很大发展。玄宗任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他和储无量一道，共同组织搜集整理和编书事务。玄宗还亲自检查图书的编辑工作，并且下令在长安洛阳创设集书院，组织全国著名学者，叫他们集中力量著书立说。玄宗并敕令大府寺："每月给麻纸五千番，每季给上墨三百六十丸，每年给上好兔皮五百张为笔材。"以保证编书和抄书工作的顺利进行。宋朝史学家欧阳修颂扬开元年间编书的盛况说："自汉以来，史官

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九种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共著录 53 915 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 28 469 卷。呜呼！可谓盛矣”（《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

唐玄宗自己还是音乐家、戏剧家和诗人，他爱好文艺，附庸风雅。在两《唐书》的《音乐志》和《礼乐志》里，有不少是玄宗和妃子唱和共为欢乐的记载。

此外，唐玄宗还注意征召和培养各种人才，他聘请不少名流学者，充当其学术顾问。例如，张遂是著名的天文学家，由于拒绝和大贵族武三思合作，他隐居嵩山，当了和尚。开元三年（715），唐玄宗把张遂召到长安，让他当天文学顾问。张遂利用玄宗创造的条件，加上自己的辛勤劳动，终于创造出著名的《大衍历》，并指导实测地球子午线，成为历史上卓越的天文学家。玄宗还下诏征召大诗人李白，让李白做翰林供奉，给予优厚的待遇。李白以布衣应聘入宫，对当时文化界影响很大。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文艺的兴旺发达，是必然的现象。

开元年间的各项改革，确实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当时经济发展的情况，在唐人著作里多有反映。据元结（次山）说：

“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全唐文》卷三百零八《问进七》第三）。

唐人杜佑说：

“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

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恃寸刃”（《通典》卷七《食货典》）。

元结是天宝十二载（724）的进士，他是“开元之治”的目睹者。杜佑是唐德宗的户部侍郎和宰相，熟悉唐代社会经济。这两个人对“开元之治”的评价虽然不免含有溢美的成分，但他们反映的基本内容，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十五、“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开元之治”（下）

唐玄宗即位以前，边防危机十分严重。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奴隶主李尽忠利用民族矛盾，煽动其部众“举兵反”，并且攻陷了营州。接着，营州都督府管辖的连昌、师、鲜、沃、慎、瑞、信、黎、宾、夷宾、宾从等州也相继失守。因此，公元696年以后，这十二州的政府被迫迁到青、幽、宋、徐等州。武则天派王孝杰等组织反击，结果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大将王孝杰阵亡。从此以后，契丹贵族经常利用他们占据辽西的有利地位，疯狂掠夺内地，残害北方人民。

至于玉门以西，公元692年王孝杰虽然收复了安西四镇，但在11年以后（703），突骑施奴隶主贵族乌质勒又攻陷了四镇之一的碎叶镇，并“徙其牙帐居之”，从此“安西道绝”。乌质勒掌握14万武装，接着又向北庭都护府进攻，并强占了庭州西部一些地方（《通鉴》卷二〇七）。这不仅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同时也堵塞了“丝绸之路”，使唐朝对外贸易受了严重影响。

碎叶和庭州失守时，武则天已经80岁了，已无法解决西域问题。武则天死后，在中宗、睿宗执政年代，不仅政治腐败，而且宫

廷内部夺权斗争非常激烈，他们不想也不可能收复碎叶。这个担子，历史地落在唐玄宗的肩上。

在北方边区，从唐初战败突厥奴隶主贵族以后，便统一了大漠南北，设置单于、安北（燕然）都护府，分别管辖长城内外到贝加尔湖的广大区域。此后，长城以北保持数十年的相对安定局面。但是，到了7世纪末叶，唐朝北方门户云州（今山西大同市）被突厥攻陷（《旧唐书》《地理志》）。从此长城以南已无险可守。公元683年，突厥进攻蔚州（今河北蔚县）、定州（今河北定县）。由于长城以北大片领土失守，公元685年，唐政府把安北都护府临时侨置同城（《通鉴》卷二〇三），一直到开元初年。

从上述情况看来，到玄宗即位时期，西域的碎叶、庭州，北方的云州以北，以及辽西十二州，都已被突厥、契丹奴隶主贵族占领，陇右及河北人民经常惨遭劫掠和屠杀。唐朝全国统一的局面被破坏了。

唐玄宗执政以后，为彻底解决边区问题，采取了以下两项措施：

（一）整顿军旅。首先，他颁布《练兵诏》，敕令“西北军镇宜加兵数，先以侧近兵充，并精加简择，其老考等色，所司具以条例奏闻。战兵别简为队伍，专令教练，不得辄有役使。”不仅颁布诏令，而且还派兵部侍郎裴漼、太常少卿姜皎，往军州督促检查该诏令执行情况。

另一方面，7世纪末年，军马“潜耗太半”，玄宗即位时，只剩24万匹。为了加强军马的保养和繁殖工作，他任命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提高了工作效率。到开元十三年（725），军马增至43万余匹，“牛羊称是”。

（二）扩大屯田区，认真解决军粮问题。从中宗到开元初年，军费开支庞大，假若把全部经费都加在农民身上，不仅会引起阶级矛盾的激化，而且运输也有困难。于是唐玄宗敕令在西北万里的边

防线上及黄河以北部分地区，设置庞大的屯田区。现在把开元年间全国屯田区分布情况介绍如下：

河东道：大同军四十屯，横野军四十二屯，云州三十七屯，朔州三屯，蔚州三屯，岚州一屯，蒲州五屯。

关内道：北使二屯，盐州监牧四屯，太原一屯，长春一十屯，单于三十一屯，定远四十屯，东城四十五屯，西城二十五屯，胜州一十四屯，会州五屯，盐池七屯，原州四屯，夏州二屯，丰安二十七屯，中城四十一屯。

河南道：陈州二十三屯，许州二十二屯，豫州三十五屯，寿州二十七屯。

河西道：赤水三十六屯，甘州一十九屯，大斗一十六屯，建康一十五屯，肃州七屯，玉门五屯，安西二十屯，北庭二十屯，伊吾一屯，天山一屯。

陇右道：渭州四屯，秦州四屯，成州三屯，武州一屯，岷州二屯，军器四屯，莫门军六屯，临洮军三十屯，河原二十八屯，安人一十一屯，白水十屯，积石一十二屯，富平九屯，平夷八屯，绥和三屯，平戎一屯，河州六屯，鄯州六屯，廓州四屯，兰州四屯，南使六屯，西使一十屯。

河北道：幽州五十五屯，清夷十五屯，北郡□屯，威武一十五屯，静塞二十屯，平川三十四屯，平卢三十五屯，安东一十二屯，长阳使六屯，渝关一十屯。

剑南道：嶲州八屯，松州一屯。

开元二十二年（734），河南道陈、许、豫、寿州又置百余屯。二十五年敕："以为不便，并长春宫田三百四十余顷，并令分给贫民"（转引自玉井是博著《支那社会经济史研究》，岩波版第512页）。

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开元年间，全军屯田总数是 1 141 屯，面积至少有 500 余万亩。

屯田的分布，边区最多，占总数 82%。内地只有 18%，因为屯田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边防军的口粮问题。

在备战的基础上，玄宗开始收复失地，巩固边区安全，特别是致力于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开元五年（717），唐把沦陷 17 年的营州等十三州全部收复。玄宗派宋庆礼任都督，重建营州防务，开屯田 120 区。同时，长城以北的拔也古、同罗、回纥等也宣布取消割据称号，与唐政府合作。于是，重新恢复了安北都护府，统一了长城以北（《通鉴》卷二百一十一）。

解决西域问题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开元二十七年（739），唐玄宗派碛西节度使盖嘉运打败了突骑施，擒其可汗吐火仙，收复了碎叶，从而使沦陷 37 年的碎叶镇又重新回归唐朝。

第二阶段是击败吐蕃、小勃律，重新打通“丝绸之路”的门户。在开元初年，西域小勃律（克什米尔以北）可汗曾到唐朝请降，唐政府在他们那里置绥远军。天宝六载（747），小勃律王娶吐蕃王女，因附于吐蕃。唐玄宗派安西副都护高仙芝打败了吐蕃，俘虏小勃律王和公主，遣送长安。这一战争胜利以后，“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新唐书·西域传》）。唐朝重新打通“丝绸之路”，不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而且有利于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十六、繁荣富丽的长安城

唐代的首都长安，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也是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中心。长安城市的规划，对以后各朝及邻国的首都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长安城就是隋朝的大兴城，是由著名建筑家宇文恺设计的。从

开皇二年（582），动工兴建，到永徽五年（654）外郭城完工为止，前后经历了五十多年，这座都城的建设，是当时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长安城是一座规模宏伟的城市，据考古学者实际测量，城东西长9 550米，南北长 8 470 米，周长 30 余公里，全城面积 84 平方公里，等于今西安旧城的 10 倍，大于现在北京旧城，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

全城布局严整美观，由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外郭城从东西南三面拱卫皇城与宫城，这是百姓和官员的住宅区，也是长安商业区所在地。经考古发掘了解，外廓城全是板筑夯土墙，城基厚度 9 至 12 米。外廓城的形制，东西较长，南北略窄，成一矩形，四面各开 3 门，共 12 道门。

长安城内的街道，东西和南北方向排列，相互垂直，很像一块棋盘。南北大街共 11 条，东西大街 14 条。朱雀大街最宽，幅度达 155 米，其余各街宽度在 75 米左右，最窄的 25 米。街道宽窄的不同，反映了交通的特点。凡是通向六道城门的大街，由于行人较多，沿途车马频繁，所以街道较宽。全城街道两旁都有水沟，并种植槐树、榆树。长安大道笔直，绿树成荫，市容十分壮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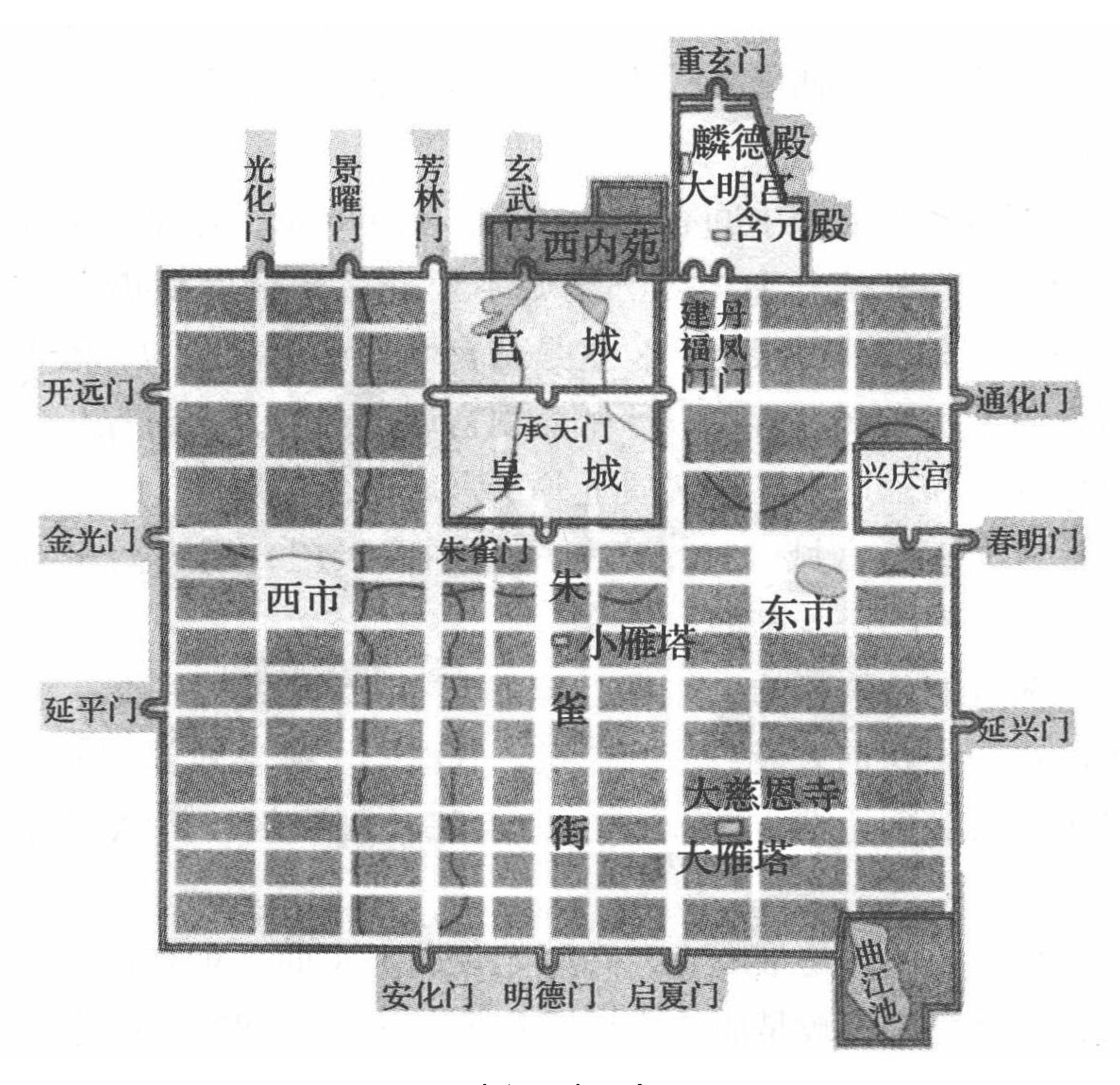
从外城南面的明德门进去，就是纵贯南北的朱雀大街，全长 4 500米，宽 150 多米。朱雀大街和连接皇城里的承天街，把长安城分为东西两半。东半部设万年县，西半部设长安县，分辖两地居民。城内划分 109 个矩形坊，各坊都有围墙，除了皇城以南 36 坊仅有东西街道，只开东西门以外，其余各坊都有东西南北十字街，四面各开一门。这些坊里都是庭园住宅。长安城内辟有专门的商业区，这就是东市和西市。

东西两市在朱雀大街的两侧，各占两坊之地。据实际探测，西市每边之长是 1 050 米。市内的井字形街道，把市场分为 9 个方块，每方的四面都临街道。当时的商店都设在各方的周围。

在西市的中央，近年发现有地面铺砖的房屋遗址，这大概是市署，即封建政府专门管理市场的机关。

据《长安志》记载，东西两市各有220行。其中最著名的，是西市大衣行、绢行、秤行、鞦辔行、侯景先当铺、卖蜡烛的窦家店等。东市和西市相仿，会昌三年（843）失火，一夜之间烧毁曹门42行4 000余家，其中包括铁行、肉行等许多行业。

东西两市店肆繁多，商业兴盛，长安城的居民，都仰给两个市场供应，有时皇宫内部的一小部分物品也从市场采购。东西两市虽然是长安集中的商业区，但在两市以外，仍然存在着一些商店和作坊。例如靖恭坊有造毡的毡曲，道政坊、常乐坊有酒坊，所产美酒誉满长安。崇仁坊有乐器作坊，其中以二赵家最为精妙。延寿坊有玉器作坊，颁政坊有馄饨曲，长兴坊有毕罗店（卖抓饭）等。



唐长安城示意图

由于商业发达，长安有很多茶肆、酒店、旅店、邸店等。例如崇仁坊、布政坊、延寿坊、延福坊、兴道坊、务本坊、长兴坊、永乐坊、靖安坊、亲仁坊、宣平坊等处，都有旅店。会昌五年(845)，日本高僧圆珍曾在春明门外的高家店和崇仁坊的王家店住过。邸店则兼营代理店的业务，代客存货卖货。

长安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有普通居民四五十万，如果加上皇族、士兵、奴仆、僧、尼、道、冠、外国人及少数民族，共计百万以上。据记载，显庆三年（658)，长安城里参观玄奘迎接慈恩寺碑的有 100 多万人。

从西市的北门出来向东走，穿过三条横街就是朱雀门，这道门是皇城南面的中门。朱雀门里就是皇城，皇城东西 2 500 多米，南北2 500多米，城周 8 500 米。皇城东西各两道门，南面有三道门。北面隔横街就是宫城。皇城的门都与外廓城门直接相对。皇城里有南北六条大街，东西七条大街。中央政府各机关都设在这里，构成全国的政治中心。

皇城以北与宫城中间有一条横街，宽 440 米，这是长安城中最宽的街道，实际是一个广场。皇城不设北墙，仅以横街与宫城相隔，而横街又设计得很宽广，这是从宫城的安全着想的。假若站在宫城南墙俯视皇城，就可以严密监视宫城以南各处，对保护宫城的安全特别有利。这个广场实质上等于宫城南面的屏障。

穿过横街是宫城，宫城南面中门叫承天门，承天门里有太极殿，西面是掖庭宫，东面是东宫。

太极殿就是隋朝的大兴殿，里面包括 16 座大殿。在承天门和玄武门之间主要是太极殿、两仪殿、甘露殿、延嘉殿等。另外这里还有中书省、门下省、宏文馆、舍人院及凝阴阁、望六亭等很多楼阁。

太极殿的西面是掖庭宫，乃嫔妃住所。东面是东宫，是太子宿舍及办公处。太极殿是唐初政治的中枢，贞观年间很多故事，都是在这里发生的。

从宫城的玄武门出来往东北走，便是大明宫。大明宫是贞观八年（634）唐太宗主持建设的。大明宫的正殿是含元殿，从高宗以后，唐代的政治中心就移到这里，国家大典多在这里举行。含元殿北面是宣政殿，宣政殿左右有中书省、门下省，其东侧是宏文馆和史馆。

大明宫里的另一重要建筑是麟德殿，这座殿在太液池西侧的高地上，当时国家宴会或外国使臣来朝，以及宰相奏事等，多在此处举行。

大明宫气势雄伟，壮丽辉煌，因此，唐高宗以后的皇帝多在这里居住。

从大明宫的东南角，经过夹城，顺城墙由东而南行，过通化门到达兴庆宫。兴庆宫是开元初年建设的，这是唐玄宗时期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兴庆宫中有兴庆殿、南熏殿、长庆殿、大同殿、勤政务本楼、沉香亭等建筑物。开元以后，唐玄宗政治中心从大明宫转移到兴庆宫，这是与兴庆宫距离曲江池较近有密切关系。到了天宝年间，玄宗沉醉于游乐宴饮，他和贵妃杨玉环长期住在这里，政治日益腐败。

长安人口众多，经济繁荣，寺观之多也是全国之冠，全城有各种寺院 150 多所，其中最著名者是慈恩寺。

玄奘的译经工作，就是在慈恩寺里进行的。寺内重阁复殿，有房屋 1 897 间，都是雕梁画栋，穷极华丽，是长安贵族官僚游乐的胜地，也是长安城戏场最集中的地方。玄奘为了储藏从印度带来的佛经，倡议在慈恩寺内建筑大雁塔。在建塔过程中，他亲自参加劳动，工程进展得又快又好。大雁塔最初有五层，高 54 米，砖表土心，仿西域佛塔的形式。后来又进行休整，现在的大雁塔共 7 层，高 64 米，平面为正方形，这是我国楼阁式砖塔的典型。

在长安的安仁坊还有一座荐福寺，建于嗣圣元年（684），是为高宗献福而立。唐中宗景龙元年（707），修建了寺塔，这就是

小雁塔，从此有了大小雁塔之称。小雁塔最初为15级，现在只有13级，高45米。明代因地震而损坏，解放后进行了修整，基本上恢复了原有的面貌。

曲江池位于外廓城东南角，是长安的著名风景区，有夹城复道与大明宫、兴庆宫相通。这里是封建帝王、贵族、官僚经常游乐的场所。

当时的长安城又是全国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不仅有各国人士来此观光学习，而且不少外国朋友长期住在这里，有的还在中国做官。如，大食人李彦升对中国文化造诣很深，进士及第，后来在唐朝服务。波斯首领穆诺沙于开元时期两次来唐，授折冲，留宿卫。天竺人迦叶济，唐德宗时期任泾州大将试太常卿。罗好心也在唐朝当过检校太子詹事。新罗人朴球当皇帝侍从，以碁待诏。高丽、百济有不少人担任武将，其中最著名者有黑齿常之、泉男生、泉男产、高仙芝、王思礼等。阿倍仲麻吕是日本文学家，在长安50余年，从校书郎一直升到秘书监，得到了很高的荣誉。中亚昭武诸国人士留长安任职的有康国大首领康鬱典，石城镇将康拂耽延及大兄弟地舍拨。流寓长安者有，玄宗时任安南都护、后来当鸿胪卿的康谦，德宗时期的琵琶名手康昆仑，著名画家康萨陀等。

从唐初直到开元年间，各国经常遣使入唐。例如唐太宗时期，康国献金桃、银桃，植于园囿。唐玄宗时，史国、康国又献胡旋舞女。太宗时波斯使者到达长安，献活“褥蚰”，能入穴取鼠。仅唐玄宗时期，前后即派使者来唐十余次，献纳波斯的土特产品。西方的拂菻（东罗马），曾五次派使者来长安，促进了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关系。

南方的天竺（印度及巴基斯坦），早在唐初，戒日王曾派使者到达长安，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唐玄宗时期，南天竺、北天竺、中天竺都遣使者来唐，献土特产品。

新罗人来长安者更多，唐政府在长安设立“新罗馆”，专门接待新罗商客。

当时离长安最远的国家是流鬼（堪察加半岛），他们也派使者到长安，唐太宗授流鬼使者骑都尉的官职。

长安又是全国宗教中心。从唐初开始，就有不少外国僧人来到长安。玄奘回国译经以后，中国的佛教更加发达，吸引更多的外国僧人来到这里，其中主要是天竺和日本僧人。例如，中天竺的波顿（光智）原是戒贤法师弟子，贞观四年（630），他到达长安，在兴善寺翻译《大楞严论》。永徽三年（652），阿地瞿多（无极高）自西天竺携梵经来唐。三年以后，中天竺僧布如乌伐耶也到达长安，被安置在慈恩寺。南天竺僧跋日罗菩提（金刚智）曾周游师子国和佛逝国，后来泛海到了广州。唐政府派人迎接他到慈恩寺译经。北天竺名僧阿目佉跋折罗（不空金刚），幼年曾随他叔父到过中国，开元时期又回国，周游五天竺，广求密藏。天宝年间，他重返长安，带回经论500余部，后来被玄宗召见，支持他翻译密宗经论。从此，密宗思想在国内广泛传播。

除了天竺僧以外，日本僧在长安的也不少，其中知名的有40余人，影响最大的为智通、智达等。高宗时期，他们进了慈恩寺，从玄奘学习法相，回国以后，成为日本法相宗的创始人。武周时期，道慈来长安学三论，后来成了日本三论宗的创始人。玄宗时期，荣叡普照在长安学习戒律，然后到扬州请鉴真东渡日本，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在唐宪宗时期，空海和尚来到长安，在青龙寺从惠果学习密宗经论，回国以后，带回大批中国新译的经典，宣扬密宗教义。唐末来长安的著名高僧是园仁，他从元政义真研究密宗，又向天竺僧宝月学习梵文，回国带回经论800余部，成为日本天台宗的五世座主。

由于长安居住着很多外国人和西域少数民族，他们长期与汉族人民杂居，生活上互相影响，特别是社会上层人士受外国人影响更为显著。例如，唐玄宗曾筑“凉殿”，大官僚王维设“自雨亭”。所谓“凉殿”，就是引水入室内，以转风扇，这是从拂菻（东罗马）传来的。

在服饰方面，唐初贵族外出，多着“羃䍦”①，把全身都遮住。到了开元时期，宫人骑马都戴“胡帽”，不再用“羃䍦”。贵族的服装也影响民间，当时长安有不少人着外国衣帽，学外国化妆技术。因此白居易说：“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

至于饮食方面，也受外国影响。有些人食饆饠（抓饭）、胡饼（塔纳）、饮波斯的三勒浆、龙膏酒。曲江池一带，开设不少波斯酒店，酒店里有外国女招待。著名诗人李白曾在这里醉酒。

在文娱方面，唐初由中亚传入的波罗球戏（马球），在长安颇为流行。凡是参加打球的，都骑在马上奔跑，挥杖击球，以争胜负。唐玄宗是打球名手。后来的唐穆宗、敬宗、宣宗、僖宗，也都是球迷。其中唐僖宗甚至以打球的胜败决定西川节度使的人选。

十七、曲辕犁和含嘉仓

——农业的发展

唐朝前期，由于社会比较安定，封建剥削相对减轻，农民多少占有一些土地，从而使当时的农业有了很大发展。



曲辕犁示意图

首先，唐代改进了生产工具。唐朝劳动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发明了曲辕犁。犁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我国最早的犁是用二牛抬杠，经过二牛三人耦犁，又发明了比较轻便的二牛一人犁和一牛双辕犁。到了唐朝，才发明曲辕犁，从此使我国的耕犁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并

① 斗篷。

且开始定型化。

曲辕犁是由犁镵、犁壁、犁底、压镵、犁箭、犁辕、犁稍、犁评、犁建、犁槃等十几个部件组成。曲辕犁的特点是结构完善，轻便灵活，能够调节深浅，只用一牛牵引，是我国古代进步的耕犁。首先，这种犁增加了犁底，改进了犁镵。唐朝以前的犁没有单独犁底，最早的犁底原来是犁稍的一部分，它和犁稍基本上是处在一条直线上，或者具有一定的弧度，下端安有犁铧。但是，唐朝曲辕犁的犁底是单独的，底长四尺，宽四寸。这种长犁底落地平稳，深浅固定，不容易左右摇摆，有助于装备犁箭和犁评设备，人扶犁也比较省力。

犁镵又名犁铧、犁冠、犁头。考古发现的唐朝犁铧种类多，分工细。大体上有四种形式：一种以河南陕县刘家渠出土的铁犁铧为代表，尖锋、三角形、两翼突出、宽大于长；一种是以山西天镇聂家沟出土的铁铧为代表，舌刃、铧身较长、后部内凹、长大于宽；此外，在山东莒县还出土一种三角形犁铧，尖锋、体小、长銎。《耒耜经》说，江东犁铧长一尺四寸，宽六寸，无疑是等腰三角形。可见唐朝的犁普遍趋向窄小锋利，这种犁铧入土以后阻力小，耕得深，证明了唐朝犁铧已有很大改进。

曲辕犁的另一优点是调节犁铧入土深浅的规格化。在唐朝以前，控制耕地深浅的方法是用犁箭，不用犁评。在这种情况之下，犁辕以上部分的犁箭，从上到下穿凿两三个孔，当犁建插入偏上的孔里，犁箭下降，使犁铧入土深；当犁建插入偏下的孔里，犁箭上升，犁铧入土也浅。

不仅如此，曲辕犁调节深浅的设备也前进了一步。具体地说，就是犁评规格化，它能进能退有深有浅。另一方面，以犁评调节深浅，比单纯使用犁箭优越得多。从陆龟蒙的《耒耜经》的内容看来，耕地的深度是由犁箭的长度决定的，犁箭的长度是被犁评支配的，而犁评又是套在犁箭上的，下有犁辕相依，上有犁键管制。犁箭、犁评和犁键三者既有分工又有联系，它们是互相制约的。犁

评、犁箭与犁键的有关联系，只有到了唐朝才规格化。

第三，在唐朝以前，直辕犁的犁架比较大，笨重，需要强悍的畜力，甚至有的犁还需要较多的人力，例如二牛三人的耦犁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其次直辕犁转弯幅度大，占地多。以上这些缺点对于精耕细作、推广牛耕、尤其对水田耕作都有一定局限。唐朝农民把直辕改为曲辕以后，使犁辕的长度缩短，直辕前及牛肩，曲辕只及牛后的犁盘就行了；犁辕缩短以后，原始的很长的犁衡也被淘汰了，这样使犁架变小，重量减轻，使曲辕犁具有轻便的特点。由于犁架的上述变化，也节省了畜力，只用一头牛牵引就行了，对于牛耕的推广非常有利。曲辕犁的出现，改变了古老笨重的二牛抬杠方式，出现了犁盘、耕索和曲轭等。这是我国耕犁一次重大的改革。

唐朝农民在犁耕以后，还使用爬（耙）和“砺砰”或“碌碡”去平治田地，用以爬除杂草、根、杂质。“砺砰”独用于水田，碌碡是水旱田兼用的工具，並且可以碾禾脱穗。唐朝由于使用曲辕犁和精耕细作，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再说灌溉工具。隋唐以前已有戽斗、辘轳、桔槔等工具，唐朝更普遍使用。此外，唐人又发明了一种利用水力转动的筒车。这种筒车是用竹或木制成的一个大型立轮，由一个横轴架起，轮的周围斜装上若干小木筒或小竹筒，安置在水边，转轮的下面一部分浸入水中，水流激动转轮，轮上的小筒就依次汲水到岸上的田里。这种水转筒车不但节省人力，而且不受涯岸之阻，能把低处的水引到山田，功效很大，是唐朝灌溉工具的一大进步。



筒　车

唐朝农业发展的另一标志，是水利灌溉业的大发展。唐政府非常重视水利事业，中央政府设有水部郎中之职，管理全国灌溉及航运事务。又有都水监和都水使者，管理河渠的修理和具体灌溉事宜。唐朝的《水部式》，就是关于河渠、灌溉、舟楫、桥梁以及水运等事的法令。

唐朝建国以来，兴修了很多大型水利工程。在河南道蔡州新息县（今河南息县）增修了隋朝的玉梁渠，灌田面积扩大到30多万亩。河北道蓟州三河县（今河北省三河县），有渠河堰与孤山陂，灌田30万亩。山南道李皋主持修复江陵县（今湖北江陵）的古堤，扩展良田50万亩。

宁夏平原的青铜峡，战国时开凿了秦渠，长达75公里，灌田18万亩。后来这一工程年久失修而逐渐废弛。到了唐朝，当地人民又进行了修竣工作，在旧渠的基础上扩建了唐徕渠。唐徕渠是从宁朔的大坝堡引水，流向东北，渠道基本上与黄河平行，中途并连贯湖泊，直达平罗的上堡闸。这条渠长达212公里，有支渠510条，可灌溉惠农、平罗、贺兰、银川、永宁、宁朔等县的60万亩农田。

在长江流域，李袭主持修筑扬州江都县（今江苏江都）的雷陂和句成塘，灌田八万多亩；韦损主持修复丹阳县练塘，周围80里，用以灌溉金坛、丹阳、延陵等地。剑南道开彭山县通济大堰，灌田16万亩。

在杭州，于西湖北面建石闸，用以控制水量，并在湖边筑堤拦水，提高水位，引水入官河为干渠，分别灌溉临湖一带农田十余万亩。

唐文宗太和七年（833），明州一带人民在它山地方，运用都江堰的施工经验，于河中垒石作它山堰，宽42丈，左右各砌36级石阶，上游水顺石阶下泻，分别流入大溪和鄞江之中。流入大溪的水，引到宁波的南门，汇合为日湖和月湖水库，再凿干渠和支渠，可以灌溉附近七乡的农田数十万亩。现在根据《新唐书·地理

志》，并参考其他史书，把唐朝所修水利工程，列表说明如下[①]：

地　区	前　期	后　期
关内道	11	13
河南道	20	7
河东道	16	2
河北道	54	3
陇右道	1	1
山南道	5	6
淮南道	4	13
江南道	22	49
剑南道	27	4
岭南道	3	3
总　计	163	101

从上表可以看出，有唐一代共修264项水利工程，前期最多，共163项，占总数60%。

由于唐政府十分重视全国的水利建设，结果使农业生产大大发展。“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的。

关于唐代贞观、开元年间粮食产量增长和国家富裕情况，除了本书上述提到的材料以外，还有理财家杜佑在《通典》卷十二里记载了天宝八载（749）的库存量。他写道：“凡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其中诸色存粮一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石，正仓存粮四千二百一十二万六千一百八十四石，义仓六千三百一十七石七千六百六十石，常仓四百六十万零二千二百二十石”。

① 邹逸麟：《从唐代水利建设看当时社会经济有关的两个问题》，载《历史教学》1959年第12期。

杜佑提供的数字是比较科学的，例如就“诸色仓”中的含嘉仓来说，天宝八载储粮就达583.34万石，相当291.67万个课丁一年应交之租。1971年，考古学者在洛阳发现了含嘉仓。这个仓城东西长600米，南北700米，共有259个仓窖，每窖储粮多者一万余石，少者数千石，还有50万斤粮食业已炭化。这个仓储粮的品种主要是粟，其次是大米。含嘉仓的粮食，主要是当时华北地区运来的租粟，以及江南运来的租糙米。

从诸仓的充实，可以看出当时唐政府的富足。至于私人地主，也很殷实。杜甫的《亿昔》诗写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

当然，诗与历史并不完全相同，这里不免有溢美的成分，但诗中形象地反映了唐朝开元年间的富足，还是合乎历史实际的。

十八、“齐纨鲁缟车班班”
——手工业的发展

唐朝手工业有官私两种，官方手工业是当时的主要工业部门，中央政府设立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来经营管理，最重要的有矿冶、造船、瓷器、铸钱、金银器、精美纺织业等。官方手工业分工极细，仅少府监的织染署就有25个作坊。官方手工业生产的物品，是供给皇帝、大贵族和政府部门的需要，不在市场出售。

官方手工业的生产者有短蕃匠、长上匠等，短蕃匠常有数万

人。他们是封建政府从全国各地征调的工匠，服役时间每年 20 天。这些工匠在官方手工作坊劳动没有任何报酬，甚至要自备口粮。因此，短番匠和农民一样，也为徭役所苦。不仅如此，政府有时还把手艺较好的短番匠留在官府作坊，用一般短番匠所交纳的代役钱作为他们服役以外的报酬，这样的工匠叫做“长上匠”。此外，属于“贱民”阶级的官奴婢、番户、杂户等，也都是官方手工业作坊的劳动者。奴婢常役无番。番户一年一番，杂户二年五番，番皆一月，不上番时也可以纳资代役。

官方手工业的原料来源，除了政府直接掌握的自然资源以外，便是地方的“土贡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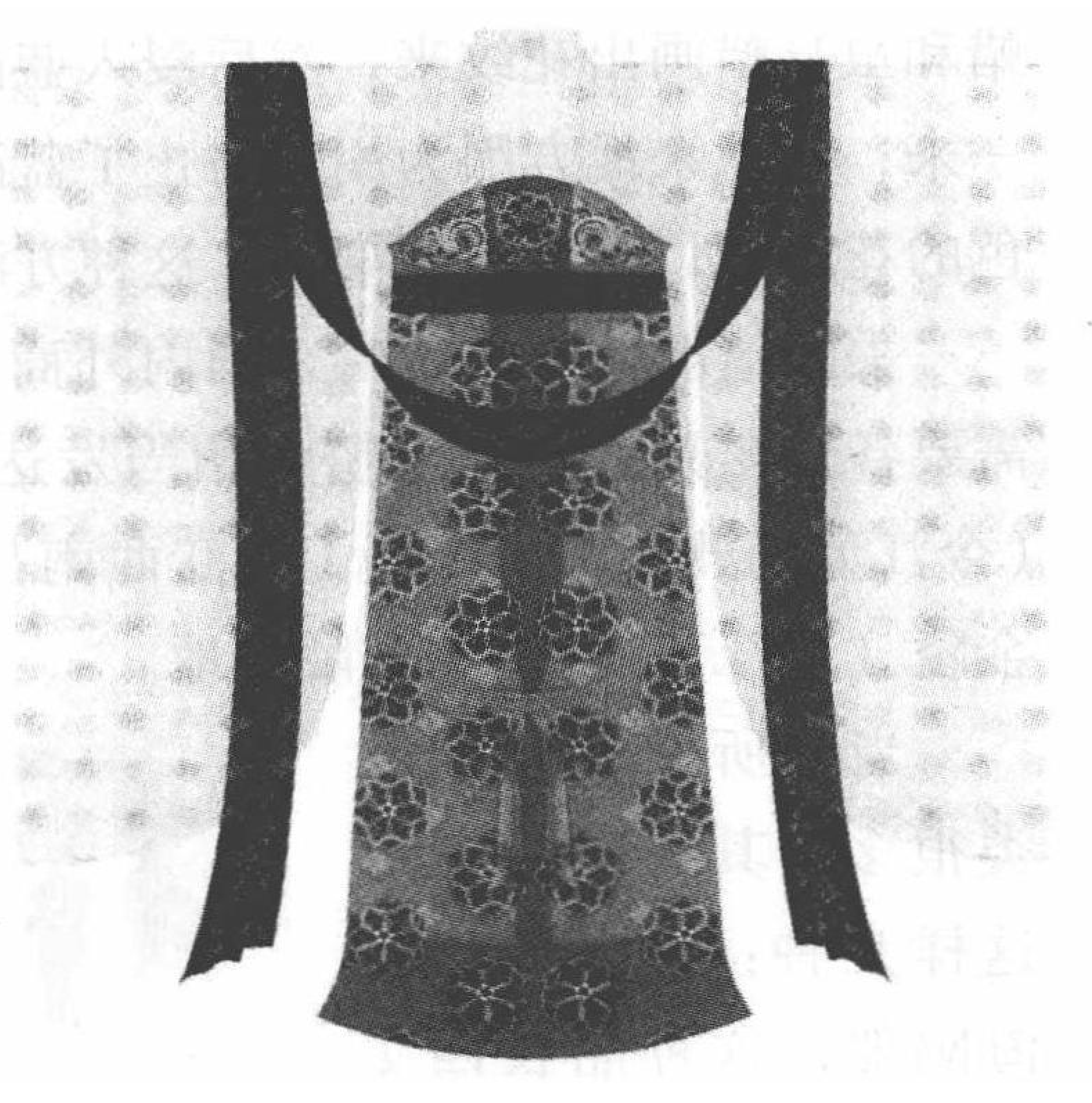
除了官方手工业以外，还有各种私营手工作坊，当时作坊称“坊”或“作”。作坊主有的是独立生产者，自己是师傅，或带领学徒及家属劳动。有些地主、商人、官僚也经营各种手工业。例如，定州何明远就是一个“资财巨万，有绫机五百张”的大作坊主，可见其纺织业的规模非常大。而农民的家庭纺织业又是相当普遍的。

唐朝的手工业，无论是技术水平，产品种类或生产规模都超过了前代。当时纺织业的分工非常细，主要有绢、绫、锦、纯、罗、布、纱、绮、绸、褐等。每种纺织品，按质量好坏划分很多等级，绢分八等，布分九等。特别是丝织品的品种花色更多，简直是争奇斗艳，琳琅满目。就绫而言，有独窠文绫、瑞绫、双窠细绫、白编绫、独窠司马绫等。至于锦，则有大张锦、软端锦、透背锦、大绸锦、长形白锦、半臂锦、杂色锦等。

当时纺织的技术很高，如长安生产的罗非常精致，唐朝诗人把长安的罗比做天空的云彩。李商隐曾有“万里云罗一雁飞”的诗句。从新疆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唐朝白地绿花罗，便可以真实地看到当时织罗的精湛技术。这块罗的经纬线细如毫发，光洁的罗面印着翠绿的枝叶，当微风掠过，轻罗如云雾缭绕，似香烟飘浮。

唐朝的纱也比汉朝高超，1968 年在吐鲁番出土的绛色轻容纱，

和马王堆出土的素纱相比，显得更加稀疏，织制精巧。当时贵族妇女生活奢侈，他们“嫌罗不着爱轻容”(王建：《宫词》)。所谓“轻容”，就是细纱。



唐代大袖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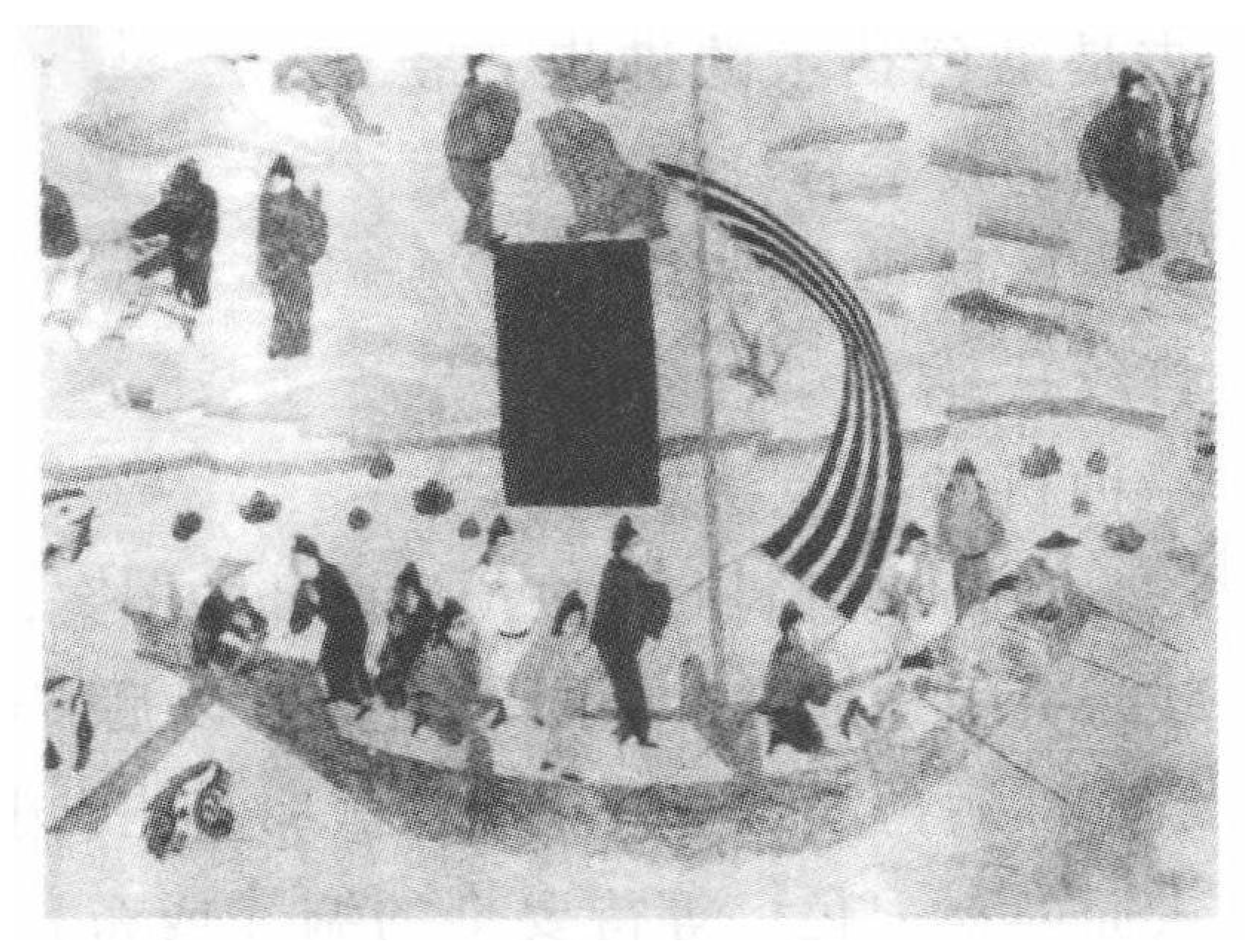
纺织业发达的另一标志是染色技术的进步，最著名的技术有绞缬、夹缬、蜡缬。所谓绞缬染，就是打绞成结而染，实际上是一种机械染色法。具体方法是在一块白绸上，按预先设计的图案，像做包纽一样用线沿图案线条缝引、抽紧，不同的是抽紧以后，还得结扎成各种式样的小绞，然后再浸到染液里染色。那些扎成小绞的地方由于染液透不进去而染不上色。等待要染的绸（或布）干燥以后，拆除缝线，就可以看见白色花斑，这种印染法叫做“绞缬”。在吐鲁番出土绞缬织物中，有比较简单的小簇花样，如蝴蝶、腊梅、海棠等，也有按整幅图案花样取名的，如白色小圆点的“鱼子缬”和“玛瑙缬”，紫底白花的好似梅花鹿皮的“鹿胎缬”等。唐朝这种绞缬织物相当多，因此当时小说里叙述唐朝妇女流行的装扮是“穿青碧缬，着平头小花草履”。我们从各地出土的唐三彩陶俑中，也可以看到穿着绿色底小簇白花衣裙女俑，这就是唐朝“青碧缬衣裙”的基本式样。到了五代十国，绞缬织物是当时统治阶级最时髦的服装。

还有一种染色工艺，叫做“夹缬”。吐鲁番出土的有夹缬被子，白居易诗曾提到“成都新夹缬”。所谓“夹缬”就是用两块镂花板把要染的织物夹起来，然后上色，上完色以后，再把镂花板取掉，便显露白色镂花。

另外还有蜡缬（或蜡染），这种染法是先在白绢上用熔化的蜂

蜡和虫日蜡画出花纹来，然后浸入蓝靛缸，再用水把蜡煮脱。这样一来，在原来地方因为用蜡防止了蓝靛浸入而未染上色，呈现出白色的花纹来，这就是蜡染法。这种方法在唐朝普遍推广于各地。

关于造船业，当时由于国内外商业繁盛，各地经济交流频繁，需要各种船只，所以造船业相当发达。造船中心主要分布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市）、洪州（今江西南昌市）、嘉兴（今浙江嘉兴）、金陵（今江苏丹徒）、江陵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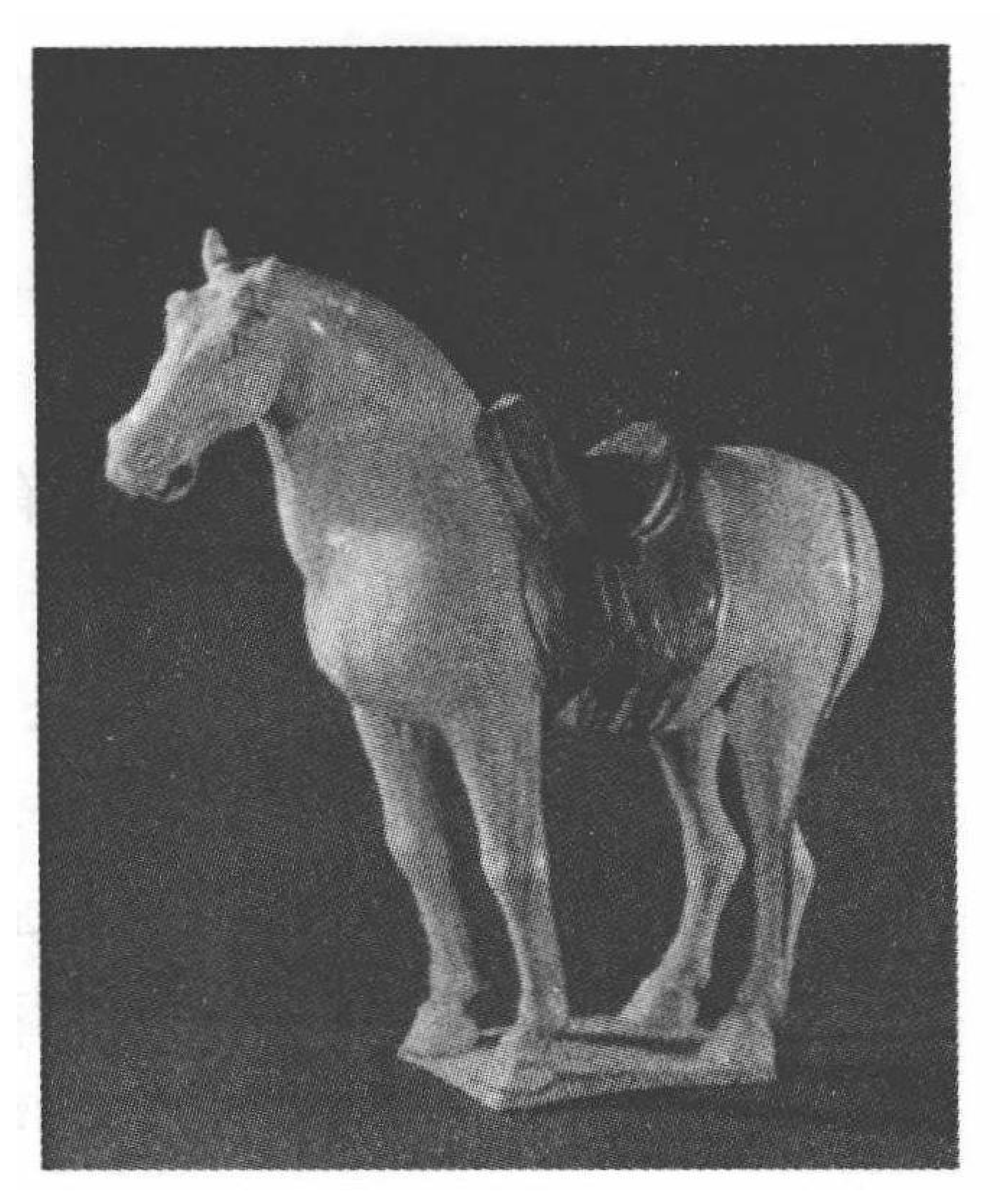
盛唐海船图（莫高窟壁画）

当时所造之船的种类很多，其中常见的有这样几种：一是四百料海鸥船，这种船长四丈五尺，设有四艕。二是一千料海鸥船，两侧设置五艕，辟舵一支，船通长十丈，共十一个仓，其梁头宽一丈八尺，中仓深八尺五寸，船底板宽四尺，厚一尺。可载战士 180 人，踏驾棹梢水手 42 人。三是万石船，“居者养生送死婚嫁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大”（《唐语林》卷八）。还有一种车船，是德宗时期李皋发明的。在船身前后设车轮以代替桡桨，用脚踏轮，就能使船进退。船上建有两重或三重楼。另在楼头设有拍竿，作为打击敌船的武器。

至于海船更加壮观。当时从印度洋到红海，都有中国制造的船只航行。据《苏莱曼游记》说，因为中国船最大，通过波斯湾过港时，必须换小船，中国航船因此博得“海上霸王”的称号。

陶瓷业也发展到新阶段，除了青瓷以外，又发明了白瓷和三彩陶器。当时江南的温州（今浙江温州市）、丽水（今浙江松阳县东）、高明（今浙江天台）、余姚（今浙江余姚）、新会（今广东

新会）、潮州（今广东潮安）等地，都产青瓷。全国解放以后，考古学者在广州、景德镇、巩县、耀县、成都、新津等地新发现了唐朝瓷窑遗址。这些发现，使我们对于唐朝的制瓷工业，有了进一步了解。新出土的器物中，有青瓷人尊、青瓷胡人头等作品，可以说是一种艺术品。这些青瓷上复杂釉色的发明和发展，以及艺术品的创造，都大大超过南北朝青瓷的水平。



唐三彩马

白瓷的发明是隋唐陶瓷工业最新成就，西安墓葬出土很多白瓷器，说明瓷器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唐朝后期发明了三彩陶器，当时工人在陶胎上先涂上一层有彩色的釉，然后画上黄、绿、青色花纹，经过烧制就成了鲜丽的三色陶器。最近几年考古发掘又发现了五彩陶乐人俑，比三彩的技术还要高超。唐三彩的成分是矽酸铅，和铅玻璃相同。呈色剂是各种不同的金属氧化物，例如浅黄的是铁或锑，赭黄为铁，绿色是铜，蓝色是铜或钴，紫色是锰。从出土的三彩陶的釉色看，当时对于选泥、配釉、造型和烧窑等技术，不但掌握纯熟，而且能造出许多精美的艺术品。



唐代越窑青瓷莲花碗

另一种手工业是焙制茶叶。南北朝时期饮茶之风主要在长江以南。到了唐朝，由于南北经济的交流，饮茶之俗，风靡全国。

茶叶生产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品种甚多，当时“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

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浥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芽；蕲州有蕲门团黄”（《国史补》下卷）。由此可见，唐朝名茶至少有20多种。我们虽然不能说这些品种都是有唐一代产生的，但是唐朝加以总结提高，逐一品评，证明这些品种已被唐人所了解，反映了唐朝茶叶焙制业的繁盛。

在唐朝，茶叶不仅是国内各地最畅销的商品，而且还有一部分远销新罗和日本，深受国际友人的欢迎。

造纸业也很发达，当时益州有大小黄白麻纸，杭、越、婺、衢州产上细黄白纸，宜州有细黄白状纸。此外，常州、均州、南和也盛产各种纸张。

采矿冶金方面，北方的兖州，有13处铁矿，18处铜矿，产铜铁很多。饶州是银产地，年产10万余两，唐政府每年在这里收银税7 000余两。唐朝铜镜制造技术有很大进步，扬州的江心镜，一直是当时的贡品。解放后考古学者发现大量唐朝铜镜，花纹装饰非常美观。

金银细工的制作，也比较发达，近年西安发现的许多唐代金银器，都是华贵的工艺品。在大明宫东禁苑中，发现了天宝时两个鎏金的银盘，较大的一个底上有突起的狮子纹。西安东郊韩森寨发现的鎏金鸾鸟大银盘，可能是兴庆宫的遗物。另外，在天宝九载雷氏墓的随葬品中，还有金花与金球。金花中镶嵌翠玉，花叶是用极细小的金珠连缀而成的。金球也是用密集的细小金珠缀成的，上镶绿玉，玲珑精美。这些金银器饰，都是贵族官僚的奢侈品。

金银平脱器是唐朝金银器行业中的最新产品。其制作方法是把金银叶片刻成花草或禽兽图案，用胶粘在器物上，然后涂满漆，再慢慢磨光露出金或银的图案花纹来。这种工艺品，漆黑、金黄、银白各种颜色互相辉映，光耀夺目。

唐朝建筑业也很发达，保存到现在的除大小雁塔以外，还有五

台县的佛光寺东大殿和南禅寺的大佛殿。佛光寺的东大殿是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建筑的，当时以东为上，故名东大殿。大殿外表朴素、柱额、斗拱、门窗、墙壁，全用土朱涂刷，来施彩绘。面宽七间，进深四间，单檐四阿顶。房瓦长一尺四寸，宽一尺零五分，厚八分。正脊两端用庞大的鸱尾。佛殿正面中五间都装板门，两尽间则装直棂窗，两山都砌雄伟的山墙，只有最后一间辟有直棂窗，殿内后部光线由此射入。檐柱头微侧向内，角柱增高，因而侧脚及升起都很显著。佛光寺大殿是我国古代建筑的第一瑰宝，这种建筑对五代以后的各朝建筑以及日本等国建筑，都有很大影响。

十九、商业和交通

唐朝农业和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交通的发达。当时以长安为中心，设置驿路，贯通于全国各地。在驿路沿线共建立驿站 1 639 所，接待过往的官员和使者。驿站附近并有私人经营的旅店，备有驿驴及酒馔，供客使用。

陆路方面有九条干线。

第一条，从长安经兰州、甘州（今甘肃张掖）到沙州（今甘肃敦煌），转入西域。或从兰州经鄯州（今青海乐都）到吐蕃。

第二条，从长安经兴元（今陕西南郑）到成都，由成都可达南诏。

第三条，从长安经东都、汴州（今河南开封），东北达登州（今山东蓬莱）。或从东都到幽州（今北京）。

第四条，从长安经夏州（今陕西横山附近）到中受降城（今包头附近）。

第五条，从长安经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太原，经幽州、营州（今辽宁朝阳）入安东道。途中从太原、云州（今山西大同市）可入回纥道。

第六条，从长安经襄州（今湖北襄阳）、江陵、潭州（今湖南

长沙）、衡州（今湖南衡阳）到广州。或从衡州经邕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到交州（今越南河内市）。

第七条，从长安经东都、汴州到扬州（今江苏扬州市）。由扬州渡江经润州（今江苏镇江市）、常州（今江苏常州市）到苏州（今江苏苏州市）。

第八条，从长安到襄州、随州（今湖北随县）、安州（今湖北安睦）、沔州（今湖北汉阳）、鄂州（今湖北武昌）、黄州（今湖北黄冈）、江州（今江西九江），最后达洪州（今江西南昌）。

第九条，从长安过襄州到荆州（今湖北江陵）、峡州（今湖北宜昌）、归州（湖北秭归）、夔州（四川奉节）；万州（今四川万县）、忠州（今四川忠县）、涪州（今四川涪陵），最后到达黔州（贵州贵阳）。

水路方面，当时各主要河流都可以通航。从长安经渭河入黄河到东都，经永济渠北达幽州。洛阳东南由通济渠可达扬州及东南各州。

另一路从长安经蓝田到商州（今陕西商县）共 200 里山路，从商州可以利用丹江、汉水到达长江。由长江顺湘江南下，经灵渠（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桂江、珠江到广州。

唐朝商业发达的另一表现是统一了货币，扩大了货币流通范围。武德四年（621），废除隋朝五铢钱，使用新铸的“开元通宝”。天宝时期每年铸钱 22.7 万千余贯，通行于全国各地。但有些地区，仍然使用绢绫作为交换的媒介，也有用金银作货币者。

商业的发达又促进了都市的繁荣。除首都长安以外，东都洛阳也很繁盛。洛阳位于长安到幽州、登州、扬州的驿路汇合点上，又是南北运河的中心。江淮的粮食和绢，大部分囤积在洛阳附近，然后再转运于长安等地。由于洛阳繁荣，有的皇帝长期住在这里，武则天就是这样。

扬州是东南的最大都会，既是南北交通的枢纽，又是出海的港口。这里“百货所集”，还经常住有波斯、大食、新罗等国商人，

是全国最繁华的都市之一。

成都是西南最大都市，附近盛产锦缎、纸张、茶叶，印刷业也很发达，同时又是通往南诏的要道。南诏和西南各族的留学生，很多人在这里学习。

敦煌是河西陇右主要城市，是外货商人必经之处，也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据点。这里的千佛洞是壁画和泥塑的最大宝库。

唐朝不仅几个大城市的商业发达，一些中小城市也出现了行会组织。解放后在发掘整理房山石经的过程中，从石经题记里发现很多唐天宝元年间北方州郡的行会资料，其中属于范阳郡的行，有绢行、大绢行、小绢行、采帛行、帛行、小采行、新绢行、布行、染行、幞头行、大米行、白米行、粳米行、五熟行、生铁行、炭行。属于幽州的有油行、磨行。属于涿州的有肉行、果子行、椒笋行、新货行、靴行、杂货行、磨行等。这说明唐朝后期中小城市工商业也很发达。

正因为中小城市商业的发展，因此大中五年（851）唐宣宗下令：大都督府置市令一人，掌管市内交易；通判市事丞一人，掌判市事。此外还有佐一人，史一人，师一人。并且规定 3 000 户以上的县，就要设置市令。由此可见，唐朝全国各地的工商业，普遍有了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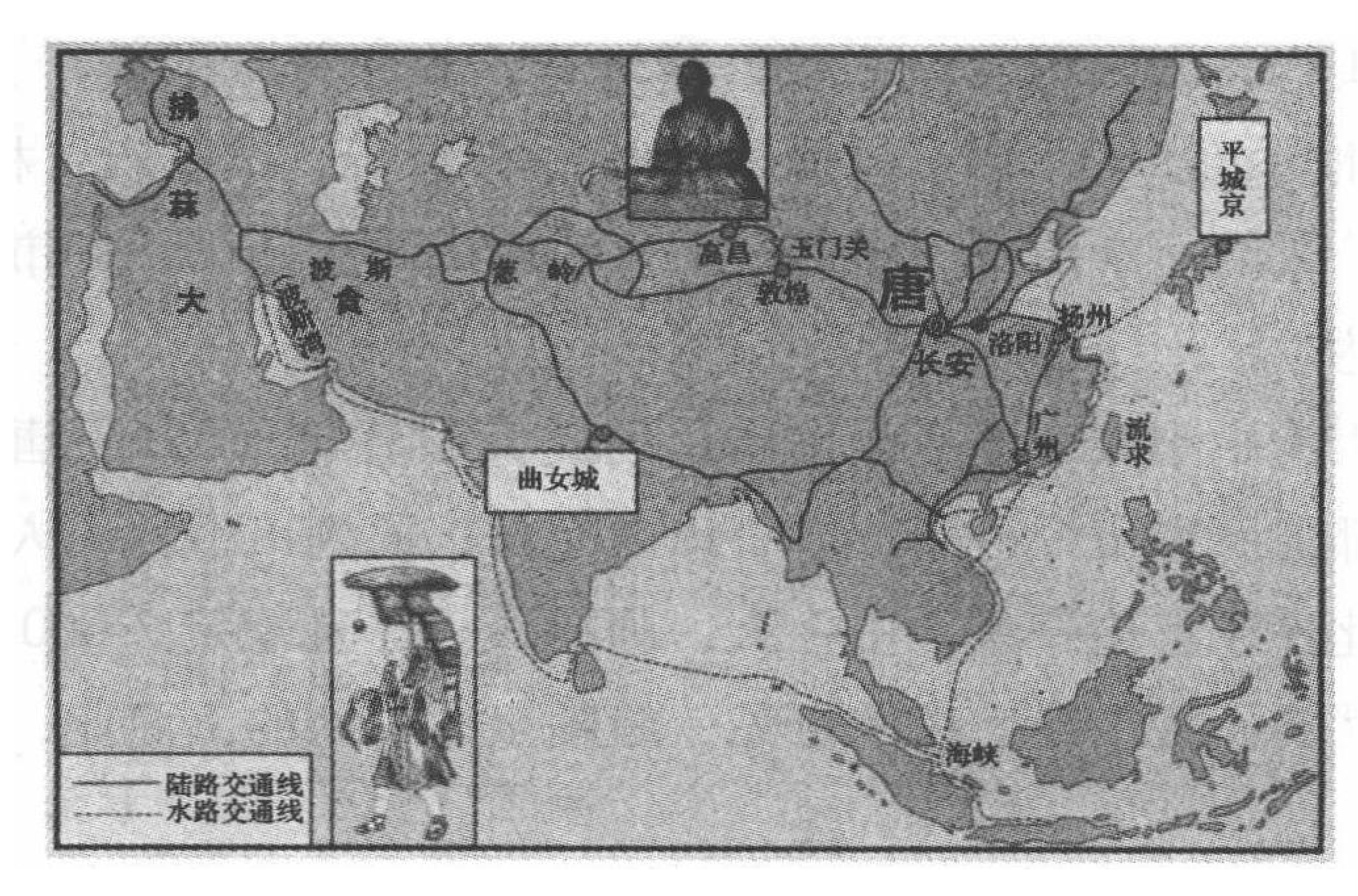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唐朝前期，封建政府限制商业自由发展，市场交易必须在正午以后进行，禁止夜市。到了后期，不少大城市都出现夜市，政府已无力禁止。扬州的夜市非常繁荣。诗人王建写道："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升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据记载，苏州、杭州、成都等地，也有了夜市。

农村则普遍存在草市和墟市，进行定期的贸易。其中有一部分草市，逐渐发展为小城市。

由于商业活动的频繁，很多城市都设有邸店，专门办理存货、交易和接待客商事务。由于邸店获利丰厚，所以不少贵族官僚纷纷设置邸店，与民争利。

当时商人经常进行大宗交易或远方贸易，须要携带很多铜钱，既不方便又冒风险。适应远方贸易和大宗交易的需要，社会上出现了“飞钱”（便换）。这种“飞钱”，就是原始汇票。使用方式是“商贾至京师，委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

商业发达的另一标志，是出现了信用机构，就是柜坊。柜坊是存款借款之处，如同钱庄。柜坊大约在唐德宗以前就已出现，每当柜坊收到存款后，便交给存户一种特制的信物，将来存户取款，经柜坊验证信物方可付款。柜坊本身是由邸店分化出来的，无论借款或存款，都要交纳柜租。



唐朝对外交通图

隋唐时对外贸易也非常发达。东与新罗、日本贸易繁盛，西与中亚、西亚诸国通商，南与印度洋沿岸诸国都有商业往来。

国际通商路线，在西北是陆路，在东南主要是水路。陆路方面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间，就是那条著名的“丝绸之路”。这也是古代横贯亚洲的交通线。大约在公元前两世纪以后，大量的中国丝织品便经过此路西运，因此这条路称为“丝绸之路”。其他商品以及东西方各种经济文化的交流，在唐代主要通过此路。

“丝绸之路”主要有三条大道。“北道”是循天山北路，从敦煌出发经伊吾（今哈密）、蒲类海（今巴里坤）、西突厥可汗庭

（今巴勒喀什湖南部），转东罗马，出地中海。“中道”是走天山南路的北道，由敦煌起程往高昌（今吐鲁番一带）、焉耆（今焉耆）、龟兹（今库车）、疏勒，越葱岭而达波斯。“南道”是走天山南路的南道，从敦煌经鄯善、于阗（今和阗），过葱岭及吐火罗至北婆罗国（今北印度）。

海路方面，与大食、波斯及南海（印度洋）诸国的商路，都从广州出发，主要经过真腊占不劳山（今越南东二百里海岛）、海峡（今马剌峡海峡）、罗越国（今泰国）、佛逝国（今苏门答腊南部）、诃陵（今爪哇）、哥谷罗国（今苏门答腊西北部）、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莫来国（今印度西南海岸）、拔风日国（今孟买），再西行到弗利剌河（今幼发拉底斯河）而达末罗国（今巴拉斯）。当时从广州到达波斯湾全程需要 89 日（沿途停留时间除外）。每次都要等候十一二月季节风到来时才能从广州起程，因此，到波斯大食的船只，必须停留到第二年五月才能回国。这条航线的中心是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大食和波斯的船舶经常从师子国出发来广州，也有的船只从师子国出发西行，经由波斯湾转亚丁或东非洲。当时从师子国到广州的航路掌握在大食人之手。8 世纪初期，大食帝国的势力逐渐强大，吞并了北非、西南亚及印度河口。因此，8 世纪以后的几百年中，大食人控制了印度洋的航路。

唐朝通达日本的航线有南北两路。北路从登州出海，过渤海海口，沿辽东半岛及朝鲜半岛到达新罗再转日本；南路从扬州或明州（今浙江宁波）出发，横渡东海经值嘉岛（今五岛列岛）而达博多湾。值嘉岛在唐朝以后是中日交通要冲，无论南路和北路的船只，都要在此处停泊。这一路船只航行时间很短，一般只需要 3 至 6 昼夜，超过 10 昼夜的时候很少。8 世纪以后，这条航线比较安全。

商业的发达促进了造船业的发达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当时最大的海船长达 20 丈，载六七百人。船里设备相当完善，上面各有武器及药品和其他生活用品。在航海技术上，无论在印度洋和太平洋航行，都能运用季节风。到大食波斯的船只，“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萍洲可谈》卷二），往

返于日本的船只，也利用季节风。

隋唐时由于对外贸易的发达，朝廷设有专门机构来管理对外贸易。隋朝在京城建国门外设有四方馆掌管对外贸易，主管东方的称“东夷使者”，北方称“北狄使者”，使者共4人。四方馆内设置典护、录事、叙职、叙仪、监府、监置、互市监等，管理外国商人和国外贸易的具体事务。

唐朝对外贸易空前发展，除了管理陆上贸易的机构以外，更在广州设置市舶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关机构，其职掌是管外国船只及外商的一切事务，检查外国船的商品，征收关税，保护外商，检查出港商船等。另一方面，也管理唐朝开往国外的商船，检查货物，征收关税，登记船舶起程及归航日期等。

隋唐政府为了取得大量珍贵物品，并能提高自己的威信，因而对外国商人都采取优待政策。唐文宗曾下诏说：“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怨嗟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守节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尤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全唐文》卷七十五）。大食、波斯、中亚、南海诸国，日本、新罗商人在唐朝居住者甚多。广州、扬州、明州、登州、泉州、楚州、长安等地都设蕃坊，听任外商居留，并在法律上予以优待。

唐朝著名的外贸港口是广州、扬州、交州、泉州、明州等地，其中以广州最大。自两汉以来，广州就是南方门户。到了隋唐时期，广州不仅是全国第一大港，而且成为世界大港，各国的商船络绎不绝。据张星烺先生统计，唐朝广州每天平均有11只船舶到达，一年4 000余只。在广州设有蕃坊，专门居住外国商人，设置蕃长、都蕃长管理蕃商事务。都蕃长和蕃长由蕃商自己推举，经唐政府任命。都蕃长除了管理蕃商事务以外，还协助唐政府招徕外商。当时在广州居住的有大食、波斯人、天竺人、师子国人、真腊人、诃陵人等共约10余万。

当时出口商品，主要是各种丝织品、陶瓷、茶叶和纸张等；进

口货物主要是珍珠、宝石、香料、药品、犀角、象牙等。

唐朝对外贸易的范围，扩大到亚洲大部和欧洲、非洲一部分地区。除商人贸易外，封建国家在交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唐政府常通过“朝贡”形式进行各种贸易。例如：永徽七年（656）正月，“波斯遣使献方物，……各赐帛百匹，”“永徽七年四月乙卯，吐火罗首领摩婆罗献狮子及五色鹦鹉，……劳赐锦采五百匹。”“开元十七年九月，大食国遣使来朝，且献方物，赐帛百匹”（《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一、九百七十四）。这类事实，在《册府元龟·外臣部》里记载了很多。各国朝贡时，朝廷都有“回赐”。这种朝贡形态的贸易，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很久，直到宋明，对外贸易的主要形态仍然是“朝贡”。关于“回赐”的含义，我们从宋朝对外贸易史料了解得十分清楚。例如北宋熙宁六年（1073）十二月十六日，大食俞卢和地国遣蒲罗说来贡乳香等，宋神宗令“依广州价回赐钱二千九百贯，别赐银二千两”（《宋会要稿》蕃夷四）。由此可见，“回赐”就是对外国商品付款，而“朝贡”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形态。因此，10世纪外国旅行家夏德说：“这种朝贡的记载，表示大食商人和中国朝廷间商业关系的密切”。

二十、渤海与黑水府

渤海（粟末部）与黑水部是靺鞨中最强大的两部。靺鞨人的祖先，在商周时称为肃慎、息慎，两汉至东晋时称挹娄，南北朝称勿吉。勿吉分为七部：即粟末、黑水、安居骨、拂涅、号室、伯咄、白山。到隋唐称靺鞨，而七部的名称不变。唐朝靺鞨七部的分布大体如下：

粟末部：在靺鞨中地处最南，位于徒太山（今长白山）北，依粟水（今松花江），南与高句丽为邻，西接契丹，大体分布在以今吉林市为中心的松花江中游广大区域。粟末靺鞨靠近内地高度发达的封建文化地区，受汉族的影响最大，因此靺鞨社会的发展比较快。当时粟末靺鞨有兵七千，常和高句丽发生战争。在隋文帝时，

粟末靺鞨曾派使者到达长安，文帝要求他们和契丹和睦相处。粟末靺鞨向往内地文明，“与边人来往，悦中国风俗”。又加上不堪高句丽的骚扰，其中有不少人移居内地。隋朝末年，酋长突地稽率部千余家内属，住在营州，被封为辽西太守。唐初拜右卫将军。其子谨行，任营州都督，封燕国公。

伯咄部：在粟末部以北，因为靺鞨各部之间相距二三百里，因此推测伯咄部大体分布在拉林河流域，相当于现在吉林省舒兰县和黑龙江省的五常县一带，有兵七千。

拂涅部：在伯咄部以东，分布在今兴凯湖一带。

号室部：在拂捏部以东，分布在苏联沿海州。

安居骨部：在伯咄部东北，分布在黑龙江省宁安——牡丹江市为中心的牡丹江流域。

黑水部：在安居骨部的东北，是靺鞨各部的最北方，大体分布在松花江和黑龙江的合流处及黑龙江下游广大地区。以室建河（黑龙江）为界，分成南北两部，共有十六个部落，在靺鞨七部当中，黑水部以英勇慓悍著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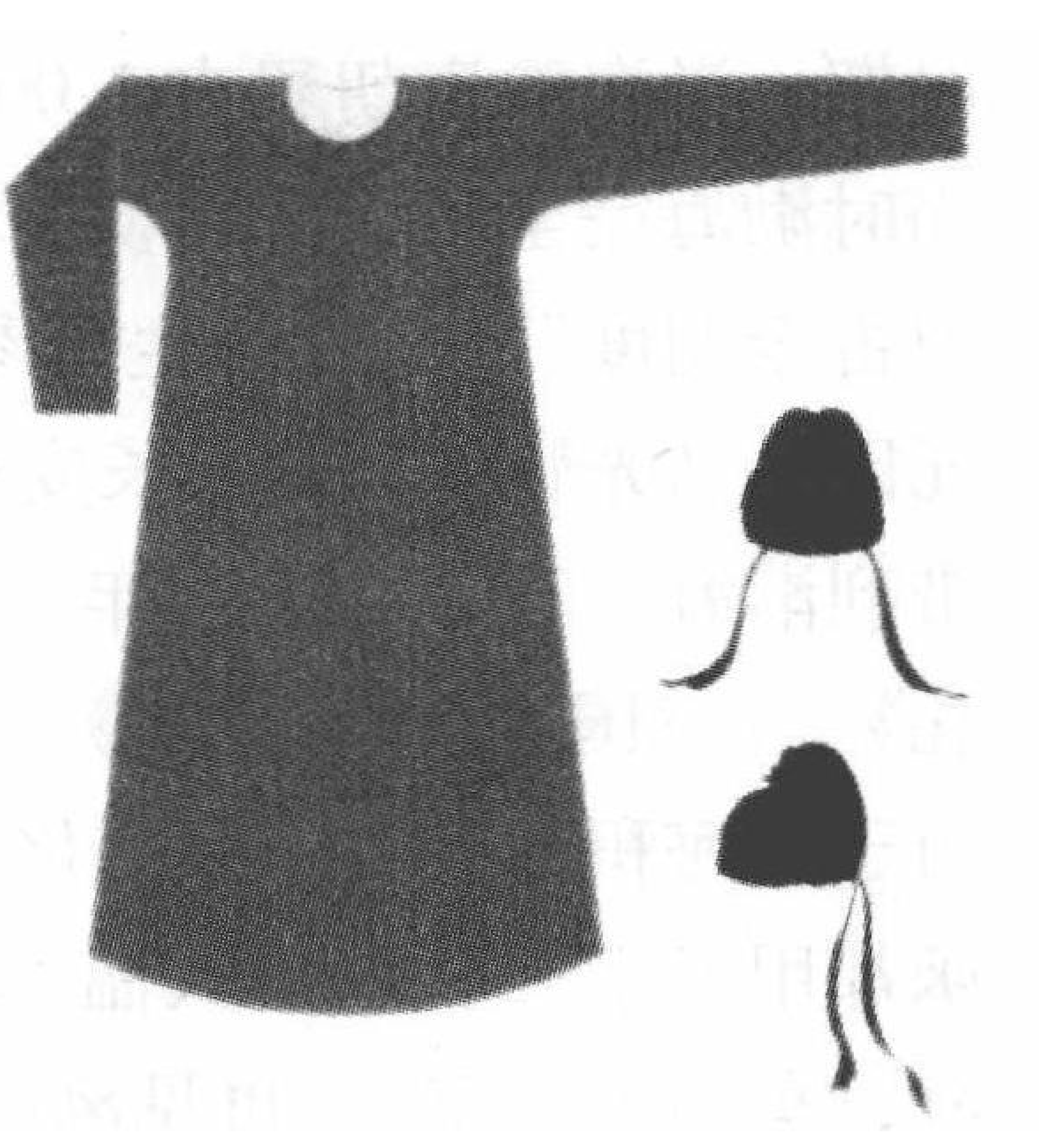
白山部：在粟末部东南，大体分布在今延吉、珲春为中心的延边广大地区，有兵三千。白山部和高句丽为邻，受高句丽统治。白山部接受了高句丽文化。高句丽灭亡后，很多白山人移居营州（今辽宁朝阳）。

唐王朝建立以后，加强了对东北的管理，东北各族也进一步密切了和中原的联系。

营州都督府是唐朝统治东北的政治中心，万岁通天元年（696），营州都督赵文翙残酷压迫契丹等族人民，激起了契丹等族人民的不满。松漠都督李尽忠及其内兄孙万荣联合各族人民反抗，杀了赵文翙，占据了营州。万岁通天二年（697），武则天派20万人去镇压，契丹大将李楷固、骆务正投降。

当时徙居营州一带的靺鞨人、高句丽人曾参加李尽忠的反唐队伍，武则天为了分化他们，封靺鞨酋长乞四比羽为许国公，封粟末

靺鞨的乞乞仲象为震国公。乞四比羽拒绝封爵，和乞乞仲象率领靺鞨和高句丽人，乘唐政府内部混乱之机，离开营州一带，东渡辽水（即辽河）。武则天令李楷固率兵追击，杀了乞四比羽。乞乞仲象去世，其子大祚荣，为人骁勇，善于用兵，团结了靺鞨人和高句丽人，和李楷固大战于天门岭，楷固败归。圣历元年（698），大祚荣乘突厥侵扰定州、赵州之机，率领靺鞨人和高句丽人，向东进军，回到太白山（今长白山）东北奥娄河（今牡丹江）上游一带。在营州接受了中原高度文化影响的大祚荣，于东牟山建筑敖东城（今吉林敦化），自立为王，仍称靺鞨。


唐代官员冕服

那时靺鞨各部，有的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有的已进入阶级社会，其中粟末白山部正处在封建社会。大祚荣为了对抗唐王朝的民族压迫，加强对靺鞨各部和高句丽人民的统治，收拢联络四处奔散的粟末、白山、伯咄等靺鞨和高句丽人，依靠靺鞨贵族和高句丽贵族，以现在的宁安敦化为中心，建立起封建地方政权，称“渤海”。渤海西接契丹，东涉日本海，南与新罗以泥河为界。方圆数千里，有兵数万，户十余万。

神龙元年（705），唐王朝派遣侍御史张行岌招抚靺鞨，大祚荣派中子大门艺入侍唐王朝。开元元年（713），唐玄宗派鸿胪卿崔忻，以使持节宣劳靺鞨使的名义，从长安出发，来到旧国（今敦化），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在其统治区设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以后，这里的靺鞨专称渤海，渤海的统治者接受唐王朝的封号成为忽汗州都督。

渤海的政治经济文化，完全仿效唐朝，中央政府的“政事省”，相当于唐朝的尚书省；“宣诏省”相当于门下省，“中和省”相当于中书省。武职则有大将军、将军、节度使、州刺史等。全区

分为5京15府62州，共辖130余县。渤海的县很小，相当中原的乡，每乡都是一个生产单位。

据《渤海国志长编》记载，当时渤海的农产品有稻、麦、粟、豆、棉花、豉、皮革、石砮、玛瑙环；牧业养马、牛、羊等；药品有牛黄、麝香、人参等，其中部分产品输入中原。唐政府在青州设有渤海馆，专门管理渤海贸易。双方的贸易关系非常密切，唐玄宗时期，渤海赠唐朝貂皮1 000张，唐以锦、绢帛、金银器皿回赠。当时渤海完全吸收了唐朝文化，他们曾多次“遣诸生到京师太学，习古今制度”。有些学生还参加了长安的科举考试，如乌炤度、高元因、乌光赞等，都在长安中了进士，这些人把唐朝的制度和文化带到渤海。开元二十六年（738），渤海遣使到长安，“求写《唐礼》、《三国志》、《晋书》、《三十国春秋》”，得到唐政府的支持。由于渤海积极吸收中原文化，所以渤海文人都用汉文作诗，来往公函都用汉字。唐末诗人温庭筠送渤海王子的诗曾说：“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可见渤海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中原基本相同。

黑水靺鞨位于黑龙江下游，其风俗好编发，缀野猪牙，以雉尾为冠饰，居住半地穴式的房屋。他们使用车马，“田耦以耕”，产粟麦。用石镞，善射猎，家家养猪，富家养猪甚多，有的可达数百头。黑水靺鞨各部的发展很不平衡，有的部落已进入阶级社会。

黑水府的设立，比渤海略晚。开元十年（723），黑水部首领倪属利稽到达长安，唐玄宗任命他为勃利州刺史。又有安东都护薛泰请置黑水府，以其部落酋长为都督刺史，所以唐玄宗任倪属利稽为云麾将军领黑水经略使，后改为黑水都督。直属唐幽州都督府，中央政府另派长史于黑水府“监之”。

唐朝黑水靺鞨分为南北十六部，管辖很多州，但除了勃利州以外，对于其他州史书没有记载。关于勃利州的具体地点，清人曹廷杰说：“唐勃利州就是辽五国部之一的博和里，也就是乌苏里江与黑龙江交汇处的伯力（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吉林通志》载：“今富克锦东北境外有伯力地方，音译方隅皆合，或当是也。”

以上两说都证明勃利州是在伯力。

黑水靺鞨的分布情况，也就是黑水都督府的管辖范围。据《唐书·靺鞨传》载，其领土“南距渤海，北东及于海，西抵室韦，南北广袤二千里，东北千里。”由此可见，黑水靺鞨主要分布在今黑龙江下游，被黑龙江分为两大部分，一直到黑龙江东流入海，其东境接今鞑靼海峡，北临北海，即今鄂霍次克海。

黑水靺鞨虽然包括十六部，但现在只知道八部，据《新唐书·靺鞨传》说：“黑水西北有思慕部，益北行十日得郡利部，东北行十日得窟说部，亦号屈设，稍东南行十日得莫曳皆部。又有拂涅、虞娄、越喜、铁利等部。”其中拂涅、虞娄、越喜、铁利部在唐末被渤海吞并。这四部大概是黑水靺鞨的南部，分布在松花江与乌苏里江之间及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带。至于思慕、郡利、莫曳皆、窟说四部，都在黑水府东北，其中窟说部，从方位与对音都和库页岛相合，可能是库页岛最古的译名。

黑水靺鞨的铁利、拂涅、虞娄、越喜等部，从唐初直到德宗时期，不断派使者到唐朝贡。其中最早向唐朝贡的是虞娄部，当时各部酋长朝贡者，不下 20 余人。总之，东北的黑水、渤海、松漠、饶乐四府民族地区，最初隶属营州都督府，神龙二年（706），改隶幽州都督府，后又归平卢节度使管辖，是唐朝的一部分。

黑水都督府的设置在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加强了中原和东北边疆的联系，巩固了东北边区。如所周知，早在周秦时期，东北各族与中原王朝的联系就不断发展，唐朝建立黑水都督府以后，从松花江到黑龙江流域各地，直到库页岛，都建立起了民族的地方行政机构，使东北边疆进一步巩固。而金朝统治者就是靺鞨的后裔，他们在黑水府故地设胡里改路（辖黑龙江下游北至黑龙江南至牡丹江一带）、速濒路（辖今绥芬河流域到牡丹江一带）、曷赖路（速濒路以南濒海一带）。元朝在黑龙江口奴尔干城设立征东元帅府，明朝在这里又设奴尔干都指挥使司，清朝则设吉林黑龙江将军。以上从未间断过的东北地方行政组织，是从唐朝黑水府开

始的。

其次，黑水都督府建立以后，促进了东北与中原经济文化的交流。当时黑水靺鞨贡于唐朝的除了楛矢以外，还有貂皮、鲸目以及综布、鱼牙绌、朝霞绌等纺织品。另一方面，在黑水府设立以后，唐朝派长史监临，中原有人常到松花江黑龙江流域，从此文献里对东北地区的记载，也越来越多。

二十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唐朝中外文化的交流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期，这时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更加频繁。唐朝不仅吸收了外国的文化，同时中国的经济文化也远播各国，促进其他国家的繁荣和进步，加强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中朝两国唇齿相依，早在公元前十余世纪，中朝人民的交往就非常频繁，后来中国的文化典籍如五经、四史、玉篇等，在古朝鲜曾广泛流传。到了唐朝，两国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双方贸易非常发达，北起登州，南达楚州、泗州，西至长安，都有新罗（朝鲜古国）商人的足迹。当时从新罗输入的商品有牛、马、苧麻、布匹、纸、墨、笔、折扇等。唐朝输出的主要是丝绸、茶叶、绣物、陶瓷、药材、书籍等。由于贸易的频繁，唐政府在长安设立新罗馆，专门接待新罗商人。唐代宗初年，归崇敬出使新罗，在途中，新罗人民携带资帛抢购唐朝货物，这充分说明中朝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

另一方面，在唐朝外国留学生中，新罗人最多，他们回国以后，对传播文化起了巨大作用。留学生归国以后，多任高官显职，并根据唐朝法制改革了本国的礼仪和法律，模仿唐制划分全国行政

区为十二道，设立科举制，通过考试选拔官员。他们还设置了医官、律令、算学、通文、刻漏博士，广泛研究中国的天文、历法、医学、文史典籍等。上元二年（675），将唐历在全国推广应用。当时新罗所学的文化，基本上是中国的五经、四史、《文选》之类。他们特别爱好唐诗，对白居易的诗和张鷟的文章尤其喜爱。7世纪中叶，留唐学生薛聪，根据字音创造了新罗文字“吏读”，对于文化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至于服饰方面，从7世纪以来，新罗人都穿唐服。

另一方面，新罗文化对唐朝也有一定影响。“高丽乐”传到内地以后，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后来成了唐朝国定的“十部乐”之一。

唐代的扶南，后被真腊统一，所以又称真腊，就是今天的柬埔寨。公元3世纪，吴国曾派康泰、朱应到达扶南，由于他们二人的建议，改革了扶南的风俗，腰间围“横幅”的习惯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南梁时期，从扶南来了几位高僧，其中著名者是伽婆罗，他通晓多种语言，在中国译了11部佛经。贞观六年（632），真腊派使者到唐，唐太宗很高兴，回赐了大量礼品。唐中宗以后，真腊划分南北两部，北部称陆真腊，又叫文单。开元时期，其王子带使者至长安，玄宗封他为果毅都尉。代宗时期，真腊送来驯象11头。唐政府封其使者为试殿中监，赐名宾汉。真腊南部称水真腊，宪宗时曾派使者来唐送犀象等物，唐以锦绢等物回赠。

越南（林邑）是我国南方的邻邦，早在数千年前，两国人民即友好往来。东汉时期，中国的铁器、铜器和陶器就传到越南。他们的著名学者士燮，曾留学洛阳，研究《尚书》、《左传》，后来任交趾太守四十多年。越文《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政，教以诗书，熏陶美俗。”越南学者姜公辅，曾在唐朝考中进士，并在长安担任高官显职。总之，中越人民自古以来就是友好的。

西南方面的印度、巴基斯坦，唐朝称为天竺，早在两汉时期，两国就存在着贸易关系。到了唐朝，印度半岛沿岸，常有唐朝商船

往来。当时从天竺输入的，主要是胡椒、宝石、珍珠、棉布、椰子等。唐朝输出的，有丝织品、麝香、青瓷、铜钺、樟脑等。

公元7世纪，我国发明的纸，经中亚传到天竺，后来造纸技术也传到那里。由于天竺人学会了中国造纸法，所以从八九世纪以后，天竺便结束了用贝叶和桦树皮写字的时代。

天竺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他们的先进文化，也传入唐朝。太宗时期派人向天竺学习用甘蔗熬糖法，从此我国学会制造砂糖。到了代宗时期，又学会制冰糖。

另一方面，天竺的数学、天文学也传到唐朝。当时著名学者有迦叶、瞿昙、拘摩罗三个家族。瞿昙曾编制《经纬历》，高宗时期，李淳风的《经麟历》和《经纬历》并行于世。武周时期，瞿昙悉达编译了《九执历》，是一部影响较大的历法，当时曾被民间采用。著名天文学家张遂编《大衍历》时，曾参考过《九执历》。天竺的拘摩罗，曾为《大衍历》提供一个推算日食的计算方法。由于天竺历法曾吸取希腊历法的理论和方法，张遂通过学习天竺历法，间接吸取了希腊的历法知识。

天竺国的数学也传入内地，因为瞿昙悉达编的《开元占经》保留天竺数学的数码和圆弧的画法、弧的正弦等知识，从而使唐朝数学家学习了天竺的大数记法。此外，佛经里关于度量衡的细微单位（如尘、埃、渺等），也被引入中国数学记数法。


唐朝郑虔画 唐代垂直舵

在医学方面，天竺的外科手术、整骨科，以及眼科，对唐朝都产生一定的影响。

至于文学艺术，由于佛经的译述和宣传，唐朝出现一种新文

体——变文。变文就是俗讲的话本，这是一种夹叙夹唱的文体。由于它是以广大人民作对象，日益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所以其内容逐渐脱离佛教而更多反映现实生活。

此外，天竺音乐也被唐人吸收，成为国定“十部乐”之一。同时天竺的琵琶七调也传入内地，对我国古代音乐产生一定影响。

在中印、中巴的友谊史上，双方高僧的来往，起了桥梁作用，其中贡献最大的有玄奘和义净等。关于玄奘的活动，本书已在另节介绍，这里着重谈谈义净的活动。

义净（635—713）姓张，字子明，河北范阳（今河南省怀来、永清、北京市房山东和长城以南地）人。八岁入齐州（山东济南市、历城、章丘等县）土窟寺为僧，勤学好问，孜孜不倦。咸亨二年（671），他率领弟子善行等，乘波斯商船，由广州出发，从海路西行。这年冬天他到了室利佛逝（苏门答腊）。义净在这里学习梵文和经论，准备到天竺。第二年，他得到室利佛逝王的资助，在六月下旬到了马来半岛南端的末罗瑜国。

咸亨三年（672）十二月，义净从末罗瑜国西行，十余天后达裸人国（今孟加拉湾的尼哥巴群岛）。第二年二月八日至印度半岛东海岸的耽摩立底国，义净在这里住了一年。上元元年（674），从这里西行，访问摩揭陀国的著名寺院——那烂陀寺和莫诃菩提寺。

义净在那烂陀寺住了10年，向著名高僧宝师子和智月等人请教。当时除了求法以外，还进行翻译工作，《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和《一百五十赞佛颂》六卷经，都是在这里翻译的。义净的工作对沟通中印文化，有很大的贡献。

垂拱元年（685），义净离开那烂陀寺回国，途中他在室利佛逝期间，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和《西域求法高僧传》，记录他在海外各国的见闻和海外高僧事迹。这两本书和《大唐西域记》相似，都是研究古代印度和东南亚历史的宝贵史料，至今仍被各国历史学家所珍视。

在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里，有两章介绍天竺医学知识，提到患者常用少食的方法来治疗，这和现代的医疗原理是符合的。同时他在书中还提到天竺僧人的卫生习惯，如散步、淋浴、疏牙、活舌、食前洗手等，这些习惯一直被印度僧侣所保持。

西南亚另一友好国家尼泊尔，早在公元5世纪，东晋高僧法显就到过那里，他是外国人访问尼泊尔而留有真实记录的第一个人。到了唐朝，双方关系更加密切。住在加德满都谷地的尼瓦尔族，在8世纪下半期，便通过印度输入中国纸和造纸技术。现在尼泊尔造纸的原料，还是用瑞香科植物的纤维，和8世纪吐蕃人所用的造纸原料是相同的。

唐代中国与尼泊尔最亲密的时期，主要是在公元7世纪前半期。贞观十三年（639），玄奘到达天竺，又由天竺进了尼泊尔平原巡礼佛迹。他到过现在尼泊尔的白塔瓦尔附近地方，参拜了释迦牟尼父母的宫殿遗址，以及佛的诞生地，参观了佛在太子时与人角力的地方，瞻仰了佛剃发为僧和传道的遗址。最后玄奘到了现在尼泊尔的伽悉亚地方，即当时的拘尸那揭罗国，朝拜释迦牟尼在婆罗树下逝世的圣地。

贞观十八年（644），卫尉丞李义表奉命出使印度，道经加德满都谷地，曾受国王那陵提婆的热烈欢迎和殷勤款待。贞观二十一年（647），那陵提婆遣使到达长安，带来菠棱、酢菜、浑提葱等礼品。菠棱就是菠菜，是远在公元7世纪中叶从邻邦尼泊尔输入的。高宗永徽二年（651），那陵提婆的儿子尼利那连陀罗继位以后，又遣使入唐，赠送土特产品。

洛阳人王玄策，曾三次出使尼泊尔和印度。李义表和王玄策出使后，中国高僧到尼泊尔的人数更多了。

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早在西汉时期，中国的使者就到过安息（即波斯）。唐高宗在位时，大食进攻波斯，唐政府曾发兵声援，波斯暂时失败，其王子俾路斯投奔唐朝，唐政府留他住在长安，并授以官爵。当时两国贸易关系也很密切，波斯港口经常有唐朝商船

停泊，同时波斯商船也常到广州。当时我国用丝织品、纸、大黄、黄连等换取波斯的宝石、珊瑚、香料、药品等。长安、扬州、广州、楚州、交州、泉州等地，都有波斯人居住，他们开设“波斯店”，经营各种商业，有一些人长期在唐朝生活。

另一方面，波斯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而且南北两路在此会合，现在伊朗的伊斯法罕，就是唐朝丝绸路上一个重要的转运站。中国的丝绸、工艺品、文物输入波斯以后，再向西方转运。

大食，也称哈里发帝国，是回教教主穆罕默德创建的。在唐朝时期，大食的国势甚强，他们北占中亚，南侵天竺，西据北非，并屡次打败拜占廷。永徽二年（651），开始与唐通使。唐玄宗时期，又派使者送良马宝钿带等。由于大食的势力已经侵入中亚，昭武诸国受其压迫，当时石国（故地在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一带）请求唐军支援，派往支援石国的唐将高仙芝反倒掠夺石国。石国王子和大食在怛尼斯（今吉尔吉斯共和国伏龙芝州）联合打败高仙芝，俘虏部分唐军，其中有造纸工人，大食利用他们在撒马尔罕设立了造纸厂。后来，又在班达（今巴格达）、大马士革等地设立造纸厂。中国的造纸术又从大食传入埃及和欧洲，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发展。

随着两国商人的往来，大食的药材也输入中国，主要有乳香、没药、血竭、真球、木香、苏合、香油等。与此同时，大食医生也来内地，其中著名者有李摩珂、李珣等人。

中国医药学对大食的贡献，主要有炼丹术、脉学和药材。欧洲炼丹史家詹生大卫士说：“在公元八九世纪，中国的炼丹术传入大食，12世纪再从大食传入欧洲。”中国的脉学也是唐代传入大食的，10世纪末年被阿维森纳的《医典》采用。他在诊脉方面列出48种脉法，其中有35种是中国传入的。中国的药材也传到大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牛黄和麻沸散。

拜占廷也叫拂菻，又称东罗马。过去中国的丝织品，曾通过波斯传到拜占廷。贞观十七年（643），拜占廷遣使来唐，送来赤玻

璃、石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回信答聘，并回赐缯绮。唐玄宗时期，他们多次派使者到长安，并且赠送狮子和羚羊。同时拜占廷的杂技和医学也传入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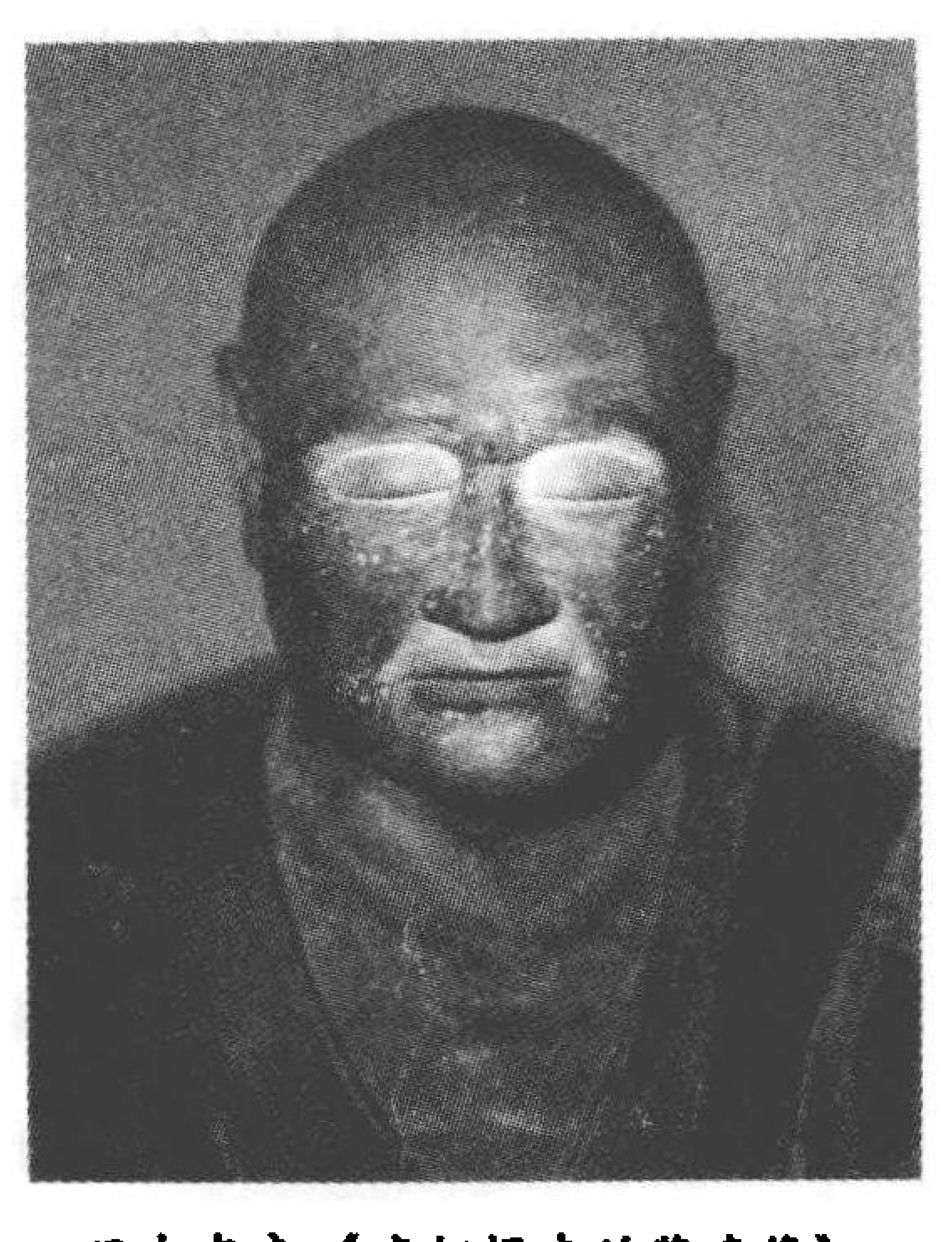
总而言之，唐代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它和世界各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非常广泛而深入的。这种频繁的交流和友好往来，大大加强了各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深厚友谊，促进了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丰富了各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唐朝对世界文化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十二、鉴真和阿倍仲麻吕

——唐日友谊的使者

中日友好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岁月里，两国之间不知有多少人冒着惊涛骇浪，不顾生命危险，或者东渡，或者西来，对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做出贡献。其中最杰出的人物，就是唐朝的鉴真和日本的阿倍仲麻吕。

垂洪四年（688），鉴真生于扬州江阳县，俗姓淳于，14 岁出家，曾在长安，洛阳两京游学。他的活动以他所主持的扬州大明寺为中心，主要在淮南地区。佛教史书说他有著名弟子35 人，各自倡导一方，弘其师教。可见他在淮南等地，威望很高。



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的鉴真像》

鉴真除了被传授戒律以外，还学习了建筑和医药知识。给鉴真受菩萨戒的道岸法师，是当时著名建筑家，唐中宗曾委任他修筑长安的荐福寺和小雁塔。景龙二年（708），鉴真在长

安从弘景受具足戒。弘景是道岸的师兄，精通医学。他跟从弘景和道岸学了很多医药和建筑知识。

鉴真特别热心社会活动，在10年期间，主持建寺80余所，铸像无数，开慈悲院救济贫民，设无遮大会行平等供，亲自给贫病的人煎药。在经常和群众接触中，他掌握了多方面的文化知识，团结了一批有专门造诣的技术人员。所以鉴真东渡虽然为了去传戒律，但是实际是以僧团的组织形式，用集体的力量，把当时最成熟的唐代文化系统地介绍到日本去。

天宝元年（742），日本高僧荣叡和普照从长安来到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大师，除了听他宣讲戒律以外，还希望取得他的支持，派几位弟子东渡日本。鉴真支持日本僧众的要求，但是，弟子们认为，“远涉大海，百无一至”，因而都不愿东渡。这时，鉴真发出庄严的誓言：“为是法事也，何惜生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弟子们深受感动，有二十多人决心跟鉴真一起东渡。天宝元年（742），正在准备东渡之际，计划随鉴真东渡的道航和如海发生了冲突。道航认为如海水平很低，不够出国资格。如海大怒，便到淮南采访使那里诬告道航入海要与海盗勾结。采访使班景倩听了密报大为震惊，后来虽然查清是如海诬告，但采访使仍然把船只没收，禁止他们出海。

第二年十二月，鉴真率领普照、荣叡、祥彦、思托等17个僧侣，并同玉作人、画师、刻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共85人，乘军舟东渡。不幸在余姚郡狼沟浦遇到风暴，船被击破。过了一个月，鉴真一行再度下海。又因风急浪大，离岸不久，船又触礁破坏，不得不重新上岸。余姚太守把他们安置在鄮县的阿育王寺。

天宝三载（744），正准备东渡，越州僧侣向州官控告，说日僧荣叡欺骗鉴真渡海逃亡。结果荣叡被捕，第三次东渡未能成行。

此后，鉴真一面派弟子法进和两名随从带着“轻货”到长乐郡去买船，一面备办粮食和用品，筹备第四次东渡。鉴真自己率领

祥彦、普照、思托等三十余人，以巡礼佛迹为名，向南进发，经过临海郡，到达天台山，然后经过临海、黄岩等县，准备南下永嘉郡。这时，留在广陵的鉴真弟子灵祐等人，出于对鉴真的爱护，不愿他远适异国，请求采访使劝阻鉴真不要过海。采访使派人追踪到临海郡，把鉴真迎回广陵。各地信徒听说鉴真又回到广陵，都来庆贺慰劳。鉴真严厉批评灵祐。灵祐为求得师父的宽恕，每夜从一更站到五更，连续站了60天。各寺僧众共同替他说情，鉴真才宽恕了他。第四次东渡计划又没有实现。

天宝七载春，鉴真又计划造船，备办物品，准备第五次东渡，鉴真一行六月二十七日从广陵（今扬州市）渡江，经江南运河，由晋陵郡（今江苏常州市）到会稽（今浙江绍兴市），等待季风入海。十月十六日正式起程。离开海岸两天以后，遭遇台风，14天后船飘到海南岛南部。他们上岸后在大云寺住了一年，又到崖州（今广东琼山县南）。鉴真在这里主持建筑佛殿，造释迦木像，登坛传戒，讲律度人。后来从澄海县（琼山县西南）登舟，到达海康郡（今广东雷州市）、象州（今广西象县）、白州（今广西博白县）、梧州（今广西梧州市）、始安郡（今桂林市）。他们在始安住了一年，南海郡太守卢奂派人迎接鉴真。鉴真一行从始安沿桂江东行，经苍梧到达端州（今广东肇庆市）。日僧荣叡在端州逝世，鉴真哀恸不已。鉴真在南海郡（今广州市）住了几个月，又向始兴进发。鉴真在南方频经炎热，眼睛患病，治疗无效，双目失明。

鉴真过了五岭，沿赣水北上，到了庐陵郡（今江西吉安县），他的得意弟子祥彦又死去。之后，鉴真沿浔阳顺江东下，回到扬州，住在龙兴寺。

天宝十一载（752），日本遣唐使从长安回国途中，日本大使副使到了扬州延光寺，拜会了鉴真，敦请他继续东渡日本。

鉴真虽然已经66岁，而且扬州僧俗都挽留他，但他仍然决心东渡传戒。这一年十一月十五日，鉴真一行乘日本副使大伴古麻吕的船东渡。二十一日漂到阿儿奈波岛（今冲绳岛）。十二月七日到

益救岛（今屋久岛）。十八日离开益救，二十日抵九州南部的阿多郡。天宝十四载（755）二月四日，到达平城京（今日本奈良市），受到天皇以下朝野的欢迎。

这次到达日本的共24人，除上述活着的人外，还有昙静、义静、法载、法成、仁韩、灵曜、怀谦，以及西域人安如宝，昆仑人军法力，胆波国人善聪等。其中有建筑师、画师、雕刻家，以及医药、刺绣、铸写等方面人才，他们实际是一个文化使节团。

从天宝十四载开始，鉴真在日本工作了10年之久。

首先，他宣教授戒。这一年四月，鉴真在卢舍那佛像前设置戒坛，当时圣武太上皇、光明太上皇后、孝谦天皇及皇后、太子和公卿以下官员受戒者四百余人，同时日本高僧灵祐、贤景等八十余人，也都弃旧受新。755年秋季，开始给一般人受戒，只有受戒的人，才成为合法的信徒。

与此同时，鉴真携带并宣讲天台经疏，给日本的天台宗奠定了基础。天台宗在平安时代大大发展，对日本平安时代的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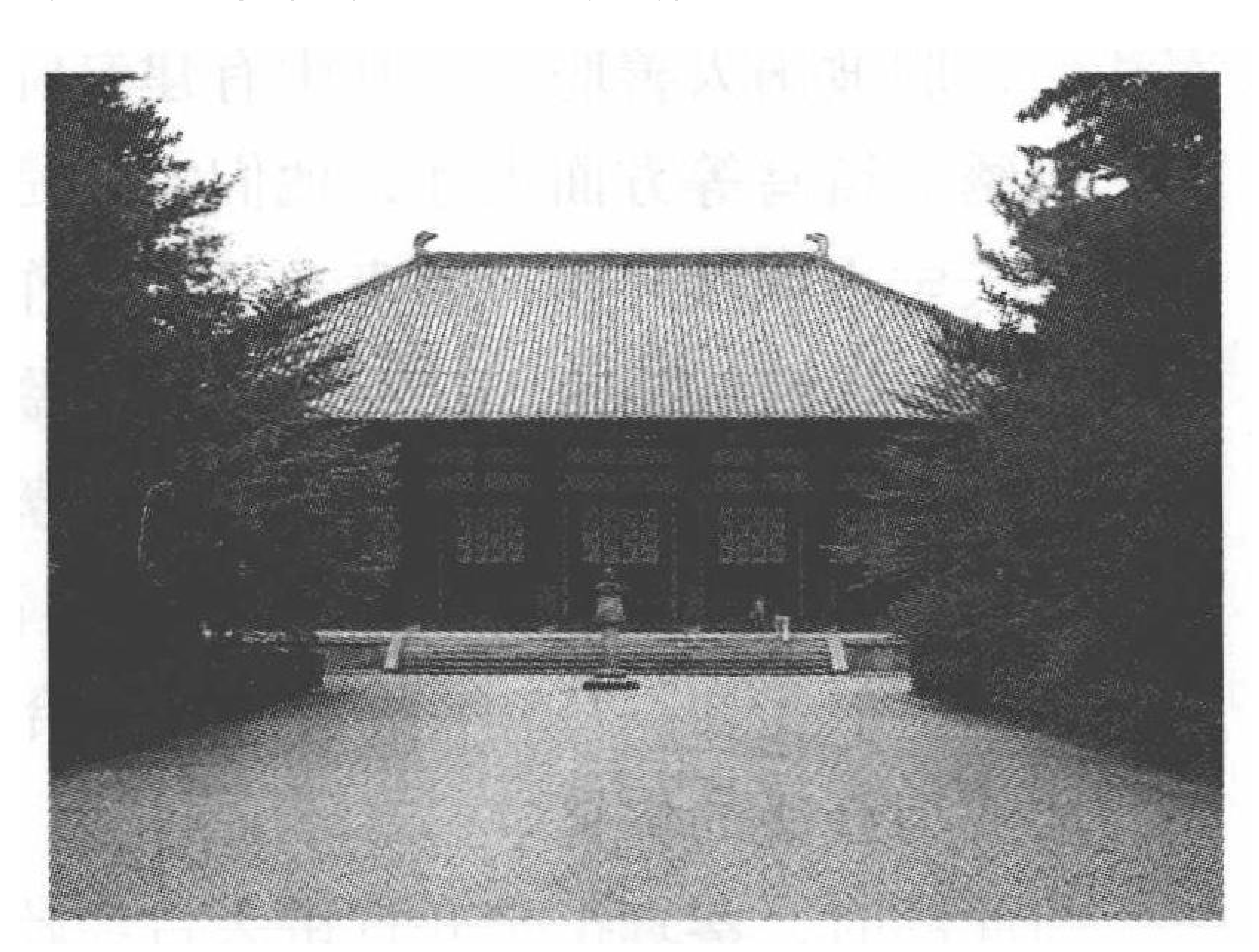
除了宣教传律以外，鉴真及其弟子等在建筑、艺术、医学等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鉴真在日本领导创建的唐招提寺，其中的金堂、讲堂和一些重要的经像法物，可以代表我国盛唐建筑雕刻最高水平，是日本艺术的明珠，日本人民视为国宝，至今保存完好。唐招提寺及唐禅院的建筑艺术，对日本的天平文化的繁荣，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鉴真又是医学、药物学家，他给日本皇太后治愈了疑难病症。在日本，曾有《鉴真上人秘方》一书问世，据说这就是他的处方记录。当时日本药学初兴，药物真伪混杂，日本天皇下令“辨证”。鉴真虽然双目失明，但是他凭着自己的嗅觉，识别药的品种，鉴定药的性能，给日本古代药物学奠定了基础。据说现在日本东大寺传的“奇效丸”，就是鉴真传到日本去的。正因为这样，所以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7），日本的药袋上，仍然画着鉴真的

图像。

广德元年（763）三月，鉴真开始患病。弟子们为他造了肖像，现在仍然保存在唐招提寺的开山堂，这就是日本国宝“鉴真和尚坐像”。这个像“顶骨秀，颧骨张，鼻梁高，唇紧闭，静含脸，浮微笑”。很正确的表现了鉴真的意志和性格。

五月六日，鉴真在招提寺逝世，终年76岁。



唐招提寺

在中日友好关系史中，还有一位杰出的人物，就是热爱中国的日本著名学者阿倍仲麻吕。

阿倍仲麻吕，于公元689年生于日本本州大和。他父亲名叫阿倍船守，在日本中央政府中担任中务大辅（相当五品官）。阿倍仲麻吕“性聪敏，好读书”，他的少年时代是在本国度过的。早在他诞生前五十多年，日本便开始进行“大化革新”，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模仿唐朝。当时设立了大学寮，教授《春秋》、《尚书》、《礼记》等典籍。大学寮定员400人，招收正五品以上子弟入学。根据阿倍仲麻吕的家世，他本来应当在国内入大学寮学习，因为他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基础，因此被选拔入唐朝留学。

开元五年（717）十月，阿倍仲麻吕随日本遣唐使到达长安。与阿倍同时入唐的，还有著名学者吉备真备等人。

阿倍到长安后，唐政府分配他到太学学习，这里的学生都是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太学的教师主要是各种经典的博士，是全国的知名学者。太学的课程有《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等必修课，另外还有《孝经》、《说文》和时务策等。由于唐朝科举考试要考诗赋，

太学中也学作诗赋。太学的修业时间是9年，在九年期间，学生至少要精通两种以上经典，经考试合格以后，由太学推荐，参加礼部举办的科举考试。

阿倍仲麻吕在著名专家指导之下，经过9年的勤奋学习，他不仅精通几种经典，而且善作诗赋。这期间由于热爱中国，他改姓名叫“朝衡”（或晁衡）。

大约在开元十六年（728），他担任了左右春坊司经局的校书郎（从九品），专门校理图书。从这时候开始，阿倍仲麻吕便正式参加了唐朝政府工作，长达40年之久。

早在太学学习时期，他便结识了储光羲。储光羲是唐代山水田园诗人，阿倍仲麻吕经常和他一起唱和，感情十分融洽。日本第十次遣唐使到达长安时，储光羲风闻阿倍仲麻吕准备回国，特为他写了《洛中贻朝校书衡》一诗，表达对朝衡惜别之情。但是这一年他并未能成行。

开元十七年（729）阿倍仲麻吕转任“补阙”（从七品），属于门下省。“补阙”是皇帝侍从，对皇帝和中央政府工作中的问题，有权提出批评建议。地位虽不甚高，但接触中央高级官员的机会较多，所以职务相当重要，是中央政府内的清贵官职。在这一时期，阿倍仲麻吕结识了赵骅、魏万等人。魏万号称“王屋山人”，是唐朝进士，和阿倍仲麻吕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有一件衣服就是用仲麻吕送的日本衣料做的。魏万很喜欢这件衣服，经常穿着。

4年以后，阿倍仲麻吕离开门下省，担任仪王“友”。这个仪王就是唐玄宗第十一子李璲。“友”是一种官职，据《唐六典》记载，亲王府设置“友”一名，从五品下。“友”的职务是陪伴亲王，和亲王共同学习、游乐，并以封建道德教育亲王。从此阿倍仲麻吕可以在贵族和高级官员中活动，是唐政府信任的官员。

正在这个时候，大诗人李白应唐玄宗的邀请来到长安，担任“翰林供奉”，是皇帝文学词章顾问侍从。李白在长安居住的两年多时间里，除结识了贺知章等人以外，还结识了阿倍仲麻吕。两人

经常在一起痛饮酣歌，高谈阔论。正因为他和李白具有深厚的友情，天宝年间，传说阿倍仲麻吕归国途中在海上遇难，李白听到这个噩耗极为伤感，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写诗悼念他的挚友：“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李白以明月殉海喻人之遭劫难，足见诗人对晁衡的高度赞美。至今在日本史籍中仍然记载着这首诗。

阿倍仲麻吕在海上遇救，天宝十二载（753）从交趾辗转回到长安，任秘书监（国家图书馆馆长），从三品。这一时期，他除了和魏万、赵骅交游以外，又和诗人王维、包佶等人结成亲密朋友。阿倍仲麻吕回国时，王维送他到海边，写了《送秘书晁监还日本》的五言诗，抒发惜别之情。

>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村扶桑外，主人孤舟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王维与晁衡的深厚友谊，在“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的诗句里，王维心随神往地写出对阿倍仲麻吕东渡的艰险，具有安危与共和患难相关的至诚情感。

阿倍仲麻吕在担任唐政府官职以及和中国文人交游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中日两国友谊的桥梁。他虽然是唐朝官员，实际执行日本大使的任务。每当日本“遣唐使”到达长安，他都主动协助使团，与唐政府接洽有关事务。例如：天宝十二载（753），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到达长安以后，阿倍仲麻吕即引领日本使团会见唐玄宗。会见以后，唐玄宗令阿倍仲麻吕介绍使团参观唐中央政府的府库和三教殿等。由于阿倍仲麻吕的疏通，唐玄宗授予日本大使藤原清河以“特进”（正二品散官），授副使大伴古麻吕以银青光禄大夫卫尉卿（从三品），从而加深了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

大历五年（770），阿倍仲麻吕在中国与世长辞，终年72岁。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隋唐史话　　上
作者=乌廷玉著
页数=130
SS号=12423840
出版日期=2009.10